

◆ 歷史與文化論叢

錢賓四先生全集

錢穆 著

42

錢賓四先生全集

◆ 歷史與文化論叢

聯經



A89015

文化新生與雲南

中國共產黨與萬里長城

論當前國人之憂患意識

漫談改革社會風氣

第四編：原爲十四篇，新編仍爲十四篇。

移出一篇：

物與心：經作者改寫，已收入人生十論。

新增一篇：

敬告中華民國的青年們

六十八年本書出版時，先生曾自撰數語爲介，曰：

本書於民族歷史文化，從各方面加以敘述，庶使讀者於吾民族之已往歷史與其固有文化，易於獲得其認識，爲此下吾民族自救自拔之張本。方今吾國人方竭意求變求新，然一切變必有其不變者爲之基礎，一切新亦必有其舊爲之根源。本書專著眼在此下求變求新之基礎根源上有所指陳，使讀者易有啓悟，易有奮發，固非如已陳之獨狗，或如楚人獻璞，苟善

歷史與文化論叢 目次

序.....	七
--------	---

第一編

一 人類文化之前瞻.....	一
二 人類文化之展望.....	七
三 人類文化與東方西方.....	一三
四 從人類歷史文化討論中國之前途.....	二五
五 漫談中國文化復興.....	三三
* 六 中國文化特質.....	六五

七	中國文化之唯心主義·····	七三
---	----------------	----

* 八	從歷史文化看時事筆答錄·····	八三
-----	------------------	----

第二編

一	中國的哲學道德與政治思想·····	九三
---	-------------------	----

二	中國歷史與中國民族性·····	一〇三
---	-----------------	-----

三	中國史上最近幾個病源·····	一一三
---	-----------------	-----

四	革命與政黨·····	一二一
---	------------	-----

五	新三不朽論·····	一二七
---	------------	-----

六	學與人·····	一四七
---	----------	-----

七	人生三講·····	一五五
---	-----------	-----

八	人生四階層·····	一七一
---	------------	-----

* 九	人生三階層·····	一八一
-----	------------	-----

*一〇 生活行爲與事業·····	一九九
------------------	-----

第三編

一 中國文化之潛力與新生·····	二二一
二 孔教之偉大·····	二二七
三 儒學與師道·····	二二一
四 東方人的責任·····	二二九
* 五 中國文化新生與雲南·····	二三三
六 五十年來中國之時代病·····	二四一
七 五十年代中之中國思想界·····	二四九
八 近五十年中國人心中所流行的一套歷史哲學·····	二五五
九 毛澤東的悲劇·····	二六一
一〇 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史·····	二六五

* 一一	中國共產黨與萬里長城·····	二七一
一二	極權政治與自由教育·····	二七七
一三	歷史與時代·····	二八七
一四	歷史會重演嗎·····	二九五
一五	物與心與歷史·····	二九九
一六	自然人生與歷史人生·····	三〇三
一七	歷史問題與社會問題·····	三一—
一八	從西方大學教育來看西方文化·····	三一七
一九	文化復興中之家庭問題·····	三二九
二〇	母親節說母愛母教·····	三三七
* 二一	論當前國人之憂患意識·····	三四—
* 二二	漫談改革社會風氣·····	三四九

第四編

一	知識之兩方面·····	三五七
二	讀書與做人·····	三六一
三	中國文化與人文修養·····	三七三
四	當仁不讓·····	三八三
五	回念五四·····	三八九
六	青年節敬告流亡海外的中國青年們·····	三九七
七	在現時代怎樣做一個大學生·····	四〇三
八	關於提倡民族精神教育的一些感想·····	四一一
* 九	敬告中華民國的青年們·····	四一九
一〇	青年的責任·····	四二五
一一	愛我中華·····	四三五

力量太偏重在經濟這一方面了。馬克斯的歷史觀，正已看出了此病，但他不知其是病，而反把此病象認為是人類歷史之正趨，於是不免使病上加病，而我們也不免要誤認為只有共產主義才是當前世界之惟一大病了。

人類社會是一個整體的，單從經濟一方面，解決不了人類社會全部問題之所在。同樣理由，單從政治、外交、軍事等任何一方面，也都解決不了有關人類整體的問題。因此，任何一項專門知識，最多只能解決人類整體中之某一方面的問題。而所可惜的，為要解決某一方面的問題，而無意又激起了其他方面的問題。於是新問題不斷激起，而終於無法得解決。

而且，縱使集合了各方面的專家知識，將依然解決不了人類當前的問題。何以故？因問題是屬於整個的，而各方面的專家，則把此整個問題割裂破壞了，不見真問題所在，所以終將無法求解決。

其次，本人想提出第二個意見來。本人認為，今天世界所缺乏的，正是這一個指導全人生前進的大原則與大綱領。一應專家知識，都得依隨於此大原則與大綱領之下而始有其意義，始可相互間有配合。否則各自分道揚鑣，各求獨立發展，其間儘會有矛盾，起衝突。

不僅學說如此，人事亦然。如云個人自由，如云民族自決，如云國際平等，一切理論，均不

能指導全世界、全人生，走向一和平安樂之境。

正如建造一所大樓，應先有一整體計畫與整體圖樣。若把門窗柱壁，各各分開、各自營造，結果斷斷建立不起一所大樓來。

此一大原則與大綱領，當於何處覓之？此乃當前關心人類文化前途者一必當考慮討論的大問題。

此一大原則與大綱領，在本講演中，無法詳論。但有可簡單述說者，此一大原則與大綱領，將決非僅屬於經濟的，或政治的；也將決非僅屬於個人的或民族的；仍亦不能僅屬於科學的或宗教的。

此一大原則與大綱領，應從人類生活之全體中尋求而覓得之。此人類生活之全體，論其內涵，我們今天所運用的「文化」二字正可與之約略相當。

我們必先瞭解文化，才始能來領導文化，才始有所謂文化之前瞻。

因此，文化學之研究，將為此後學術界一大事。我們必先將人類文化傳統，在歷史上所曾發現、在現世界所猶存在者，一律平等視之，各求對之有瞭解，再進而加以相互間之比較與匯通，此後才始有合理理想的人類新文化出現。此項新文化理想之出現，才始是解決現世界種種問題之一

先說第一階層。譬如人生吃飯、穿衣、住房子，都脫離不了物質經濟的關係。可是，物質經濟只可限制人生活動，而不能決定人生活動；因為衣、食、住等物質生活，並沒有一定的標準，所以物質經濟，只是人生活動中消極的必需。如果人類文化僅僅止於「對物」這一方面，那麼，這種文化，只可說是一種原始文化。

其次，說到第二階層。由於人對人的關係，漸漸就形成了社會羣體，社會羣體必然會產生政治。於是這裏建立一個國家，那裏建立一個國家；這裏形成一個集團，那裏也形成一個集團。爲了國家和集團的利益，政治必然要求人民服從，所以政治帶有一種權力性，帶有一種拘束性和壓迫性。一個國家爲鞏固內部，或向外發展，或抵抗侵略，還帶有一種鬥爭性。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英國人祈禱上帝，賜予戰爭勝利，打敗德國，那麼世界就會實現和平。同時德國人也同樣地祈禱上帝，賜予戰爭勝利，打敗英國，那麼，世界就會實現和平。你們說，到底誰的祈禱對呢？事實上，政治又使人羣隔離，造成國家與國家的對立，集團與集團的對立，因而更引起嚴重的鬥爭。不是嗎？

我以爲人類的理想政治，應該遵循下列兩大法則：一，要盡量減輕其權力性，使不致引起對內對外的一切鬥爭；二，要在小量的服從和拘束中，獲得大量的自由和平等。因為人類文化，演

外故重「物」。人生必有心靈與物質兩部分，此又是人生大同處，但或重心靈人生，或重物質人生，又成了人生之各別。重心靈人生，故重「情感」，重人與人內在生活之相通同然處。重物質人生，故重「理智」，重人與人外在生活之相殊各別處。

就空間講，人生有內外。就時間講，人生有過去與未來。人生不能有過去無未來，亦不能有未來無過去，此又是人生大同處。但或重過去，或重未來，又成了人生之各別。只爲重視過去，紀念過去，對未來有所不暇計較，此是人生之情感，亦成了人生之道義。爲了重視未來，想望未來，對過去有所不值留戀，此是人生之理智，亦成了人生之功利。東方人重「道義」，西方人重「功利」，即由此分別。

重過去，則重保守；重未來，乃重進取。重過去，成爲現實主義；重未來，成爲理想主義。有了過去，始有現在，如此看，則現實人生乃是過去人生之一項果實。故人道中有報恩主義。但同時亦是一種成果之享受。有了現在，乃有未來，如此看，則現實人生乃成未來人生之一項手段。但同時亦是一種當前之犧牲。其中分別，只看他重視過去與重視未來之分別。

人生有其舊的一面，同時亦有其新的一面。舊的忽然演變出新的，新的又轉瞬回歸到舊的。誰也不能無舊，誰也不能無新，此又是人生之大同。但或喜新，或念舊，這裏又生出了千差萬

別。也可說，「生命」屬於舊，「生活」屬於新。人不能僅有生命，沒有生活。也不能僅有生活，沒有生命。生活日新月異，必然時時刻刻變，此一剎那之生活，與前一剎那、後一剎那之生活各不同；但不能說生活背後之生命有不同。人自呱呱墮地，迄於老死瞑目，只是同一生命。生活時刻翻新，日日變，息息變，所以完成此生命。因有了此生命，所以演化出瞬息不同日新月異之生活。但有人比較看重生命，有人卻比較看重生活。

大較言之，「生命」內在，「生活」則轉成爲一種外在。生命是在此外在生活萬異中之一同，生活則是在此內在生命一同中之萬異。亦可說：生命過去已存在，生活則須未來不斷之繼續。所以重視內在，重視過去，重視其同一的，即是重視生命。重視外在，重視未來，重視其相異的，即是重視生活。

二

由於上述諸分別，而又引生出其他種種分別，遂成人生之千差萬異，其實則仍是人生一大同。概括言之，可以說人生只是一體，而此一體又必然有兩分。人生是一體兩分的，宇宙大自然，也還是一體兩分的。東方人對此一體兩分，把「陰」「陽」二字說之，陰陽兩分亦屬外在，

而其背後則是天地萬物一體之大同。由小異則只見小同，由大異乃始見大同。孔子教人立己達己，立是立己之異，達是達到與人而同。其所立所達，亦有大小。所立小，斯所達亦小。所立大，斯所達亦大。立小異以達小同，此是川流之小德，亦是人生之小道。立大異以達大同，此是敦化之大德，亦是人生之大道。孔子乃東方惟一大聖人，因其所立大，乃可使人人皆學孔子，故其所達亦大。若使孔子僅是一哲學家，斯惟愛好哲學的人乃可學孔子。若使孔子是一政治家，亦惟從事政治的人乃可學孔子。在人中劃出一業，自成一家，此皆是小異，由小異僅可得小同。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不在人中立小異，而成爲人中之大聖，此則立了大異，乃可達於大同。使人人皆得爲聖人，此則世界人類亦達於大同，即是使此世界達於聖世。此乃孔子理想，亦即是東方人理想。

主要在人之「德」，不在人之「業」。業必由德起。德表現在「道義」上，業表現在「功利」上。由德而來之功利，此始是大功利。由業而來之功利，則只是小功利。一切小功利，可融爲一大功利，此爲「大德之敦化」。一切小功利，各自爭勝，各自霸佔，此仆彼起，所達不大，此爲「小德之川流」。卻沒有無德而能立能達的，此又是一項人類之大同。

五

西方人今天勝過東方，似乎是在其立業上，由東方人眼光看，則其立業亦必有德。所異只在德之大小。即如近代西方之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其獲成立發展，在其背後，亦必有一種德。但其所達則不能大，不能久，因其仍只是小德。東方人理想，則要治國平天下，求其業之能大能久，則仍當還就德上求，不當只從業上求。

今天的西方人，似乎舊路已走到盡頭，又要來開闢新路。如何始是一條新路，似乎今天的西方人也不自知，正在闖，正在試。專就東方人言東方，東方人此兩百年來，一意學西方，也未嘗無成就。要立業，要創新，東西雙方不妨有其同。但東方人自有其所以成爲東方人之處，東方人自有一條舊路，即其歷史文化幾千年之積累，即東方人與西方人之相異處。東方人似乎仍應該從異求同。我們似乎不該，也不能，來破己之異以求與人同。孔子之道，似乎東方人仍該著意尋求，努力奉行才是。

（民國六十三年九月十日第三屆中日大陸問題研討會講演，
九月十四日青年戰士報，十月東亞季刊六卷二期。）

四 從人類歷史文化討論中國之前途

一

歷史記載以往之人事，但人事無前定，因此歷史亦不能預知，但可推斷。

歷史事件，莫不有理可資解釋，成敗得失，皆有其所以然之理。故歷史上並無無理可說之事。

「事」屬變而「理」屬常，「變」不可知，而「常」則可知。

從各項事理中可以繙繹出共同之理，由此共同之理來推斷一切事變，雖不中，亦不遠。事中有理，復有勢。

「理」是一主宰，「勢」是一傾向，亦可說是一端兆。

事變之來，以漸不以驟。有些是事未定而勢已顯。

勢即是一種力，常稱「勢力」。勢又是一種形，又稱「形勢」。必待舊勢力消沉，舊形勢渙散，斯新勢力、新形勢才獲萌生。

勢之來，不可逆。勢之去，不可挽。所謂「其勢難當」，或稱「大勢已去」。

理與勢合，則理顯。理與勢背，則理隱。但理常在勢後，支配此勢。

凡事又有情有態。「態」指事之外貌言，「情」指事之內情言，此所謂「事情」與「事態」。

事之主持在於人，人之從事決於心。事情之主要，在於主其事之人之心。誠僞、公私、明暗，是其大分辦。

事情與事態，有時不能相合一，但判事當衡其情，不能依其貌。

勢從外面看，情從內部看，又合稱「情勢」。

情與勢合，又與理合，事必成。情與勢背，又與理背，事必敗。惟此三者間之離合向背之分數則極難定。

今天的西方社會及其一般思想，同樣在大轉變之中。

新形勢逼人而來，但西方人尙瞠目不知如何作應付。

如聯合國應是一時代產物，但此嬰兒生下即多病，尙未知如何來護養。

西方人只知迎合此世界新形勢來求適應，但並未能瞭解乃至接受此新形勢背後之真理。

他們的反共，並非真反共。依然謀求發展資本主義，則共產思想亦將依然漫衍，無法消滅。

隨於資本主義而逐漸醞釀形成的世界主義，有其貌，無其神。

一切向外接觸，只在利害上打算，不在道義上堅持。使兩次世界大戰以下之新世界，依然與

兩次大戰以前之舊世界，僅如五十步之與百步。

但此下世界必變，則端倪已露，誰也不能否認。

中國處在此一百年來世界潮流之大翻大滾之下，自己歷史，自難免也要邁進新路程，但可惜的是走錯了方向。

昧失了自己傳統的歷史觀，不再看重人心天理，與夫人文本位之一切道義，而只在別人的勢利上著眼。

於是有全盤西化論，爲共產主義布置溫床。

會聯想到儒家，孔孟。可是孔子到現在已兩千五百多年，儒家思想在各時代有演變，我們能不能拿幾句緊要話來總括？這就很難講。從前，講孔子思想也就意見紛歧，有人看重這一面，有人看重那一面。我覺得講文化，該講文化之全體，不能單舉一偏。即講思想，孔孟儒家以外，至少還有道家莊老，在中國人思想中，乃至一個不識字的人，可能他頭腦裏有儒家孔孟思想，同時也有道家莊老思想。除了儒、道兩家，我們不可否認，中國文化受外來佛教影響相當深，亦相當普遍。佛教思想進入中國，到了隋、唐時代，中國人自開宗派，有天台、華嚴、禪三宗。他們從原來佛教思想裏漸漸變出一套中國化的佛教，這些中國化的佛教很能配合中國社會和中國傳統文化，這些思想也可說是中國的。今天印度已經沒有佛教，有一些只是小乘宗派的，大乘宗派的佛教都流傳在中國。中國人把來吸收消化，變成爲中國的佛教。這些當然也是我們文化體系中的一部分，也是中國思想中的一部分。我們社會所謂的儒、釋、道三教，或說「三教合一」，這個說法已經很普遍，尤其是明、清兩代，我們不能不注意。

除了儒、道、釋三教，先秦諸子裏還有其他部分，也還重要。如墨家，固然到了漢代已經不盛行，然而直到唐代，像韓昌黎，還提到它。到了清末，中國人接觸了西方耶穌教，覺和中國墨家所講很相近，於是有人出來提倡墨子，墨家學說一時盛行。我在北京大學教書，那時一般學生

多只讀墨子，卻不看論語。我問爲什麼？他們認爲論語陳舊了，墨子卻新鮮。我說：「這話也不全是，今天我們大家競讀墨子，墨子並不新鮮了，但沒有人讀論語，論語將會又新鮮。」但至少我們不能否認墨家思想也是中國思想裏值得注意的。還有如法家，近代人看見西方人愛講法，一時便也來提倡講法家。但法家思想也不是到了清末、民初才來講。在中國歷史裏，一路下來，有一條法家思想的流在那裏。再如陰陽家，在中國社會上處處流傳，影響尤大。如講醫學，當然中國醫學很值得研究，但中國醫學中偏多講陰陽。若使我們對陰陽家思想不清楚，如何來研究中國的醫學理論？或許我們醫學理論中的陰陽學說是後來附會進去的。但既然附會進了，我們就該有研究。整個社會，一般人生，或許更多信陰陽家的，並不在儒、釋、道三家之下。我們就便說他是民間的一種迷信，要之也是一傳統，流行甚廣，成爲構成我們文化的一部分。

其他各家，我們此刻暫不論。從前司馬談講六家要旨，我想舉出新六家：即儒、道、佛、墨、法、陰陽。我們講思想，只講儒家孔孟，把此外五家忽略了，如此講中國文化總是稍有所偏。我們若講哲學，不妨各就所好，各有偏向。但要了解中國整個文化體系，這是一個客觀的，不該偏輕偏重，把有些東西全忽略了。若我們講文化先要注重講哲學思想，講此六家，這已經要我們很大的努力。或許幾個人研究儒家，幾個人研究道家，幾個人研究佛學，先來一個分工合

作，將來匯通起來，提要鉤玄，來綜合看中國思想究竟是什麼一回事。

二

可見從思想來看文化，在我們肩膀上負擔已很重。而且，思想定會有表現，思想必然變成爲行爲。若我們認爲以上六大思想，在中國社會裏很有力，有影響，他們一定會表現出種種行爲，那就是我們的歷史了。在清末民初，大部分人認爲中國的先秦相當於西方的希臘。那時百家爭鳴，思想很自由。秦漢統一以後，思想定於一尊，便沒有進步了。這些話我也暫不批評，但說思想定於一尊，當然是指的儒家孔孟。那麼孔孟思想在漢代以後，應會表現出種種活動。而當時學者，卻只講先秦思想，不講秦、漢以下的歷史。這是有頭，沒有尾。並且這是一條長尾，我們不該不注意。我們要反對孔孟儒家，也不當專據一部論語、一部孟子，還該看此下讀論語、孟子，信仰孔孟的許多人之所表現。譬如孔孟儒家愛講治國平天下，我們至少要看漢、唐、宋、明諸朝，他們一些治國平天下的想法和做法。元、清兩代，尤其是清代，實際上掌握行政事務的，大部分也多是中國人，還是所謂儒生。我們該注意到這輩儒生會如何來治理這個國家，這樣才能判定孔孟儒家思想究竟在中國有無價值，其利弊究在那裏。我在北京大學歷史系曾開一課，講「

秦始皇到清宣統，中國歷史上只是一套帝王專制的黑暗政治，我們也可不必再講中國傳統文化，因中國傳統文化实在是太無價值了。

今天主要的，要講從思想演變出歷史，那些思想便有一個實際價值。究從莊老思想裏演變出些什麼來，從佛家思想裏演變出些什麼來，從儒家思想裏又演變出些什麼來，在歷史上有憑有據，可指可說。當然思想表現在人生的各方面，但政治是其重要的一方面，這層不可否認。

三

再拿文學來講，人生就是文學，文學就是人生。從「新文化運動」起，羣認為西方文學始是人生的，中國舊文學，則是脫離人生的。這番話，我卻不贊成。我認為中國文學最與人生密切相關，能最有力來表現真實人生。讓我舉一個例：那時印度詩人泰戈爾來中國，在上海開了一個歡迎會，徐志摩寫了一篇文章，題是「泰山日出」，他說泰山日出了，泰戈爾來到中國了。但全部看過這篇文，沒有「泰戈爾」三個字，更沒有他來中國的時代和背景。若不是如古代詩經般代他加上一小序，便不知他究在說什麼。我想若使請一位懂得清代桐城義法的古文家來寫一篇「泰戈爾來華講學記」之類的文章，泰戈爾是怎樣一個人，他怎樣地來，當時有些什麼人，怎樣地歡迎

他，撰寫此歡迎文的是誰，泰戈爾之來，其意義何在、價值何在，只短短五六百字一小篇，也可寫得很扼要、很精采。當然也可寫些詩篇來表達。爲什麼定要說中國文學不切人生？西方大文學家，往往有人一輩子跟他身旁，幫他寫傳記。因在他的文學裏，並無他自己的人生存在。中國則不然，把杜甫詩編年，逐年逐月逐日早晚，他人在那裏，做些什麼，想些什麼，一路下來，最詳備的傳記，莫過於他自己的詩。我們若要寫一篇蘇東坡的傳記，那更複雜了。他的詩詞散文、書札筆記等，統統是第一手材料。蘇東坡其人，便畢現在蘇東坡自己的作品中。又如陶淵明、陸放翁，住在鄉村，五年、十年、二十年，爲他作傳記，除卻讀他詩集外，再也沒法寫，而且也再不能像他自己的詩那麼寫得好。陸放翁在鏡湖，六十、七十、八十，一年年、一日日，春夏秋冬，四季變化，他的日常生活，盡在詩中，等於是一部日記。我們讀他的詩，他晚年二三十年鄉村生活，如在目前。他的人生，便是他的文學，爲何定要說中國文學不切人生呢？

當然文學有各種體裁，有很多變化。變到最簡單，爲我們所看不起的，便如做對聯。簡單幾個字，把他的一生學業性行，家事國事，都寫上了。如我們這樣一所大禮堂，若有一副對聯，能把此禮堂興建的時間地點、精神使命、種種活動，都包含進了。禮堂還須題一名，稱爲什麼堂，再加上一篇題記，或詠幾首詩，重要的實際人生都放在裏面。因此我們可以說中國人的全部人

生，論其兩漢以下，主要還不是在二十四史裏，而是在各家的詩文集裏。如我們要研究范文正公、王荊公，根據宋史嫌不夠，還要讀范、王兩家的詩文集。縱使一首小詞，也不該忽略。因是整個作者之心情性格，生活的率真細膩處，都透露在這裏。如李後主，乃一亡國之君，在歷史上短短幾句便完了。但他亡國後的一段生活，卻盡在他的詞裏傳下。到今天，我們對李後主當時的內心生活，還如和他對話般瞭解他。

我常講西方人是有了他的文學作品而成其爲一個文學家的，中國則是由於他是一文學家而寫出他的文學作品來。西洋文學中一篇小說、一部戲劇，把作者姓名掩了，價值一樣，仍是一文學。研究莎士比亞，不要詳細知道莎士比亞這個人。直到現在，莎翁生平還是無法研究。但無損於莎士比亞作品裏的文學價值。也有人說：惟其在他作品中，不見有其人，所以其文學價值才更高。中國如杜工部，如蘇東坡，卻是作家和作品合一的。從杜詩裏，表現出杜甫的私人生活及其整個歷史背景。開元、天寶，天翻地覆，轉徙流亡，悲歡離合，都在詩裏表現出。他不是寫時代歷史，只是從他這一顆心裏，表現出他的日常生活，乃至天下國家一切事。從他一心到身到家，夫婦子女，親戚朋友，乃至國家天下，合一融通地表現。這裏十足表現了一種中國的儒家精神。我們若不懂中國文學，也將不能認識中國文化。拋棄了中國文學的舊傳統，也就等於拋棄了

中國傳統文化中重要一項目。或許此刻要的是新政治、新文化，文學也該推陳出新，但我們要研究中國文化，至少這些傳統終是不可忽。

再說到藝術。從前在北平常同朋友討論到東西文化問題，有人說：「文化沒有不同，只是西方先走了一步，中國走後了一步。西方是現代化了，中國只相當於他們的中古時期，我們再進一步，也就跟上西方現代化了，這裏並不要爭東方與西方。」我曾問：「怎樣叫中古時期的文化？怎樣叫現代文化呢？」這位先生舉個例倒很好，他說：「從前朱子註論語，論語本文用大字，他的註用雙行小字。現在我寫哲學史，提到論語本文低兩行，我自己的意見理論便抬頭頂格排，引古人文用小字，自己寫出的用大字。這是現代精神。」我說：「原來如此。」我們這幾十年來的學術界和思想界確是如此，我們實該自己負責任。我這次來，特別高興，看到故宮博物院，陳列出這許多東西。但我要問：如繪畫，是不是中國畫只是中古時期的，西洋畫始是現代的呢？又如中國的磁器，有宋磁、元磁、到清磁，從這些上可以寫一本很詳細的磁的歷史演變，即從這裏，也可把整個文化反映出來。那麼是否說塑膠才是現代化，中國磁則只是中古時期呢？講文化不能排除了藝術，從藝術品上，也可推究到東西文化精神之不同，不能拿中國的一切都派在中古時期，西方即是現代化。這中間應該另有些不同。

建築也一樣。這廳建築顯然是東方式。我今天來看中山大樓，一進去就覺得十足的中國情調。我是一個中國人，進中國式的建築，只覺開心。住進外國房子裏，好像總有點不對勁。西方洋樓，四面開窗，叫人儘注意外面去，樓與樓之間則須有相當距離。那是十足的帝國主義向外殖民的精神表現。他們中古時期的堡壘，也有他們當時的文化背景。中國一佛寺，和外國一教堂，同樣興築在中古時期，畢竟還是有不同。他們的建築都帶有征服式，中國的常是「和合式」，天人合一，使人居之安。

四

我們講思想，講歷史，講文學，講藝術，從多方面來講文化，又應懂得「統之有宗，會之有元」。這兩語是三國時代王弼說的。講文化從多方面會合起，這裏面有一個宗，一個元。「宗」是一中心，「元」是一起頭。我們說文化精神，也如說文化根源，文化的會合點。我們要知道，在中國人中產生了孔子與老子，在中國佛教中產生了天台、華嚴、禪三宗，在中國歷史上產生了傳統的中國政府，以及中國的文學與藝術。並不是孔子來創造了中國文化，乃是由中國文化來創造出孔子。因有了中國人才有孔子，不是有了孔子才始有中國人。亦不是先有了一套文學來影響中

國人，乃是由中國人來表現出這一套文學。我們且不從深處講，再講淺處，要研究一民族，該懂得有民族性。如中國學問藝術傳到日本，日本人很保守，一器物，一禮俗，他們都看得重。近代中國人看見自己中國的，遠不如日本人看從中國去的那樣隆重，那樣興趣濃厚。但日本人說：「我們的文化，雖從中國來，但是日本化了。」這話也對。中國文化到韓國，到越南，到各地，都會變。西方的到中國自然也會變。主要是在變中有個「己」。即就中國自己的來講，如文學，如藝術，如歷史上一切，由古到今，各有各變，不斷有變。我們該有思想史、社會史、政治史、文學史、藝術史、經濟史等等，從這些知識會合起來認識我們自己的文化就比較方便些。可是這些工夫，我們都沒有好好做。現在來講中國文化，都得看第一手原料，運用一個人的心思來融化，來闡釋，豈不難。研究西方的，省力方便多了。要知道希臘，有各家的書在那裏，不用直接去讀希臘文，也可研究。中國古代文字直沿用到現在，不需另研究孔子時代或書經時代的文字。然而這些材料，卻都沒有經過現代中國人的細心研究。

說到現代，真是變化太快了。而現代的中國人變化更快，對自己三千年傳統厭了懶了，誰也不肯用心去研究整理，隨口謾罵，便是前進開風氣。置之不理，也不失為現代化。聰明精力，誰肯向這裏去鑽。說什麼是中國文化？鴉片煙、女子裹小腳、麻雀牌、太監、姨太太、算命、風水

等，諸如此類。當然我們不能不承認這些是從中國文化裏面表現出來的。但女人裹小腳，雖足爲中國文化詬病，今天不裹了，難道中國便是有了新文化了嗎？現在不抽大煙，不又是新文化嗎？而且幾百年前中國人既不抽大煙，也沒有打麻雀牌，那時的中國文化在那裏？小言之是這些，大言之，則說「打倒孔家店」。但孔家店易打，中國文化卻難打。在中國文化裏，尙還有老家店、莊家店、釋家店，很多店舖在。偌大一條街市，打倒一月半月店舖，打不了整街市。我說打孔家店省力，也有道理。論語雖是中國社會一部人的讀物，現代化的前進學者，拿著西方的政治、社會、哲學、科學一大堆新花樣來講，只知讀論語的，講不過他們。又如從論語中拿出一兩條，如「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之類，把孔子說成另一個樣子。一時人不肯叫孔子，要改口叫孔仲尼、孔老二。孔家店的老闆孔子便如此般打倒了。但這只是新的知識分子欺騙無知識分子的勾當。孔家店裏老闆易打，孔家店裏小伙計卻不易打。如要打顏淵，顏淵誰懂得，也易打。但像今天大陸忽然上演海瑞罷官，海瑞只是孔家店裏一個小伙計，還輪不到二級三級，但這齣戲演來，大家都認爲對，毛澤東也著慌了。因海瑞不是一貪官，他又敢於講話，不貪錢，不怕死，這兩件就夠。他已深入人心，叫你打不倒。我們且莫講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題目太大，便由得你一人講；但遇到一個孔家店裏的小伙計，你要怎樣打倒他，卻會感到不易打。

因此若我們要講中國文化，該從多方面，長時期，集體合作，重新研究，不是講哲學便能講盡了中國文化，也不是講歷史、講文學、講藝術便能講盡了中國文化，並且在藝術、在文學、在歷史、在思想哲學各方面，還得各各分別研究。近代西洋，任何一門學問，都經過了一百、二百年，很多人心力，才有今天。即如讀一部西洋通史，從民初以來五六十年中，西方中學、大學裏所讀的通史已有了幾多變化，編了又編，改了又改，成爲今天這個樣子。在我們只憑一兩個人，在一個短時期中寫出，到底不行。我們也要經歷一段長時期，多有人努力，又經自然淘汰，每一方面都有比較靠得住的人起來講話；如是集體合作，再經會合，才能對自己文化有個認識。我想「復興中國文化」這個重擔，應該挑在知識分子的肩膀上，但要有耐心，用苦力，不然我們會永遠比不上西方人。兩邊碰頭，問莎士比亞，他那邊總會有人源源本本詳細細細來講。問杜工部，我們這邊真要找一人能講，卻很困難。講藝術，你問他這幅畫，他會說。他問我這幅畫，我也要找一恰當人，能講能說。現在我們勝過他們的，是我們能看他們的書，講他們的話，中國人中要能讀英文，能講英語的，多的是。你找一個美國人，問他中國字，就不行。可是現在他們也來慢慢地學中國話，讀中國書，將來中國方面的學問也要問他們。現在中國優秀青年到美國去讀中國文史藝術學位的人已多了。在美國得了學位，才能回到中國受人重視。所以我們的大學文科畢業

生，也只有留學外國，才能有出路。若只在自己大學裏面畢業，大家看不起。我昨天去故宮博物院參觀，正在看象牙雕刻；這比看磁器，看書畫，要簡單容易得多；後面有兩個人在講話，一人說：「中國人能做出這麼精細的東西嗎？一定是外國進貢來的。」我想我們此刻要來提倡復興中國文化，遠的不講，講近的，先該能移風俗，轉人心。文化是不容易講的，即講文學，一首詩，一篇散文，有時也會講不明白好處何在，又誰肯來承認你講的價值。但是一個象牙雕刻擺在那裏，他不得不佩服，可是他又認為中國雕不出來。那麼怎會在中國的皇宮裏呢？他說：「這是外國進貢來的。」他能這樣講話，可見他也是一個知識分子，並非一無所知。

這些例，深深淺淺，遠遠近近，可以舉出很多。有一年在廬山避暑，一位朋友，第一次新見面，他問我：「在美國那個大學讀書的？」他是美國留學生，他說：「我怎麼不知道你呢？」我說：「我沒有到過美國去。」他說：「不必客氣，我和你很熟。」我說：「我們初次見面呀！」他說：「你不曉得，我在家裏教兒子讀論語，就選定了你的大著論語要略。」這位朋友自和一輩美國留學生不同，他要叫兒子讀論語，而且是他自己選定了我的那本論語要略，所以他說：「我同你很熟，你不要客氣。」下面一句話，卻是一句時代的心聲。他看重我，所以想我也必會去過美國。這是三十年以前的話了。一切事有前因，有後果。我們今天結了些甚麼果，都是有原因

第一點，我們要真做一個中國人，才能來復興中國文化。復興中國文化這一責任，便在中國人身上。沒有了中國人，就沒有中國文化。此如沒有了希臘人，希臘文化轉移到其他民族身上，究已不是希臘精神了。在抗戰時期，我在成都華西大學一個茶會上歡迎某先生，談話中涉及到中國人問題，他說：「現在我們不是要做一個中國人的時候了，我們該要做一個世界人。」我說：「生斯世，為斯世人，自然我們都該做一個世界人，但我們應以中國人身分來做世界人，不是以美國、英國人身分來做世界人。」若今天先抹殺了他是美國人、英國人、法國人、蘇維埃人、日本人、印度人、中國人等差別，來做一個世界人，此事不可能。今天我們參加聯合國，也拿中華民國地位來參加，尚不能沒有其他國別，只有一聯合國。所以第一點說我們首先希望是大家要做一個中國人。把今天一般現象來看，我們中國人在其內心深處，好像並不希望真做一個中國人，似乎模模糊糊地在不知不覺之間便不像一個中國人。中國人有姓有名，現在的中國人卻都改了名。C·P·黃、喬治張，這樣的稱呼早已很普遍。我在香港去看香港大學的中文系畢業試卷，全部中文系學生都不寫中文名字。如寫C·K·王，他還保留一王字，我知道他是個中國人。也有純粹用英文的，王字也不見了。我想這是那裏來了一大批青年來學我們的中國文學呢？我到馬來亞大學去，那裏的中國青年，姓名都變了更不用說。馬來人、泰國人很想把大街上中國店鋪懸掛的中國

字招牌都禁止，中國人很不高興，但中國人自己的中文名字卻先自取消了，這不是一塊十足的中國人招牌麼？在日本，那裏的中國字招牌卻還多。以前在大陸，縱使內地交通不便，外國人少到的地方，也有些店舖在中國字招牌上加上一些英文翻譯。好像沒有英文字的招牌便使這店舖地位降低，不值錢。我曾想，那些改用英文名的人，將來成了人物，寫進歷史，那不是明明一本中國史，也變成了英國史、美國史了嗎？我想我們此刻要來復興中國文化，不如先來一個運動，要中國人用中國姓名，不要改寫英文字。這個運動很簡單，我們暫不講孔子、孟子，這些太高了。我們且先做一個孔家店跑堂的，開門的，掃地的，總可以。我們先來做一個中國人，簡單一點，先來復興用中國姓名，好不好？

其次是講中國話。譬如在香港，中小學生都講英語，有時叫一輛汽車，開車的也講英語，這都不管。隨便說句話，中間不重要處用中國話說，遇重要處便定改用英文，好像用中文便表達不出這個意義；這一層影響可大了。我們自己的招牌改稱C·K·王，這可在外國通行，到外國去，入境問俗，把自己名字改一改，還可以。但他硬認為他心裏這個意思，用中國文字便無法表達，講中國話和他不對勁，不合他心意；如此一來，不僅中國是一次等國家，中國民族便是一次等民族。碰到學術上，理論上，高深一點的，非用英文不可。而且用了英文，他心裏會感到舒

服、痛快，那影響卻真不淺。我想我們能不能講話要講中國話呢？有些，如yes、no之類，講英文也不打緊，但講到一句重要話，就非講中文不可。如說「三民主義」便就說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就說五權憲法，不該翻譯了英文講。像此之類，說仁道義，「仁」和「義」也是中國文化的一塊招牌，我們該用中國字講中國話。現代西方學者，講到中國學問，他們就只繙音，有時還注上一個中國字。如孔子講「仁」，老子講「道」，他們都繙音。中國人更客氣，認為他所講全是英、美人意思，不是中國人意思，所以簡直就滿口講英語！所以我說，要復興中國文化，先來多講中國話，好不好？

進一步，我們希望做中國人要做一個像樣的中國人。今天我們當然全都是中國人，可是已經不像樣。要做一個像樣的中國人，又要做一個能繼往開來的中國人。若我們做一個學者，當然要了解過去，適應現在，開闢將來。就如佛家禪宗不立文字，掃空一切，但也要講過去，或從達摩或從慧能講起。也要講將來，要說將來的人生就是佛教的人生，將來的佛教就是禪宗的佛教。任何一個知識分子，講一句話，不能沒有過去，沒有將來。可是今天我們講一句「復興中國文化」，立刻有人來責備說：「你不要想復古呀。」只要一講到孔子、老子，便是要復古。從前人儘講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他還可不失為是一通人，還可是當時社會裏一個人，還可

承先啟後，做一有事業的人。我們今天，好像一講到中國的過去，就會關閉了將來中國的路。講過去也該罵，不該捧；只該批評，不該稱讚。這已成了風氣。我最近也曾寫過一篇文章，說到復興文化不是要復古，就得到好多朋友說好，說：「你講得對，這句話真有道理。」但我並不歡喜聽這話，復興文化不是要復古，但更不是要蔑古，現在一般人，一聽你說復興中國文化，就恐怕你要復古。但任何一種文化，總有個來源，總帶有一些古的存在。你不能堵塞了它上面，專來講下面。我們似乎先有一種害怕，也可說先有一種猜疑，古總是復不得，中國已往一切總是要不得。你講中國文化，他便要問你：「對民主政治抱什麼態度呢？對現代科學又是什麼看法呢？」這些話叫人無法回答。在他心裏，顯然中國文化是反民主、反科學的。他在時代風氣之下，不知不覺存心如此，無法對他有解釋。有人說：「我們總統講復興中國文化，才是最好不過的，他也不覺存心如此，無法對他有解釋。民主是世界大潮流，科學是現代大貢獻，要講復興中國文化便不能不講科學和民主」。這是「五四運動」以來所謂德先生、賽先生。這幾十年來人人的腦子裏，只有這兩位先生，佔了很高地位，中國文化則所佔地位很低。若我們能有民主和科學，其實中國文化復興與不復興是沒有關係的，這已成了一種社會心理，已經幾十年到如今。要轉移風氣，談何容易。

老實講，「復興中國文化」這六個字，從民國元年到今天，還是第一天正式唱出口。而居然

在此地的知識分子，乃至無知識分子，沒有一人出來反對，這可說是民國五十多年來第一個可喜現象。我們今天，也只有在國外，儘使我們國家復興，明天回到大陸去，試問我們將帶些什麼回去呢？只帶了科學和民主回去嗎？倘使我們沒有一些中國自己東西帶回去，這和美國、英國人進中國有何不同呢？所以我們真能復興，最重要的應該即是我們今天講的「復興中國文化」這一句口號了。要復興中國文化，就該改造今天的社會，但也得慢慢地改。要發揚中國的文學和藝術，此事已不易。歷史則待後來人去寫。哲學思想須待新興的哲學家思想家來提倡。你要講一番孔子之道來給大家聽，其事亦易亦不易。但若演一部電影，能配合上中國文化的電影，便大家要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此事似乎最易不過。為什麼大家愛聽紹興戲，勝過聽外國歌劇呢？這些我們該先提倡。而且也與科學與民主無關，無傷大雅，這樣便慢慢接近了中國文化，從這個門可以跑進那個門。孔家店裏的陳舊貨物，也可由此推銷。像大陸上演海瑞罷官，海瑞罵皇帝，便是一例。我想那些道貌岸然講民主、講科學的先生們，也不會站起來反對吧！

六

但我上面說及中國文化有一點最重要的，就是所謂「人生修養」。關於這一點，我還得再講

價值。沒有這信仰的人，孔子稱之爲「鄉愿」，「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孔子說，這類人是「德之賊」，他們是賊害道德的。不能發展個性，失卻成其爲一我。但人各有個性，大家發展個性，豈不成衝突？孟子說：「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心有同然，我這個心就是你這個心，孔子時代的心，實在還是我們今天的心。我們今天的心，仍和孔子時代之心相同，所以孔子可以了解到我們，其實我們也該能了解到孔子。我這個心可以了解別人的心，中國人稱之爲「仁心」。因爲大家同此一心，所以同稱爲一人。仁者人也。我和你心相同，同此一仁心，故稱此爲「人道」。人道只是一仁，可是你要得到這一個仁心，卻要修養。孔子說：「巧言令色鮮矣仁。」你碰到另一人，話講得巧，面孔裝得討人歡喜，這心便是不仁之心。你看重了別人的心，拿自己的心看輕了，遮掩著自己的心，來討好別人的心。巧言令色，一面奉承別人，一面卻又想欺騙別人，在人羣中相處，不夠直道，不夠朋友，不夠做夫婦，做子女，不夠做人羣中一人。我爲何要抹殺了我來討好你？實際則又是在欺騙你，想要利用你。先抹殺了自己想來抹殺別人，結果人和我都被抹殺了，所以稱之爲不仁。所幸者，這個不仁之心，實際並不是我的心。心有所同然。張眼一看，梅蘭芳上臺了，大家鼓掌，覺得他漂亮。放開耳朵聽，梅蘭芳在唱，大家心裏喜歡，他唱得好。這是一種藝術心情，大家自心發出，沒有外邊力量在推動。吃東西也一般，人家

都說吃悅賓樓菜好。即顯推微，人人有一個共同相類似的心。你抓住了這個心，即等於抓住了我和他，抓住了一切人；因我這個心也即是你這個心，你抓住了我的心，不是我便會由你推動嗎？

中國人對於人心研究是高深的，此刻我們不能向深處講，且問人類這個心由那裏來？那自然說是天生的。西方人說上帝創生了人類，中國人說天降生了人類，又賦予人類以此心。因此我們也可說，我心即天心。天就在我我身上，就在我我心裏。天人合一，沒有天就沒有人，沒有人也就不見有天。莊子說：「惟蟲能天。」天生一條蟲，蟲無心，也可說蟲心簡單，所以他還保守著天生他的這一個真，還是本來的一條蟲。天生人，卻反而失去了他的天。爲何呢？人有很複雜的腦子，有思想，有慾望，有一切改進，但改進不已，忘了本然，失了這個天，想離開了天來獨立做人，還想打倒了天來自由做人。故莊子說：「惟蟲能天。」這是批評我們人由聰明而愚蠢了。一隻螞蟻，能不失天生本然，但人卻早已失去了他的天生本然了。中國人的理論，要人在天生本然上求進步。忘了這個天生本然來求進步，愈進步，離天愈遠。一棵樹，只從根上能開花，不在花上再開花。中庸上說：「盡己之性，而後可以盡人之性；盡人之性，而後可以盡物之性。」科學盡物之性，但先得要盡己盡人之性。一顆原子彈扔下，一切都完了，盡了物性，卻反了人性。人可以發明科學，科學不能發明出什麼來。正如一棵樹可以開花，花卻開不出什麼。現代西方人拚

命造原子彈、核子武器、太空船登陸月球，只求科學無限進步，但忘了盡人性。好像一樹，花開爛漫，儘在花上想法，根卻壞了。今天的世界危機，實在很大。

從前我年輕時，人們穿一件袍子，不論窮富，年紀大一些的，穿十來年很普通。中國古代，像晏子，三十年只穿一皮袍。今天不行了，工廠裏爭著出貨，第二批來排斥第一批，過兩年一換衣是尋常事。有人在想種種方法使你非換不可。這不是我必要換，外面有一力量在推動。卻反說是我們幸福了。說穿一句是要賺你錢，賺錢成爲人生目的。中國人也曾發明了印刷術，那是世界文化一道奇光。西洋的文藝復興，就是靠的印刷術發明。但今天的印刷術儘發展下去，又不得不，會變成洪水猛獸。在紐約每天看一份時報，這樣一堆紙，怎樣看？而且翻看後急得丟。新書不斷地拋出，舊書匿跡了。有些書，不到大學圖書館翻不到。舊書再版，真是困難之極。但你到小菜場，五光十色，雜誌、週刊，擺得滿攤滿架，看得天花亂墜，卻說這是民衆讀物。但有些讀物卻是毒物呀！說電影吧，一部推出一部，但總不會叫你百看不厭，甚至再看第二遍。若一部電影，可以屢看不厭，那電影公司將會被關門。我小孩時看水滸，真是看得百看不厭。但現在人說水滸是中古時期作品，是中國舊社會作品，現在是科學時代工商社會了，看小說也得看了一本又一本，把你心看昏看亂。現世界人類的智慧和品德，一切人生的意義和價值，就爲出版物太多而

忠恕，講愛敬。忠是拿我十分力對待你，恕是我所不喜歡的不加到你身上。講到愛敬，天下那有一人不喜受人愛，不喜受人敬？但我想孔子講忠恕講得更好，因我對你忠，對你恕，只盡了在我一方面的心。孟子講愛敬講得較淺了一點，較薄了一點。他說「愛人者人亦愛之，敬人者人亦敬之」。這當然也是個真理。你不愛他，要他怎樣愛你？你不敬他，要他怎樣敬你？然而沒有像孔子講得更高些，我盡我力量忠於你，下邊一句沒有了。孟子要開導人，把下邊一句也講出來，說：「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也許有人問，別人不敬你不愛你又怎辦？這仍得回到「盡其在我」。我儘愛他敬他便足。若有人問為什麼要這樣？孔子說得諄厚，孟子加以明白發揮，直從人的心坎處加以發揮。所以說：「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又說：「盡心知性，盡性知天。」性是天生的，你怎樣能知道你自己的性？因此要盡你的心。自心不盡，天生給你的性，自己也不知道。盡了我心，可以知我之性；盡了我性，便可以知天。這叫做「天人合一」。天不獨只生我一人，你就知人家同我一樣，中國人講的最高道理在這裏，在從每人自己心上講起，「成己」而後可以成物。「知天」近是宗教，中國人有一種極高深的宗教精神。盡物性是科學。中國人所提前發展的是一套人文科學，最基本的修養工夫在「盡其在我」，「盡己之性」。從這一點發展出來，就可成為中國人講的世界大同，天下太平。在世界未大同，

天下未太平之前，每人仍可自盡己心，修養到最高境界，便即是聖人。

八

中國儒家對聖人，有兩個看法。一是朱子，他說聖人難做，後代聖人更難做。朱子的話是聰明的，孔子在春秋時代做聖人省力些，若生在朱子時代要做一聖人就比較要困難些。若使孔子生在今天二十世紀的中國社會，要做一聖人怕會更難了。這是朱子的講法。另一個是王陽明的說法。孟子說「人皆可以為堯舜」，朱子並不反對此說，只說是難。陽明則說得似乎比孟子所說更易了。王學後傳有羅近溪，他正在講臺講「人皆可以為堯舜」，外面一端茶童子走進來，把一杯茶放講臺上，出去了。聽講人問：「他也可做聖人嗎？」他說：「他已是聖人了。你們看他走進來，目不斜視，一心一意，沒有滑跌，杯裏茶沒有潑出，走到這裏，放下茶，他又如是走了，端茶是他的職，他已盡了他的職，也盡了他的心。若使孔子來代他端茶，也不會比他端得更好些。」這個道理，陽明早說過。陽明到了龍場驛，生病了，半夜裏想，我這樣的生活，若使孔子來做我怎辦？他想得大徹大悟，一跳起來，全明白了。「良知」兩字就是這時候提出的。我們看禪宗故事，也頗有這樣的趣味。禪宗也說人人可以「立地成佛」。但我們生到此世，雖也不能沒

中間有一段很大距離包容著。這一極端是上帝，那一極端是魔鬼。上帝只一個，魔鬼怕也只一個，人在中間，有的九分近魔鬼，一分近上帝；有的九分近上帝，一分近魔鬼；但若這個人從魔鬼身旁轉移一步近上帝這邊來，這是善，這是在向上。儼使這個人從上帝身旁轉移一步近魔鬼，這是在墮落，甚至是喪心病狂，是惡了。所以中國古人說，一念之間可以爲「聖」爲「狂」。後代中國人則說端茶童子也是聖人，又說「衣冠禽獸」。這些話不是極端話，卻是中庸話。

孫中山先生說「知難行易」，「知難」是近在朱子這一邊，「行易」是近在陽明這一邊。現代的中國人，最不成也沒有被魔鬼拉去。只要能自心一轉跨離一步，這就是復興中國文化的大道。這一步大家能移，這一心大家能轉。我們該拿這一點來勉勵自己，來勉勵我們的子女、學生、親友，乃至社會上大多數無知無識的羣眾。這條路，應是復興中國文化一條大路。努力知難方面，並不身分更高，責任更重。著意行易方面，並不身分更低，責任更輕。要更深更細來闡發中國文化，這需要學問，讓一些人到圖書館去多寫幾篇博士論文，乃至傳世鉅著吧！我們也來講復興中國文化，應該採取第二條路。換言之，我們應做中山先生所說的「後知後覺」乃至「不知不覺」，來從「行易」方面立刻起步。我這兩小時所講，提出了不少問題，請諸位批評指教。

（民國五十五年十一月臺北陽明山莊講演，五十六年六月香港人生雜誌三十二卷二期。）

六 中國文化特質

一

諸位先生，今天我的專題報告，是中國文化特質。

我將爲中國文化安上一個新名稱，稱它做「唯心文化」。這「唯心」二字，並不像西方哲學上所稱之唯心。我只說：中國文化是特別注重人文本位的。而在人文本位上，則一切是以「人心」爲主的。所以我特稱中國文化爲唯心文化。

中國人把心分作兩項看。一項是「人心」，又一項是「道心」。其實只此一心。自原始人類爲著向自然界爭生存而發展出的心靈作用，中國人稱它做人心。此項心靈作用，人人俱有，這是屬於軀體人生物質人生方面的。若沒有了人心，也不會有今天的人類存在。

事的便是惡。如何稱做好，這亦有一個客觀標準，對人有好處，至少沒有壞處的便是好。反面的便是不好，便是惡。人人都希望別人對我有好處，無壞處，那裡會自己對別人卻總希望有壞處無好處的。在此便見人心同然，而人類天性之善亦見了。

中國人對人類德性上，主要在分別善與惡。在人品上，則主要在分別君子與小人。存好心，行好事，便是君子。存不好心，行不好事的，便是小人。在這人羣中，君子多過小人，便是合理想的好時代。在這人羣中，小人多過君子，便是不合理的壞時代。但從人類長時期的歷史過程中看，不幸的是壞時代反多過了好時代。不然的話，在人類歷史上，那裡會來許多的戰爭殺伐，那裡會來許多的黑暗紛亂，那裡會來許多的亡國滅種。所以中國人的文化理想，主要在教人做君子，不做小人。存好心，行善事，來輔長此人類文化大道之演進。

中國人說：「爲善最樂。」存好心，行善事，至少自己不吃虧。善的人生，從人心內部言，是可安可樂的。中國人教人尋孔顏樂處，孔子、顏淵兩的人生，始是最可安，最可樂，而且又是不難學。每一人不能都成大富大貴，但每一人都能學得孔顏爲人之人人生樂處。主要則在知與不知，學與不學，這一分別上。

三

中國人的人生理想，或說文化理想，主要即在找尋出一種「可欲」的人生，即是可安可樂的人生，而又是人人可能的。其主要關鍵，即在各人內部自己心上，而外面一切環境一切條件，皆可不計較。換言之，即是外面一切環境，一切條件，都不能強迫我不存好心，不作好事，不爲一善人君子，來過我這一分可安可樂的人生。若存惡心，行惡事，作爲一惡人，在他個人論，此一分人生，究是不可安不可樂，不合人生理想。從大羣集體論，惡人惡勢力，縱能得意於一時，斷難維持於久遠。此爲討論人類社會歷史文化問題所當首先承認的一項不可顛破的事實，亦爲首先所當具有的一項不可搖動的信念。

中國人之文化理想即在此。此處理想，並不從純理智的純思辨的哲學中得來，亦不從某一宗教的信仰中得來。至於近代自然科學，探討各項物理，縱極廣泛細密，凡其所得，只能供人類文化之使用，乃是功利性的，斷不能作人類文化之指導與主宰，因其非出於人類之共同內心的。人類文化理想，主要只能從人事上求，一切人事，主要只能從人心上求。但亦不能從各人個別的私心上求，只能從羣體大我共同相通的公心上求。在大我公心中，仍可有小我私心之存在。但當

由共同的公心來滿足各自的私心，不能由各自的私心來毀滅了大羣共同的公心。中國人此項文化理想，可由各人反身向內各看每一人自己的心，可以在同時廣泛觀察大多數別人的心，可以看古今中外的人類歷史，其間治亂興亡之大經過，則人類此一共通而廣大而悠久的心，此即是人類的文化精神，便可昭然若揭了。

四

中國人此番理想，似若空洞，但極切實。似若遙遠，但近在各人腳下，即可當下起步。而且每一人可以不問外面環境條件種種複雜情況，只從其一己之內心而成爲一君子，一善人，而獲得其理想圓滿的人生。即是說，每一人，在各別環境，各別條件下，可以各自完成爲一上上第一等好人。因此，中國人此一番文化理想、人生态理想，乃是極自由、極平等，而又是極博愛的。

但做人，須得每一人各是從頭做起，前人的經驗，只能做自己的榜樣，不能在前人的做人成績上繼續做下。不比財富權力，可以憑藉前人，富上加富，強上加強。因這些都是物質的。但物質上的進步，必有一限度，富強之極，轉爲貧弱，甚至衰竭滅亡，歷史上不乏先例。至於精神方面之進步，與物質進步有不同。對中國文化理想有誤會的人，易認爲中國文化守舊不進步，或疑

其文化力量不充沛、不雄厚。其實中國歷史已歷延了五千年，在同一文化下所薰陶之人口，已逾七億以上，而又常能保持爲一統一的國家，這都由中國文化理想可久可大之潛力所形成。在此期間，世界上不少其他民族，此起彼仆，或則停滯不前，或則消失無存。通觀人類社會歷史，到目前爲止，求一能與中國民族已成歷史相比擬的，實尚不易。此實中國文化理想有其值得加以研討之眞價值所在之一項眞憑實據，不容忽視。

在中國歷史上，亦有不斷曲折，不斷反覆。有它的興盛期，有它的衰亂期。但每逢興盛期，中國民族常能適可而止，從不走上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路線。由於種種形勢相逼而走上了衰亂期，亦常能在其文化潛力中自求更生，蹶而復起，又回復到它已往的文化傳統，而繼續生長，繼續向前。

最近的我們，更是處在世界人類一個前所未有的大動盪之旋渦中，飽經憂難。對自己民族文化傳統理想，不免爲一些淺薄的功利觀點所搖動、所引誘，人心惶惑。在其表面浮層，波濤迭起。幾乎像有一種一反故常的完全新面目出現。但此亦不過是一種時代的激變狀態，不要忘了在其背後，尚有人類歷史文化演進之大趨勢，與夫中國民族自身積累深厚之一番文化潛力。物極必反，事不在遠，在中國民族之內心深處，實都抱有一番堅強無比之自信，可以隨時暴露。

動物無心的。但要之此心一切活動，仍只在軀體物質生活之範圍內，則人與其他動物依然無別。

但軀體生活是各別自私的，其所引起之物質生活，亦是各別自私的。如一杯水，一人飲了，他人即不得飲。一碗飯，一人喫了，他人即不得喫。而此一杯水一碗飯，亦只能解決每一人自己軀體之饑渴，不能同時解決別一人之另一軀體之饑渴。因此各別自私，乃是軀體與物質生活之惟一特徵。由於其各別自私，而引生發展出種種爭奪占有，乃至於戰鬥相殺。

但人類生活，漸漸由軀體各別之私生活演進到羣體共通之公生活，此乃人類生活與其他動物生活一種絕大不同點。其他動物，或多或少，亦有與人類相似之羣體生活。如一雌一雄配合，其他動物亦所多有。但不能如人類般由夫婦同居而演進到家庭生活，此是一相異。又如動物中之蜂蟻，有極嚴格的羣居生活，但發展了羣性，又犧牲了個性，不能如人類般乃由各別個性而演進到社會羣居生活，此又是一相異。

人與其他動物之最大區別，不在其軀體生活上，而在其心靈生活上。原始人類由於爲其各別自私的軀體生活而謀取外面物質供養之方便，遂逐步轉入羣體生活，而人類之心靈生活亦隨之逐步展開，心靈超出了軀體，既能視人若己，彼我如一，復能看重他人，更勝過看重自己，於是人類於自己私心外又增上了大羣的公心；此在孔子儒家，稱此曰「忠信」，曰「忠恕」，又稱之曰

與享受，如財利、權力，如富、如貴，此種生活，中國人頗不重視，不在此上來區別人生，而只看人類品格方面之區別。「人品觀」在中國人之人生觀中乃是一種極為重要的根本觀點。故中國人極重君子、小人之分，在君子一類中又有聖人、賢人、善人等多項等第。班固漢書古今人表上，把自古歷史人物分成上、中、下三等，每一等又各分上、中、下三等，共成九等。如堯、舜、孔子同是「聖人」，同列上上第一等。伯夷、叔齊、顏淵，皆無功業表現，生活窮餓至死，但同為「仁人」，列第二等。「智人」列第三等。至於歷代帝王公侯卿相大臣，列入下上、下中、下下三等的，不可勝數。可見在政治上地位貴賤，並不在中國人人品分類之內。貧富亦然。富人家業大則多納稅，因其徒為私人牟利，更不列入衡量人品的條件之內。

中國人之人品觀，專一注意在人之內在生活，即心靈生活方面。至於種種外在的物質人生，財富權力，地位勢望，私人各別一時所得，生不俱來，死即俱去，僅塗附在人生之外面，與其真實人生無關。真實人生，主要在其人之內心，中國人稱之曰「心地」，或稱「居心」。塗附在外面的人生只供別人看。發自內部，存在其內部的，始為其人之真實人生。中國人由此來衡量人品，亦稱此曰「德性」。德者，乃是其人之真實所得，得在其心，如孝子、如忠臣，孝與忠，皆在其心，乃是其人之真實價值所在。至於塗附在外面的種種物質與遭遇，並不是其人之真實所

此人生最高標準者，中國人稱之曰「聖人」。但聖人亦只是人類中一人，故曰：「聖人與我同類。」由於人同此性，故得人同此心，亦可人同此德。故「人皆可以爲堯、舜」，即是人人應可同達此最高標準之人生。此是人類文化演進一大目標。要使人人能爲堯、舜，人人能爲最高標準上上第一等人，此始是人類大同太平終極理想的境界。

此一人類文化理想境界，途程遙遠，但開始即可從少數人起步。縱在極黑暗紛亂之時代中，每一人仍可各自完成其個人之理想，先自完成爲一善人，乃至爲賢人、聖人。此種作爲，不在外面物質條件上，乃在其個人各自的心靈條件上。在堯、舜以前並沒有堯、舜，在孔子以前並沒有孔子，但在人類中，永遠有出現堯、舜與孔子之契機與可能。每一人只要從其內心能朝此方向而邁步，則人人可得爲孝子，並不限舜與周公始得爲孝子；人人可得爲忠臣，並不限比干、箕弘始得爲忠臣。若非人人得爲，亦即不得奉爲人類之共同理想與共同標準。所謂人人得爲，必是無時地隔閡，無環境相異，無條件懸殊，只要出於各個人之有志與自願。故中國人之文化理想，乃照顧到人類大羣全體中之各個人而同有此可能。故可不必待大羣人全體起步，不妨由各一人各自起步。故中國人之文化理想，乃是最博愛、最平等、最自由的。

中國人在此，又特別指出一「人心之所同然」來。人心所同然的便是善，人心所不同然的便

步，求今日必將不同於昨日而勝過了昨日，此一心情與此一努力，其勢所趨，將可使人做成不像人，不是人，而回不過頭來。中國文化中所重人品人德人性，貴同不貴異，貴常不貴變。君子善人，在本質上只如此，在數量上希望盡人如此，世世代代有增無減；決不能說今日之善，明日變成了惡，今日之君子，明日卻變成了小人。

在中國歷史上，亦不斷有曲折、有翻覆，但此一文化理想，縣亘了五千年，擴大到七億人口，非求變求新，乃是有常能繼。在其治平盛世，對外軍事，常是重防禦遠勝過重侵略，因此從不走上帝國主義的路線。在商業上，也只注重貨物交流，不重剝削牟利，絕不走上資本主義的路線。亦有衰亂世，或則經長期治平後，人心頹靡，失於振奮；或則外力驟凌，和平社會急切不易抵抗。但中國文化最富堅韌性，正為在任何時期地點、任何環境條件下，每一人可以擔負起復興文化大責，所以此一文化傳統，總是蹶而復起，衰而又盛，不致中斷。

最近我們是處在世界人類前所未遇的一個大變動之下，飽經艱難，但對自己民族文化傳統理想，則依然堅信，認為「剝極而復，貞下起元」不在遠。此即是中國文化之主要精神、主要生命所在。

（民國六十二年九月一日日本東京中日文化
研究會專題講演後改稿，並改今題名。）

所以我們中國人，「民族觀」與「天下觀」是同樣看重的。今天的我們，尙知有民族以外的天下觀，而不知看重自己的民族觀。甚至對於一個民族該不該有歷史觀，亦成了一問題。試問今天整個天下，那一處，那一人，不附屬於那一個民族的呢？而當前的中國人，只看重其他民族，看不起自己民族，亦可謂是僅存了天下觀，而湮塞了民族觀。就變成一個不重自己民族的天下人了。試問不看重自己民族，而僅爲一天下人，這一天下人尙何意義價值可言？

所以歷史既有民族史，亦必同時有天下史。一內在，一外在。內外相合，實成一體。那有有內無外的民族？更也何有有外無內的天下？所以「民族」與「天下」，是相互並起，一體相成的，中國古人稱之曰「天人合一」。觀於中國二十五史，夷夏並列，內外交詳，便是其例。

問：爲甚麼在現代社會中，仍要有歷史？換言之，在今天利益、工商掛帥的社會裏，歷史有何助益？

答：西方人重向外通商，所以也知重經濟觀，而比較不看重歷史觀與民族觀。但是每一社會總脫

問：對臺灣四十年來的發展，感想如何？那些值得珍惜？那些今後要避免再犯？

答：臺灣四十年來的發展，似乎在物質生活上，在商業經濟方面，有出乎意想的進展。但在人文精神上，在羣體生活的教導上，與其物質生活似乎開始要走向一條正相反對的路，這是我認為最可擔憂的。

我覺得四十年來開始能服從一個政治領袖的領導，像故總統蔣公，獲得全體臺灣人民的愛敬。這一段歷史，是最值得珍惜的。臺灣之能有今天，不能不說是當年那種上下一心攜手共進所埋下的基礎。

現在似乎個人主義的意味逐漸伸展，由合到離，由和到爭，這也是最可擔憂的。

問：若從歷史中借鏡，臺灣應如何掌握未來的方向？

答：臺灣問題最主要的還是一個民族問題，臺灣人徹頭徹尾應該是一中國人。所以全部的中國文化傳統觀念，應該是臺灣人所當尊重保留的。臺灣將來的前途，同樣在全部中國民族歷史的前途中。遠離了中國民族傳統的精神，臺灣的前途便會感到可憂可怕了。換言之，臺灣人沒

有廣大深厚的「中華民族觀」，就沒有前途可言。他決不能脫離了中華民族大體，而單獨有他臺灣人自己的前途。

臺灣是屬於中華民族的，中華民族未來的方向也就是臺灣未來的方向。我認為臺灣脫離了其民族大體，即中華民族，是決無可喜愛可希望的前途的。

當前臺灣與大陸對立，大陸共產政府正在毀滅自己中國傳統文化，轉向西方。而臺灣的立場，正在要求保存中國固有文化，發揚廣大，來對大陸加以挽救與革新。故當前的臺灣，尚不能以僅只保留中國固有文化為滿足，更當加以發揚光大，在此世界的新形勢中，來一番自己傳統文化的更新與創闢。不僅要把來對付大陸，更應該能把來對付全世界異民族的新潮流與新形勢，這纔是當前臺灣自力更新的大責任大希望所在。

問：我們該如何培養年輕一代的歷史感？

答：如何培養年輕一代的歷史感，主要就在培養年輕人的「民族情感」，便該培養年輕人民族歷史民族文化的觀念。其他一切有關此方面的，如道德、倫理、文學、藝術等各種創闢各種修養，都是極關重要的。從具體方面講，最主要的，如固有的家庭制度、宗族觀念等方面，皆

答：人生最重要的是「文化」問題，並不只是經濟與政治問題。所以人生最應看重的是「民族文化」的傳統，政治與經濟只是包含在民族文化內的兩項。與整體民族文化比較，政治與經濟只是次要的問題。

如單就經濟與政治兩項來講，也應有先後緩急之不同。經濟只應附屬於政治之下，不應把來放在政治之上。

幾十年來的臺灣政府，太看重經濟了；現在又看重講民主政治，民主政治是應該在經濟問題之上，但不以民族文化作基礎，一切政治都會有流弊。政治不能穩定，徒求發展經濟也流弊極多，不勝枚舉。今天的臺灣，已經顯現出種種流弊了，不需再多加說明。

問：今後之中國如何再造華夏生機？

答：今天的中國人，無論信奉資本主義或信奉馬列主義，要之，都遠離了中國文化傳統。你問我此後的中國人如何再造華夏生機？我認為只能從尊重歷史本源、發揚文化傳統做起，除此之外，沒有第二條路可走。

說到尊重自己本國的歷史本源及發揚本國文化傳統，首先要從「認識自己」做起。這又是一

樣，失去了自己傳統，也就談不上所謂「風格」了。

問：中國統一之前提為何？

答：我堅信中國必將統一，必將是「和平」的統一。我認為將來統一的主要前提，在我全體國人對自己民族已往傳統文化之自尊自信，以及略知隨時改進上。除此以外，國家不會有前途。這一信念，是我終生所信奉的。

至於如何來培養國人的自尊自信，以及如何懂得隨時改進？這有關整個國家的教育問題，說來話長，無法在此作詳細的回答。簡單的說，中國傳統文化精神看重人的「性命」勝過看重傳授知識，所以中國傳統教育精神重在教人做人，重在教人如何與大羣相處。從做人的角度出發來講教育，才可培養出自尊自信，愛國家愛民族，在家能為賢子弟，在社會能為奉公守法的好國民。不幸的是，我們今天的教育已遠遠了這一傳統文化精神。而大陸的教育，更徹底摧毀了這一傳統精神。所以我常說，從近處看，國家前途多艱，難以樂觀；而從遠處看，我是充滿樂觀的。因為我堅信國家未來前途只此一條路，沒有第二條路。我更深信將來國人必會回歸此途。

這問題只能談到這裡。我過去已說得太多了，沒有更多的話可說。

（民國七十八年三月答某基金會問，時年九十五歲。）

孔子曰：「政者正也」，脫離了道德，便不再有政治。

故孟子言「仁政」，言「善政」，政治之終極標準，仍脫離不了一善字，一仁字。

就中國歷史言，大政治家項背相望，卻沒有一位可稱為政治思想家。

一則中國學人，實際多數都已參加了政治。二則實事求是，不在多言。三則學貴融通，政治不能脫離了人生大道而獨自成其為政治。因此，在中國文化傳統裏，乃不能有一個關著門專門從事於著書立說的政治思想家。

若說中國沒有一套完整的政治思想，正猶如說中國沒有一套完整的哲學思想般；但自秦以下二千年，中國文化在政治事業上所表現，實已超越尋常了。

這一層，近代中國也僅有孫中山先生，能對中國傳統政治有其卓見。此外，到西方去學得一些西方政治學皮毛，不僅疑中國無政治思想，抑且疑及中國歷史兩千年來，除卻帝王專制，乃無政治事業之可言。

近代中國，在其傳統文化精神之大體系之內，先自失掉了政治精神之一傳統，不能不說是近代中國一大損害。

二

我們也可說：中國人的哲學精神，即其求知精神。如實言之，不如謂是中國人的求道精神，卻最近於西方現代的科學精神。西方現代科學精神，最主要者，在能逐步求證驗，然後再逐步擴大，逐步向前；而中國人講道德，也正是逐步求證驗而再逐步擴大向前的。

中庸云：「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此一道，便是在逐步證驗，然後再逐步擴大向前的。

從低處近處，一步行得通，有了證驗，才向高處遠處更前一步。

人生高遠處，不可窮極。也只有從眼前腳下低近處，如此般一步步行將去，故曰「吾道一以貫之」。

人總是個人，道也總是個道，無論對己對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全只是在人圈子裏盡人道。

和諧而深厚。孔子說：「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孔子生命的進展，似乎可以象徵中國史的逐步進展，無劇烈的轉移與不和諧的跳躍或翻滾。似乎孔子「十五志學」的時候，已經朦朧地若覺若夢的直感到「七十從心所欲」的境界裏去。這或是中國民族文化之沉著遠到而不失其靈敏處。

國難深重已極，我並不想守舊頑固，故步自封。我們種種不如人，但願國人大家邁步競進。然而我們有志邁步前進，卻不必定需先糟蹋了我們已往的歷史。對於已往歷史之誤解與曲說，對於我們之決心向前，並不多大幫助，或竟至於有意外的損害。倘能真切瞭解中國史，對於指導中國民族之前進，該不至於全無用處。我覺得「推翻二千年專制黑暗政體」、「打倒舊文化」、「全盤西化」、「無產階級武裝起來奪得政權」等等口號與辦法，以歷史經驗來說，不是鞭策我們前進的好辦法。現在的事實，也已經逐漸告訴我們了。我覺得我們這一個時期的不能長進，或雖有些長進而不能如我們的期望，實因我們當前另有幾許真實病痛未能拔除；卻不必因此埋怨整個民族四千年來積累的文化，而想激起些與歷史民族性不合的激急變動。這是我草此文之微意。

三 中國史上最近幾個病源

一個國家和一個民族的歷史，並不依著直線上進或後退。他往往常走成波浪式，有時上進，有時後退。要把兩個民族或國家的歷史互較並論，更顯困難。我們找不到兩個國家或民族的歷史恰恰能成一種平行線的。有時這一邊在上進，而另一邊或正在後退。但是有時這一邊後退，而另一邊卻正在上進。若橫切任何一點，而來推論兩邊的全線，自然靠不住。不幸現在講歷史的，似乎正在橫切一點而加以推論。最近的中國史，無疑是走上後退的路，而且後退得很大。而西洋史在最近，則正是他們全線一段最燦爛的時期，對於以往形成一個極急劇的前進。然而歷史並不是自始命定的，每一段的變化，有每一時期人的聰明與努力爲其因素。正如個人的生命，有時健康有時病，各有其臨時起居生活上的原因。歷史由人創造，近代中國史的後退，自然是由近代的中國人種因。近代西洋史的激進，亦由近代的西洋人種因。若因最近中國不如西洋，而推論中國

滿、漢種族之見，在當時是驟然不能消融的。滿族親貴用事，民治終難告成。要中國民族奮發自救，除非先排除滿清政府，排除滿清政府後，不得不走上一個政體上急劇的變動，這是中國政治近年來一個極大的苦痛；而居然冒險地渡過了。然而中間如洪憲稱帝，宣統復辟，幾許曲折，消損了中國前進的元氣不少。若是滿清政府在中國，並不有已往種族之見，文化之極端壓迫，與其親貴之狹隘把持，中國擁戴一個虛君，而推行憲法，或亦能如日本般順利。

滿清政府在咸、同以後，其實質與已往本已大變。地方督撫的擅權自專，中央無力駕馭，早已造成割據的風氣。政治雖腐敗，然中國已處環球棊通的新局面之下，腐敗的政府，亦得借外債，買軍火，練新兵，使得革命的民眾無力翻騰。中國的革命，雖是把滿清政府取消了，然而滿清政府所遺留下的督撫擅權、地方割據的情形，當時的革命軍並不能將其徹底澄清，而且還利用其勢力以期革命工作之順遂進行。所以民國以來，武人弄權地方割據的形勢，轉見增長。直到最近，引起不斷的內戰，斷喪中國社會之元氣，障礙中國政治之進步。這是一個更顯著的病源。若使自辛亥革命以來，至今二十六年，中央統一，各省全受中央統治，不在某派某系軍人割據之下，試問中國最近情形，應該成何種樣子？

武人割據，並非政治上一種不可排除的情形。正為政治沒有一個中心力量，而武人割據始得

習不徹底澄清，科學實業也永遠不能有堅固的基礎。新中國的創興，首要是在政治上軌道。要望政治上軌道，首要是在中央政權之統一，地方割據之取消，其樞紐則在全國政治中心勢力之造成。而其負造成全國政治中心勢力之大任者，並不能望之民眾，亦不能求之軍人，而在中層階級智識分子對於國家責任觀念之覺醒與努力。要望全國中層階級智識分子對國家責任之覺醒與努力，應該有一個培養。這種培養的重任，即是國家的教育，與政府的紀綱。而不幸自清末以來，國家教育的最後最上的一級，全已付之歐、美，而自己卻不問不聞。受歐、美教育的，是政治上乃至社會上第一流的人才。國家自身並無教育，政府又何從能有紀綱？政府的紀綱與國家的教育，應該站在同一個立場，而後此種紀綱，乃能有真實的威嚴。或者在無紀綱無教育之現況之下，而試欲擁護某一領袖，造成獨裁，豈不仍是不診病源，亂投醫藥之舊套？

幸而中國民族還不是不成器。在此數年國難嚴重、創鉅痛深的狀況之下，漸漸走上了統一的道路，政治已有一線光明。我希望一輩智識分子，不要再唱不切實際的高調，對症下藥，在擁護統一、解消割據的過程中，急速謀中層智識分子之對國家民族責任之覺醒。好從這裏建設起國家的教育，與政府的紀綱，來造成更穩固的政治中心勢力。從此自得逐步獲到科學實業之建設，乃至民主政治的實現。

（約作於民國二十六年）

成功」；那豈不形勢顛倒，變成了要由政府來革社會的命嗎？政府要革社會之命，這一政府，必然會變成一黨專政之政府。而此一政府黨，則並非普通政黨，而依然是一革命黨。這又與共產黨分別何在？社會成為政府革命之對象，這叫社會如何能放心此政府？無怪那時的中國共產黨，要乘機再以在野革命的姿態而出現。

抗戰勝利，中共的勢力逐步抬頭。那時他們的口號，是爭取民主、爭取自由。他們是在野革命。只要反政府的，他們都盡力爭取拉攏，認為是他們的同路人。今天中共已確實掌握到大陸的實際政權了，於是才正式開始它第二步的革命，即由政府來革社會之命。此是在朝革命。因此他們對外是一面倒，對內是人民民主專政，經濟上的殘殺鬥爭，思想上的極權改造，極盡其在朝革命之能事。於是迫得中國社會要再來革中共之命。

今天退避到臺灣的國民政府，就法理言，它是中國唯一合法傳統的政府。但就實際情勢言，國民政府又應該是一個處於領導國民革命的立場而求重返大陸、推倒中共極權統治的革命組織。如是則今天的國民黨，實處在一複雜困難的局面中。它該認清目標，改變作風。就法理與實情，雙方兼顧，來打開一出路。今天它不僅是一個在朝的政黨，而又應該是再做為一個革命黨，縱使它一時擺脫不了一個普通政黨即平常政治上的所謂在朝黨之任務。

自當爲一普通政黨，而今天國民黨之重大任務，則並不是專在臺灣行使其政權，而更要的乃在如何重返大陸，完成革命。我們切盼臺灣的國民政府，不要牢守爲一個僅由國民黨組織的普通的所謂政黨政府，而該使其變成一積極領導全國性的革命的政府。蔣總統之爲主持全國革命運動之領導人，其意義將重大於其爲國民黨之總裁。

現在再說及所謂第三勢力。目下則實際並無此一勢力，而且就實際情勢言，殆並不可能真有此一勢力之產生。而我們亦且不復希望真有此一勢力之產生。今天的迫切要求，是在面對大陸中共之極權統治，而急速茁壯成一個革命的力量。革命的力量不妨來自多方面，而革命的目標是唯一的，則革命的力量應該是團結的。若使有兩個以上之革命力量，而抱有兩個以上之革命目標，則此種革命力量，勢必互革己命，把力量自我抵銷，而把目標混淆轉移。顯然的，今天全國人心之革命對象是中共，我們只有在此唯一目標下集中力量，加緊團結。我們只盼用許多力量對同一目標而革命。我們不盼分散力量，對許多目標而革命。今天的所謂第三勢力，亦如上述國民黨的處境，有它實際形勢上之困難。第三勢力應該是革命的，但今天我們應該瞭解，中國今天實在還有一個合法合理的政府之存在。然若使第三勢力不是一革命的，而僅只是一個普通的政黨，則此種勢力，我們自然也只盼其於革命完成後出現。

人孰不願不死，神仙長生術的試探，現代科學家尚無此勇氣與與會來繼續古人的幻想。但人類除卻百年大齊的自然生命以外，實在可以有一個不朽的精神生命與文化生命。這也並不是如宗教家所想像的「靈魂不滅」。在孔子以前，中國人已有「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說，這實在是人類祈求不朽的最合理的觀念。孔子平日的行事與教訓，可說直從他以前那種三不朽說遞傳演變而來。我們今天來紀念二千五百年前的孔子，我想莫如再把這一種人生不朽的理論來重新闡發一遍。

我在約四年以前，曾有一篇靈魂與心的文章，用意即在闡發中國人歷古相傳人生不朽論的精義。這篇文章，擬把前篇靈魂與心的文章中所未及之義，再加申述。本文取名「新三不朽論」，擬從西方歐洲人對於不朽的觀念，以及佛教裏面的不朽論，用來與中國人歷古相傳的三不朽論，經孔子乃及此下儒家所發揮完成的一番人生理論相互比較，以見世界哲人對此人生如何可以不朽的儘可能已有的幾種想法與說法，來貢獻於當前這樣的亂世。大家正草草過活，深苦於求生不得求死亦不得的當兒，這或許是我們來紀念孔子二千五百年誕辰的一個較有意義的題目吧！

二

讓我們先從西方較古的希臘哲人柏拉圖說起。柏拉圖本亦信有一種靈魂輪迴說，我已在那篇靈魂與心的文章中提到過，此處不擬詳說。此文所要說的，則是柏拉圖學說中那番最著名的關於觀念的理論。

就常識言之，人生如朝露，世事如浮雲，總沒有歷久不變的。若再深刻言之，世態永遠不息地在變，而且頃刻頃刻地變，剎那剎那地變。前一形態消失，後一形態出現。即在它出現的頃刻，便已是它消失的頃刻。自然界萬象如此，人生一切又何莫不如此。中國哲人莊周已說過：「萬物方生方死，方死方生。」這是說，在他生的當口，便是他死的當口。在他死的當口，便又是別一個生的當口。自然界萬象乃至人生一切，莫不是刻刻生、刻刻死。換言之，即是刻刻在變。變是一種相異無常。所謂相異無常者，即是說前一刻即異於後一刻。每一刻的存在，僅存在於這一刻。別一刻的存在，決不與這一刻之存在相似。刻刻變異，即是刻刻無常。這一個真理，無論古今中外，只要你稍稍認真，能用你的眼睛仔細一看，能用你的頭腦仔細一想，此乃一種自現不爭之真理。無人不曾不瞭解，也無人不曾不首肯。然而人生在此相異無常的世態中，卻總想把捉

到一個一如眞常的境界。否則人類在此刻刻變、時時變的情況中，實在將感到無法生存，無法過活。這並不是一種不近人情的哲學家之空談。好在我們正生在這一個驚濤駭浪變幻不測的亂世，人人要感到後一分鐘的世界，與後一分鐘的我，極度搖蕩，像時時有一個不可預知的變動緊逼相隨。上述的一番哲理，更容易使我們領略，不煩細論。

柏拉圖的觀念論正是針對著這無可奈何的相異無常的世態而發。即如你眼前見一紅色，你必將口裏說或心下想：我見了一紅色。其實紅色是相異無常的，刻刻在變，息息相異。若認真說來，前一秒鐘的紅色，決不與後一秒鐘的紅色相同。紅色是無常的。說得明白一些，在這世上，可謂根本並無紅色存在。當下存在的，當下即消失了。後一刹那之所見，並非即是前一刹那之所見。凡屬存在的，全是無常。凡屬無常的，即是不存在。人生無常，只有百年，百年後即不存在。此乃一種常識，並不的確。我們該說人生無常，只有刹那，刹那後即不存在。人生如此，世態亦如此。現在你說見一紅色，你將感到紅色確然存在，而此刻爲你所見；如是你將設想別人同時也可見此紅色；而且你在異時，仍可見此紅色。其實在你同時，別人所見，決不與你相同，而你異時所見，也決不與你此時所見相同。若凡有所見一切不相同，即不該與以一個一同不異的名呼。現在你說此是紅色，其實並非在你外面有此一紅色，而是在你心裏有此一觀念，而名呼之曰

世界裏面找尋一個一如真常的不變本體之要求的動機。換言之，此是一種想望「不朽」的動機。惟此種不朽，縱使真實，也只是外面世界的不朽，卻非人生本身的不朽。深入言之，則此種不朽，只是一種觀念的不朽，或說是理智的不朽，卻還與人生不朽隔一層。如是則仍與人生要求不朽的真動機隔一層，仍不足以滿足人生之真要求。所以歐洲人無論在哲學界、科學界，都還不夠滿足人生，不得不別尋出路。

三

讓我們轉移目光，來一看他們的文學。西方文學有一特殊色彩，即是他們的文學，始終脫離不了男女戀愛的題材。男女戀愛在西方成爲人生問題中一極嚴肅極認真的問題，這並不是偶然的。愛情正是人生在互異無常中屢屢重複出現的一件事。中國人也說：「梅枯石爛，此情不變。」人生在戀愛中，卻真可嘗到一種不朽的滋味。就如上文所說，觀念的不朽，以及理智的不朽，都是一種形式的。所謂形式，是指其爲抽象非具體的而言。非具體的，即是指其不包有任何內容的。如紅的觀念，只是一種形式，抽象而不具體的，不包任何內容的，並不專指著火之紅、燈之紅、太陽之紅、血之紅、女子嘴唇之紅之任何一實體之紅而言，乃始成爲一觀念，超出現實，而獲有

之一服大溫補劑。要之則爲人類對人生不朽之一種內心的深邃要求，則四者同於一根。

四

現在再說一些佛教的理論。小乘宗的靈魂不滅論，也已在我靈魂與心的那篇文章裏說過。現在要說的，是大乘佛教中所提出的涅槃理論。「涅槃」是一種心理境界，是人心的一種寂滅境界。上文說過，世態人生，剎那地在變，頃刻不住，瞬息無常。此一種現象，也都在人類的心之覺識上認取。所以佛教常說：「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人生最感痛苦者，即是那瞬息的變，瞬息的不住與無常。歐洲人用理性來剋滅這一種不住與無常。佛教則不用理性而改用「觀照」。世間更無剎那的理性，只有永恒的理性。愈是永恒，愈見其爲理性，剎那的決不成爲理性。而佛教正在教人提取此剎那。剎那剎那相異，剎那剎那不住，若你果能在此剎那上觀照，則上文已說過，剎那存在，同時則是剎那消失，消失、存在，同此一剎那。因此剎那觀照，並無內容可言。既無內容，自無同異可論。既無同異，亦無消失、存在可辨。不住即住，住即住此不住。無常即常，常即常此無常。此之謂「寂滅」。寂滅只是在觀照上不起波瀾，不生變化，永永如此。此即是涅槃境界，並非取消形式，而實爲一種絕對的純形式。歐洲方面的形式是理性的，而佛教的形

中指點出一個親子之愛來過渡到全人愛。親子之愛所包涵的自然人生之實質量並不見其輕減於男女之愛，而實更爲一形式性者。男女之愛，可以自由挑選對象，在愛的對象上附有自然人生種種實際條件。此諸條件，則盡屬自然人生種種具體的欲望與要求所形成。親子之愛，在基本上不再有條件，不再有另外具體欲望之闢入。男女之愛的對象，可以自由轉換。轉換的動機，則起於自然人生中某種另外的欲望。親子之愛的對象，將不可能自由轉換。親永恒爲親，子永恒爲子。親子間的愛情，出於自然。親子之愛，乃以自然純潔之愛爲基礎，爲出發點，而容許其增入某種相互間之欲望者。男女之愛，則往往由某種相互間之欲望爲基礎，爲出發點，而始達到於愛之領域者。耶教認上帝爲天父，此乃象徵於自然人生中的親子之愛而轉換到另一種形式，才始到達其全人愛之境界。儒家思想則只主「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即由自然人生中的親子之愛，直接推廣、直接引伸，而達到全人愛之境界。故耶教之人生不朽，必由自然生命中超脫逸出，而始到達於精神生命。此種超自然的精神生命，以其過分用力擺棄自然生命，而容易有害於文化生命之發展。孔子教義則即在自然生命中獲得其精神生命，故於文化生命之進展可無妨礙。

歐洲耶教人生中，不免要有一番「文藝復興」的運動。此種運動，簡率述說，則爲一種由上

功利觀點。只有親子之愛，中國之所謂「天倫」，乃始純粹屬於自然人生之支配。而即就此自然人生中自然創造出精神生命。人類文化進展，即由此植基，由此導源。

故孔子教義，專以「孝弟」爲「仁」之本。必在此本源上，乃始許有理性之運用與功利觀之活動。理性與功利觀全屬次級性者，不能先由理性乃始引導出愛，西方宗教人生裏的上帝信仰，則是先由理性而導出人類之愛者。亦不許先由功利觀點乃始導出人類之愛，西方文學人生中的男女戀愛，實是先由功利觀點乃始導出人類之愛者。此處可見中國人心中所認之理性與功利，與歐洲人心中所認之理性與功利之相異。故在孔子教義中，上帝信仰與自由戀愛，皆不重要。而亦非必然將剷除其地位與價值。

六

有人懷疑孔子高提親子之愛，將不免有時要違逆人類的理性。其實宗教人生中之上帝信仰，雖必經人類理性之洗煉而成，又何嘗不有時違逆了人類的理性？文學人生中的男女戀愛，雖經由人類的功利觀點與欲望要求而發展，又何嘗不常常與人以苦痛與束縛？但在人之理性上，可以不能信有上帝之存在。在人之功利立場上，可以永遠找不到一戀愛之對象。若在男女異性愛之自然

疆域中，便無失卻對象之虞，可見自由戀愛已超越自然人生而進入精神人生中，而此種精神人生，則實爲挾有功利觀點者。惟此處功利一語乃廣義用之。而在自然人生中，則自然必賦與一親子之愛之自然心境而無人不可得。孔子偏講孝，不偏講慈，亦爲此故。人人必得有父母，卻不必人人可得有子女。故在中國人生中，人人盡可得此一份不朽人生之經驗。

而在歐洲人生中，雖人人可見有一不朽之外界存在，而不必人人盡可得此一份人生不朽之經驗。在佛教人生中，人人若經一番境界之操習與修養，應可人人盡獲一份人生不朽之經驗；然佛教教義，乃在排斥自然生命而始獲有此種精神生命之經驗，乃亦由此精神生命而復將取消文化生命之展衍者。孔子教義則即在自然生命中教人獲得精神生命，而復由此精神生命走上文化生命的悠久前程。

孔子這一種不朽論，我們可以稱之爲「人文的不朽論」，亦可稱之爲「性情的不朽論」。孔子講愛，即在自然生命的性情上講，即就自然生命中之性情上建立起精神生命與文化生命。

今天的世界，全在極度動亂中。尤其是今天的中國，更在極度動亂中。人生草草，今日不知有明日，今日也不能回想到昨日。那裏說得上性情？那裏說得上文化？然而刹那存在，即是刹那變滅，世態人生的本質，早就如此。人生之可貴，正爲能在此無住不常的變動中找出一個一如真

常的境界來，好讓人安身立命。我們在今天那樣動亂的世界、動亂的中國來講一些不朽人生的真理，來講一些仁與愛的不朽真理。尤其在今天的中國，仇恨鬥爭殘忍殺伐的氣氛瀰漫著，民族文化到了存亡絕續之際，來紀念孔子二千五百年的誕辰，來講孔子的人性文化的不朽真理，我想也該是頗有趣味，頗有關係的。

（民國三十八年九月民主評論一卷六期孔子誕辰二千五百年紀念）

兩面，亦是相互會通。由人來完成學，由學來完成人，如一條線，由這頭到那頭，亦可由那頭到這頭。循環相通，彼此如一，極難說誰是而誰非，或誰先而誰後。然而在此共同道路上，或從這頭起，或從那頭起，各自向前，可以愈走愈遠。回頭來看，可像各走一線，渺不相涉。而且距離日遠，難於會合。

西方人似乎很早便看重到各種學問之分類，似乎認為每一項學問，都有其客觀之存在，與其各自的終極境界，而有待於人之分別探討。因此學與學間，分疆分道，而待人以各不相同的方法，各走各路，而形成爲各種學問之專家。如哲學家、文學家、藝術家、宗教家、自然科學家等皆是。如此，則是由人來完成了學。當然，此諸學，亦同樣可於社會大群有其各不同之貢獻。但深一層言之，則是學爲主而人爲從。各種學問，各有其客觀之存在，即外於人而存在。而人之努力，則只爲發現此學蘊奧之一工具。此一趨勢，直到近代，愈演愈烈，循至爲了學而失卻了人。因每一人只附屬於每一學，而又是附著於每一學之分枝小節上。皓首窮心，循至除卻其所學，乃不見其人之存在。學問上的分工愈細，而從事於學的人，則奔馳日遠，隔別日疏，甚至人與人不相知。會通合一在其學，而不在其人。而人之從事此學者，又多不知此學之會通合一究何在。若有知者，乃屬少數中之尤少數。故使學愈大而人愈小。人之地位，乃爲其所學所淹沒而吞滅。

二

中國觀念則不同。中國人似乎很早便認為學只爲人而有。一切學之主要功用在完成人。人的本身則別有其存在。此一存在，則自有其理想與目的。即是說，人必該成爲如何樣的一個人。而其從事於學，則只爲追求此理想、到達此目的之一種手段與工具。因此，在中國觀念中，重在爲人分類，如聖人賢人，大人君子，善人惡人，智者愚人，非常人與庸俗小人等。而一切學問之分類，則轉屬第二層次而忽略輕視了。

在中國觀念中，好像一切學之共同出發點是人，其共同歸宿點仍是人。人是主體中心，由此主體中心之種種需求而展開放出種種學，學本非外於人而存在。種種學既無其獨立客觀之存在，故無爲之嚴格分類之必要。換言之，人爲主而學爲從。每一學之背後必有人，人之重要遠勝於其學。治學者，貴能從學之後面來認識人，再來完成其自我。待其既完成了一人，自會由其人展演出一套學。因於各人才性不同，所生時代所遭環境又不同，於是其所展演完成之學亦不同。而主要尤在學者之所志，與其及身當世之習俗與風尚。故孟子曰「知人論世」，亦即所以論學。要之學只包括在人事內，不能超出於人事外。

科，而亦上躋於德行之一科。若必以後世所謂文學家相繩，則屈原弟子宋玉，庶乎近之。因宋玉只知學屈原之爲文，不知學屈原之爲人也。

更下如司馬遷，亦不能僅說其是一史學家。司馬遷之史學，亦如屈原之文學，乃其人生過程中之一種流露。在司馬遷史記之後面，更當知有司馬遷其人。其作爲史記，乃學孔子之作春秋。然司馬遷心中，主要在學孔子，不在學孔子春秋之一書。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嚮往之。」不知司馬遷，而徒讀其史記，是未爲能善讀史記者。

三

根於上述，皆證中國傳統，重人更過於重學，學不外人而存在。故所重在爲人之品格分類，不重在爲學術分類。直至劉向、歆父子之七略，及班固漢書藝文志，亦僅爲書籍分類，而稱之曰「王官學」與「百家言」。百家中分儒家、墨家。凡此皆仍從人事分，不在分學之內容。魏晉以下，始有經、史、子、集四部，然所分仍是書之體裁，非關學之內容。就書論，此書可歸入經，此書可歸入史。若就著書人論，則其人自可分類，卻不能專就其所著之書分。

此一層，可再就後世舉例說之。如北宋學者歐陽修，其人究是一文學家，抑史學家，或經學

家，或思想家，或政治家，此殊難分。彼之著書，可分別歸入經、史、子、集四部。彼之爲學，則確然成其爲歐陽子之學；而其爲人，則確然是一賢人與學者；如是而已。若必目歐陽修爲一文學家，在彼心中，必所不受。彼時時提到僅知從事爲文之不當與無價值。若必謂歐陽修爲學從韓愈入，則歐陽修心中所重，乃韓愈其人，非僅屬韓愈之文。韓愈自稱：「好古之文，乃好古之道也。」是豈僅好於文者。故曰：「並世無孔子，則不當在弟子之列。」此亦自重其爲人，非自重其爲文也。韓愈極稱孟子，而曰孟子「大醇而小疵」。孟子拒楊墨，韓愈關佛老。其學皆歸於人事。韓愈之爲文，亦僅是韓愈人生過程中之一種流露。中國人向來論文，莫不如此。故曰：「流落人間者，泰山一毫芒。」韓愈、歐陽修之爲人，是一泰山。其所爲文，則泰山一毫芒耳。非知此，則不足成爲中國傳統中一具有最高理想與最高價值之文學家。文學必從人生來，非第一等人，即不得爲第一等文。李白之遜於杜甫，柳宗元之遜於韓愈，皆在此。故專攻文學，不得成一文學家，專攻史學，不得成一史學家。治學必重其爲人，此是中國人觀念。

下及清代，有人把學問分爲義理、考據、辭章三大類，亦有人增入經濟一項爲四大類。其實此種分法，仍不是就學之內容分。考據應是考其義理，辭章則是義理之發揮，經濟乃義理之實際措施；則不啻謂一切學問，皆以義理作中心，而義理則屬做人之道，仍是重人過於重學之見解。

四

欲求瞭解中國文化，當先求瞭解中國人，而更須瞭解中國人之學。惟其中國人之學，主要在於如何培養一理想完整之人格，故在中國文化體系中，乃不發展出宗教，因宗教功能，已在中國傳統觀念的「學」之範圍以內。而自然科學之發展，在中國文化體系中亦受限制。如天文、數學、醫藥、農事等，在中國傳統觀念中，終屬一才一技，雖人羣社會有此需要，然於教育一完人之理想上，則屬較次之階層。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所學在技，皆是爲人。技而進乎道，乃是爲己。如禹之治水，稷之治稼，則是技而進乎道者。即如文學、史學等，可以分門別類成爲專家之業者，皆非所急；聖賢之學，不在此枝節上著力。如陶潛、杜甫之於詩，司馬遷、歐陽修之於史，亦庶幾乎技而進乎道矣。故陶潛於詩稱隱逸，杜甫於詩稱詩聖，而司馬遷與歐陽修皆不得專以史學目之。

古希臘人言：「智識即權力。」中國傳統亦無此想法。權力當在人與人相通之知、仁、勇三德上，當爲自忠恕孝弟向上所達之理想完美之人格上。惟大人君子，聖賢中人，乃爲於人羣社會中有真力量，決不限在智識一端。而「權力」二字亦非所宜用，人與人相通在「道義」，人與人相

今試問人生究應重外，抑重內？究應以形爲主，抑以心爲主？中國古書列子中有一寓言：

一王者夜夜夢作苦工，勞倦不堪。一工人夜夜夢爲王者，其樂津津。此王者願與此工人互換生活，但此工人拒不接受。

當知日間此王者所享受，只是肉體的、物質的，在生活之外面。其夜間夢境雖虛，卻是內心的或說是心靈的。此屬生活之內裏。感受深切，像是虛假，卻更真實。

肉體只是人的生命的一套機械或一副工具，因此肉體生活，其實只是人生一憑藉。或說是一層外皮。

心始是人生之主，心始是我之真吾。心生活才始是我們的真生活。

二

今問心究何在？

前人指人身內之心臟爲心，今人指人身內之腦細胞爲心。其實心臟之與腦細胞，同屬人身肉體之一部分，並不是我上說爲人生之主爲我之真吾的心之所在。

心究竟何在，到今仍爲人生一大謎，許多人並不能解答此一謎。

遜心」，有「敬畏心」。

此爲人類對天之學所應共有之態度。

在中國文化傳統裏面並無自創之宗教，但其培植人之謙遜心與敬畏心，論其成績，則決不差於世界任何一大宗教之所能。

在此一不可知之最高主宰之下，人與萬物並處。

人應懂得萬物所各具之性能。積極方面，可資人類之利用；消極方面，亦可知有所戒備。近三四百年來，西方自然科學，突飛猛進，使人類對物之學有輝煌之成就。

但同時產生了兩流弊：

一、是把對天與對物的界線泯滅了。

因於對物有成就，而自信過甚，誤認爲只憑人類自己智慧，便可主宰天地，管領萬物。認爲宇宙間至高無上者即是人類，不再認在人類之上尚有一更高而不可知之主宰存在。於是把人類對天之謙遜心、敬畏心都消失了。

循至驕矜自滿、狂妄自大，把自己當作至高無上、有己無對。當前人類此一心理，即可貽禍無窮。

中國文化傳統，在此方面，講究得最透徹。

中國人分人與人相處之道爲五倫：一父子，二兄弟，三夫婦，四君臣，五朋友。

君臣一倫，近代社會似乎沒有了。其實就中國傳統觀念言，「君者羣也」，我處在此團體之內，此一團體即是我之君。又「君者尹也」，一團體必有一代表主管人，此團體中之一代表主管亦即是我君。

如此言之，國家即是君，國家之元首亦是君。推而言之，一公司是君，此一公司之總經理亦是君。只要我處在此國家或此公司之下，也即應有君臣一倫之存在。其他四倫不待言。

要講對人之學，必從此五倫始。

因其是最具體的面對面的人與人相處。從此最具體的面對面的來教人與人相處之道，則首應知有同情，有恕道。

中國儒家稱此人與人相處之道爲「仁道」，仁道即是「人道」。若不從人與人相處之道即仁道上立本，而憑空來講國家天下事，將會使人無同情，無恕道。人與人間全變成權謀術數與威力財力之運用，不仁之極，而人道遂大壞。

四

上述人生是一項大學問。

在此人生四階層中亦各有學問。

有關第一階層中的學問，最低淺、最狹窄，可以人人各習一業，乃至互不相通。

有關第二階層中的學問，較廣大，較融通，其所佔地位，實較高於第一階層者。

第三、第四階層中之學問更如此。

有關第三階層中之學問，較之第二階層中者，更廣大、更靈空，遂使人誤認為其中無學問。

人們常認為：「謀一職業不可無學問，但處閒暇，則可以無學問。至論理想，則更可無學問。」

想到那裏，便成為理想。當知閒暇的人生，正如名畫之空白處，畫中山川人物之靈氣，即在此空白處胎息往來。「小人閒居為不善」，皆因其欠缺處閒暇的學問。

惟其不知理想亦應有學問，不知理想亦從學問中來，故遂至不能有理想，卻只有空想與幻想。空幻則即是虛無。虛無主義的人生，則決非理想的人生。

有關第四階層中之學問，較之第三階層中者，更落實，更靈空。人們更不知道道德亦由學問

有任何問題和困難，使用處之高度對發動機所生馬力之影響不能過巨。

發動機之機件及各項附件必須標準化，以便製造時可以由專門製造廠家或部門製造，而修理時所損壞之零件，易於配購及調換。

(2·3)發動機所採用之循環

汽油發動機所採用之循環幾全為奧多循環。惟便於明瞭汽油發動機與柴油機之不同，及各自所具有之優缺點起見，茲分述於下：

(1)就整個發動機而論，在同一壓縮比下，奧多循環發動機較笛塞耳循環發動機之效率為高，但因壓縮比之限制，實際上發動機採用奧多循環較不經濟。幸近年以來，由於燃料之改進，抗爆燃性能之改善，以及燃燒室與進氣擾動設計之改良，使奧多循環發動機效率方面之改良至巨。

(2)奧多循環發動機易於起動，且開動時較為平穩，尤以節流閥半開時為甚，在笛塞耳循環發動機中，由於其壓力較高，故開動時震動較大，且因無點火裝置，起動時較為不便。

(3)在奧多循環發動機中，由於其最高壓力較小，故各項機件之受力較小，因此重量輕。但在笛塞耳循環發動機中，其最高壓力較高，因此各項機件受力較大，構造必須堅實，於是全發動機之重量增加頗多，惟近年來對於此點已有很大之改進。

(4)發動機中如採用笛塞耳循環，因無爆燃之發生，故可不計燃料之抗爆性，因此可以使用較為價廉之燃料，故笛塞耳機之維護費用較廉。

基於上述諸點，一般之船用發動機或功率較大、開動時間甚長、且不需要時常搬動之陸上使用發動機，常採用笛塞耳循環，以降低維護費用；但較大馬力之氣體發動機（燃用自然氣或煤氣），常採用奧多循環。

事業則更不然，如孝子因多溫夏清之心而爲父母蓋一屋，冬得溫，夏得清，乃由行爲轉爲事業。此一屋，不僅可供其父母數十年居住，並可數代傳家，至其孫曾輩而此屋尚在。夏天進一冷飲，冬天進一熱杯，此層物質生活，其事轉瞬即逝。夏清冬溫心，發爲行爲，可以數十年持續，而並引出事業來。

生活只在物質上，父母子女，各自飲食起居，可以分開。行爲則轉入心靈上，子女一片多溫夏清心，乃放在父母身上，父母心亦因得安慰。可使父母子女心相通合一。事業則又從心靈轉歸到物質，建一屋，父母的物質生活亦隨而變。而子女孝心亦具體著實了。

二

人生具有生活、行爲、事業三階段之遞進，具如上述。但生活人人應有，行爲人人可有，而事業則惟少數人遇機緣始有，其間需加以闡申。

無生活即無生命，故生活人人應有，但行爲則須人之自由自主自動，非此不得稱行爲。如夫婦結合，乃行爲。西方人言自由戀愛，此仍是一種自然生活，其他禽獸皆有之。夫婦結合則經人類之自由自主自動而有，非是天造地設即有夫婦。近代人又提倡性解放，此是由人文人生還歸到

嫻、任、卹，本身即是目的，可以當下完成。而事業則另有目的，如製造貿易，皆不以本身爲目的。故屬事業非行爲。又如農戶散居，事業方面常多合戶合力爲之。故其事業多賴行爲。都市集居，然每戶必分別各有其事業。故工商人多不注意行爲，而轉富事業心，其事業又多僅是手段，另有目的。故貴臨時能變，又多機械心。且每一事業，多是各爲其私，於是事業與事業間，生比賽爭競心。必求己之事業超出他人之上，只謀己占其益，不顧人蒙其損。如是種種，不易成大事業。故凡屬工商立國者，多不能成爲廣土眾民之大國。多缺乏千百年以上之大計。工商業發展，先是私家製造，繼以工廠，廣招傭工。獨利廠主，事不可久。其對外貿易。寢假變成帝國殖民。此皆專一注意事業，而號之曰進步。至於連帶而起之一切行爲，乃盡成爲手段。其最終目的，則只落在生活上，其生活理想，亦只在物質上權勢上，都屬外在。換言之，仍是一種變相的原始自然生活。近人分別社會進步爲石器、銅器、鐵器、電器等各時代，其實此等亦只是事業進步，而非行爲進步。

農業生活似較都市工商生活若較爲原始的，然易於轉進到行爲上去，由自然人生轉進到人文人生，卻是人類生活上一絕大進步，而都市工商人生轉有不逮。中國儒道兩家，皆從行爲上論人生，不從事業上論人生。因事業必從行爲中展出，不能離開行爲，而把事業作單獨之衡量。由行

爲展出事業，此爲道義的。撇開行爲，或僅以行爲作手段，而單獨衡量事業，此爲功利的。道義自可涵有功利，功利不顧道義，則可成爲無功利，抑且反功利。

三

故人生必應分三階層演進，先生活，次行爲，最後乃有事業，事業與生活，並不親切，其間尙隔行爲一層，行爲與生活始是親切的。事業應從行爲進一步而有，不能徑從生活上來打算事業。此種三階層之人生，始是理想的，亦可說是藝術的，文學的。中國傳統文化，建本在農業，故對此獨有深切之瞭解。先言藝術，中國人看藝術，不作一種功利事業看，只作一種人生行爲看。如商周古鐘鼎彝器，至今仍得目爲是一種無上藝術精品。然此等古器物，本不作商品用，主要用在祭祀，次之用在家庭日常生活上，而求其可以傳家延世，故曰「子子孫孫永保用」。故中國藝術品，其精益求精，可謂從行爲來，從人倫道義來。不從功利事業來。

又如中國古代之陶瓷與絲織，皆成爲極高之藝術品，然亦如鐘鼎彝器般，應用在家庭，上及祖先，下及子孫。又自私家日用轉到政府朝廷之公共使用。粗視之，若中國藝術都爲實用的，其實乃是由自然生活中展演出人文行爲，而在人文行爲中乃展演出此等藝術品。此等藝術品，並不

關注在自然人生之物質生活上，乃是從人文人生之人倫道義中展演而出。自有此等藝術品，於是自然人生乃益見轉進到人文人生的境界。而人生亦彌見其爲可以是藝術的。

中國古代文化演進，應是藝術在先，而文學次之。中國文學最所歌誦者，亦在行爲上，如詩經三百首，風始關雎，歌詠婚姻，即是歌詠行爲，其中乃涵有甚深之人倫道義。又如豳風七月，乃詠當時幽地之農民生活，其實亦是歌詠行爲。而在行爲中，亦涵有甚深之人倫道義。小雅之首爲鹿鳴，天子燕羣臣嘉賓，仍是行爲而涵道義。大雅之首爲文王，受命作周，此等似應歌詠其事業。然讀其詩，仍屬行爲。故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此顯屬行爲非事業。此後中國文學，亦絕少歌詠事業。苟其歌詠事業，主要仍在歌詠其行爲，歌詠其道義。其次如生民，尊祖后稷，其間不免微帶神話成分，然終歸於稷之掌耜，主要仍落在行爲上。頌之首曰清廟，祀文王，依然是詠行爲，不詠事業。詩經三百首，大可據此類推。要之，中國古詩所詠，主要是在人生生活、行爲、事業三部分中之行爲部分上。

以下中國詩人都循此途。如飲酒，本屬生活一面事，但中國古人，每逢飲酒必加進許多儀文禮節，於是飲酒遂成人生中行爲，非可歸入純粹生活之一面。詩人詠飲酒，所詠亦多屬行爲，不屬生活。如陶淵明有飲酒詩二十首，其中所詠，全屬行爲方面，不能謂其所詠只是一種生活。

蘇東坡嘗拈出淵明談「理」之詩有三，一曰「采菊東籬下」，一曰「嘯傲東軒下」，又一曰「客養千金軀」。皆以爲知「道」之言。此三詩，皆在飲酒二十首中。可知淵明詠飲酒，乃詠其在人生大道中之所悟所踐，卽自詠其行爲，豈可謂只詠生活！

卽如中國人作畫，如畫人臨溪而坐，或畫人扶杖而行，或畫人撫松而立，或畫人隱几而臥。

此等皆求畫出其人之行爲，決非專畫其行坐臥立之自然生活。如畫衣食，亦爲畫其人生，乃在其生活以上，連帶而畫出其人之行爲。顧長康畫人，或數年不點目睛，人問其故，曰「傳神正在阿堵中」。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乎眸子。」畫家正貴畫出此存乎其人者。少陵詩「落月滿屋梁」，詩評家謂其句爲太白傳神。惟有神處始是真人生。此必在生活上加進行爲始見。然決非爲事業。除卻行爲，生活便成無意義，尙不如畫花鳥蟲魚，畫其生活，卽可兼畫其情趣。

人生不能爲了生活，爲了事業，而毀壞其行爲。如古埃及人築金字塔，至今尙被目爲一大事業，然須幾千萬人被追勞苦工作，豈能算作是此輩人之行爲。又如馬其頓之亞力山大、羅馬之凱撒，擁師征伐，亦是事業。但當時被迫充軍役者，獻身疆場，亦不能算是此輩人之行爲。近代科學發展，如製造原子彈，亦一大事業，但何能算是人生中的一行爲，最多亦只能算是人生中正當行爲。何以在人生中，乃至需要製造原子彈，或至於不可缺乏原子彈。此種人生，必是不

正當的，與藝術文學人生大不同。須從藝術文學的人生中展演出事業，始是人生中之眞事業。因中國古人對人生有眞認識，故舉立德、立功、立言爲三不朽。德在前，功次之。缺了德，卽無功，只成罪。明得此次序，乃始有當於立言。行爲則屬德而可有功。故中國文學，主在歌詠行爲，而歌詠事業者特少見。

四

中國人言人生，有兩要項，一曰性情，一曰品德。物必具性，有生無生皆然，是其同。一物一性，是其異。同處相交乃見理。如水流濕，火就燥。此見水火之性，亦見水火之理。理有常與變。失其性乃見變，性分賦在各物，理合見於一處。分處見是物，合處見是天。故曰「理一分殊」，亦曰「天人合一」。天從一生出「萬」，人則貴能由萬歸到「一」。人屬有生，但從無生中醞釀而來。人之生命，乃從大生命來。

如耳目同在一身，同一生命，但耳司聽，目司視，其小生命不同，其大生命則一。人身亦只是一小生命，不可不知其所自來之大生命所在。父母與己身，小生命則別，大生命則同，己身之小生命，卽從父母之大生命來。推而廣之，大生命之上更有大生命，故曰：「民胞物與，萬物一

情。不一定要說從無生命中醞釀出生命，實只是天與自然之大生命中之有此一變而已。今依語言方便，姑謂由無生命中醞釀出生命，在生命中更見有性情。而人類之鍾情乃特富。故人所貴在能自知此情。否則饑求食，渴求飲，爲了此情，卻妨礙傷損了其他一切之情。知有此「我」，不知我外尚有千萬億兆之我。知此一「時」，不知此時外尚有千萬億兆之時。知有此身某部分片刻之小生命，乃不知宇宙之廣大無垠悠久無疆中之大生命。中國人研討人生，在此處，極端注重。

如夷齊居首陽山，采薇而食，終於餓死，豈不違背了自然生理。然孔子稱之曰「仁」。因夷齊乃寄情在人類萬古之大生命上。認爲武王革紂命，只寄情於當前之一時，而可有損於此後之萬世。其間事理判斷之得失是非，此暫不論。而夷齊當年這一番心情，則獲得了孔子之同情，而以「仁人」稱之。

采薇餓死，是夷齊當年之生活。義不食周粟而隱於首陽，則是夷齊當年之行爲。中國人傳統觀念，行爲遠重於生活。若不明人生之性情，不從人生大處深處遠處體會，而僅知我身片刻之小生命者則頗難與言。卽如孔子，飯疏食、飲水；顏淵一簞食，一瓢飲，在生活上講，則僅維生命而止。但孔顏樂處，永爲千年後人追慕。此等樂處，不從生活來，乃從性情行爲來。又如子路、

冉有、公西華言志，皆在事業上，獨曾點「浴沂風雩詠而歸」一番心情，得孔子欣賞。正爲中國人重視人生之性情，乃能使人生走上藝術文學的路上去。

五

西方哲學有宇宙論人生論之分別，中國傳統思想則可謂更重「性情論」。把性情開放到大生命去則是「善」，把性情拘閉在小生命裡則成「惡」。如子弟之孝弟謹信愛親，皆是其性情，但已把小生命逐步推擴到大生命中去。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則是必在其心情上、行爲上，感觸到我身以外的大生命，有此修養，乃可進而透入社會歷史，人類大羣文化體系中去接觸證驗此大生命。由此乃有學問。若認學問是一事業，則此事業必從行爲性情中展演而出。在其幼年時，必先有孝與弟、謹與信、愛與親的一番心靈生活，即是有了此一番行爲，乃可進而透入文章學問的事業去。否則若不經幼年這一番心靈生活即行爲，而徑求進入學問的事業中去，則此種學問與事業決然是功利的，易於爲了事業而損傷到人生，是要不得的。

人生應由生活展演出行爲，乃由行爲展演出事業。行爲乃是人生之中心柱石。近代人乃亟亟要由生活中徑自展演出事業來，又只由事業來照顧其生活。一若由生活展出事業，由事業回到生

活，人生之能事已盡，而不知生活與事業間，尚有作爲其中心柱石之「行爲」一項。如此則使全部人生，將終歸於倒塌，撐持不起。近代人生大病卽在此。而中國文化傳統中之人生觀，則主要正在寄放此全部人生之中心柱石在人的行爲上。

人類一切行爲，本於其性情。由其行爲與性情而判定其人之品德。「品德」有高下大小之別，因此人生不得平等。天生萬物，同本一天，本屬平等。如陶瓷製成碗碟瓶罐，形體雖別，取材則一。中國古人分天地萬物爲金、木、水、火、土五行，或動或靜，或有生或無生，其背後原料則一。中國古人稱此同一原料曰「氣」。惟其同氣，所以同理。相生相剋，皆有一定。若使五行有各別之本質與各別之來源，其體既別，卽不能有相通相合之種種現象，要之，在萬物之上，將不能同有一天。就生物言，由微生物到人類，其間種種差別，其背後之生命體則同。不得謂人類有另一種生命，與其他生命有不同。其不同處，只拘礙在各生物之形體上。同此生，卽同此天。故莊子曰：「唯蟲能蟲。唯蟲能天。」道家只主回歸於天，卽回歸於此大自然，萬物不論有生無生，既同是此天，同是此大自然。故只回歸於己，卽已是回歸於天與大自然了，更不煩別有追求與作爲。然如此，則不免要把萬物各自封閉在其各自之形體內，而更不顧及萬物在其各別之天與自然之上，乃另有其開通解放之更上的一面。

注。此諸書，皆從行爲上衡評人物。人類生命中演出歷史文化，此事必該有一主宰，歷史文化之主宰仍在人。知人乃可論世。而徒就事業著眼，則往往不足以知人。有此一世之人，乃有此一世之事，而求知人，則必在其「行爲」上，不在其生活與事業上。

中國後世有「年譜」一新體。此即以編年爲其一人之歷史，乃中國史學一進步。人生自幼至老，爲變實多，惟其生命傳統則不變。維持其生命者有生活，然生活人獸所同，無足貴，人生之所貴在其行爲，又由行爲中展演出事業。行爲是「體」，事業是「用」。如刀斬割，必知磨礪以須，善刀而藏。歲庖月更刀，良庖歲更刀，果一意斬割，則轉傷刀體。其人有資格被他人編年譜，此人必有事業可言。然年譜所詳自幼至老，轉以其日常人生之行爲爲主。

三

人類歷史，亦有生命持續，世代變，而此生命主體則不變。孟子言有「名世」之人，即其人能代表此生命主體之持續者，古代人文演進尚淺，則僅能以政治元首名世，如堯、舜、禹、湯是也，逮人文日進，政治元首已不足以名世。如春秋時齊桓晉文，其在政治上之所建樹，固是一時無匹。然名世人物則必屬孔子。下逮戰國，梁惠王、齊威王繼起。齊桓、晉文之事業，已成過

去。烟消雲散，不再存留。但歷史生命之持續，文化傳統之繇延，則戰國亦無可大有別異於春秋。故戰國名世，亦必轉歸如孟子其人。

戰國以下，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功業煊赫一世，然求可以名世者，西漢當推董仲舒，東漢如鄭康成，隋初如文中子王通。即如唐開元、天寶之大變，唐玄宗郭子儀皆不足以名世，惟杜甫庶堪當此選。杜甫僅一詩人，但其一生經歷，乃盡在詩中。而又關心世運，當代之歷史事變，亦於其詩中可以窺見。故杜詩見稱爲「詩史」。亦可謂其人關心歷史生命、歷史精神，而使人與史乃沆瀣一氣，故欲求唐開元天寶時之歷史真實生命，求之他人，不如求之杜甫。杜甫一人之生命，即其「時代生命」，而流露在詩。非其詩之可垂，乃其人之可重。後人就杜甫詩分年編排，作爲年譜，杜甫其人乃躍然紙上。讀其詩，固多日常小節，然如嬰孩之一啼一笑，轉可代表其生命精神。及其長大成入，奔走名利，馳驅事業，乃轉可與其生命無關。諸葛亮有言：「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雖諸葛此後有事業表現，然諸葛之事業，亦如杜甫之詩，皆從其自己生命中流露而出。諸葛同時有管寧，則並詩而無之。然數三國人物，則管寧尤當在諸葛之上。何者？如諸葛、如管、如杜，其能「全性命」則一。能全性命，即是人生第一大學問、大事業。而獨管寧，除其日常行爲可約略考見以外，聲光闐然，絕無表現。三國時代之有管寧，正如

近人每誇言自然科學，然如自然科學中之生物學乃承達爾文「進化論」來，大率以自然生命爲其研究之對象。以人類與類人猿乃至如洋白鼠等作比較研究，此皆僅屬於自然生理。卽如研究人類心理，亦如其研究自然生理，極少能觸及人文方面，會通社會現象，乃至歷史傳統，上下古今，小己大羣，作綜合之研究。當知此與研究自然科目之途徑與方法乃截然兩途，其有不同。甚至乃欲包括政治、經濟、社會各項，亦效自然科學作研究，仍不啻僅視人類爲一自然生物。又復將哲學、歷史、藝術、文學等，亦欲盡納入自然科學之範疇中作研究。於是人類自漁獵、畜牧、耕稼、工商各時代之種種變化，乃可歸納之曰自石器時代以至原子能時代。要之在近代人心目中，幾若人生不外生活與事業兩項，而不知尚有「行爲」一項，當求其能超越乎生活，而並須從行爲中展演出事業之一重要意義之存在。

其間首當分辨者，人生中有「自然生命」與「人文生命」之不同。最易見者，在人生之幼年期與老年期。幼年期尚不能自力營生，老年期應能從自力營生中退出。人生有此兩期，乃與其他自然生物不同。亦卽自然人生與人文人生之不同。人類文化，正求於自然營生外別有其理想與意義。此惟於幼小期可加以教育而使之得修養。於老年期則更可得證驗而使之有歸宿。若使幼無養，老無歸，則此人生絕不能謂其符理想而具意義。生命當貫通其人之一生，由幼到老，只是此

一生，雖在此兩期中，不能有事業，然亦各有其日常人生，即各有其行爲。當人文演進尚淺，未達理想境界，則必縮短人生幼小期，使儘速加進自然營生之行列。又必縮短人生老年期，使在自然營生中迄於疲憊不可再掙扎而止。其在中年，亦惟一務於營生，既無少年修養可回憶，亦無老年歸宿可期望。

六

中國人看人生則不然。特重少年教養及老年歸宿，更勝過其中年之事業活躍期，而近代人觀念又不同。少年即爲營生謀業作準備，晚年惟爲安排一筆養老退休金，使得苟延其自然生命而止。自然科學日發達，物質供給日充盈，而人生愈收緊、愈縮短，汲汲皇皇，即在中年數十寒暑，而又若更無迴翔從容之餘地。所謂進步，則盡在物上，不在日常人生上，不在人文行爲上。

中國人論行爲，必分「道義」與「功利」之兩途，道義生於共通之「公」，功利起於個別之「私」。人之小生命，由大生命中來，亦向大生命中去。有家庭生命，則當知「孝弟」。有社會生命，則當知「忠信」。孝弟忠信存乎內，斯爲天賦之德性。其行乎外，則爲人倫之道義。其本乎此而流出爲一切之事業，則有格、致、誠、正以至於修、齊、治、平，皆不從小己個人物質生

活上作打算。故曰「正德、利用、厚生」。「正德」乃各人生命內在事，皆在行為上見，「利用」乃向外取之物，成為事業。兼此兩者，乃以厚生。然亦以厚大羣人生，與人文人生，不指個別小己之自然物質人生言。近代自然科學，則惟務利用，不求正德。重功利，忽道義。故惟於自然生活上有貢獻，而於人文人生，則反見其日削日薄，而不見所底止。

七

今再就人生生活中、行為與事業之三層次而證之以歷史進程。庖羲、神農，尚在自然營生以飽以暖之時代，期於人人能有其生活而止。自堯、舜至於文王、周公，則已進入羣體人文以富以教之時代。政治經濟事業，乃接踵迭起。更進至於孔子，乃使人人能投入文化人生，各得盡其孝弟忠信，以使人文大生命日進無疆，而日常人生乃能日臻於文學藝術化之最高境界。故自人類大生命言，無羲、農則無堯、舜、文、周，無堯、舜、文、周，則不能有孔子。人類大生命，亦應有此三階段之層累演進。故在中國歷史上，乃有一輩輩名世人物之先後出現，而使中國歷史可大又可久。若言近代自然科學之種種發明，其實乃只是在農時代之歷史階段中有推進。及其有了華盛頓、林肯，乃始進入堯、舜、文、周階段。惜乎西方史上乃缺乏了一個孔子。惟孔子，乃能

倫、希臘、羅馬的都成古代文化，今已不存在。英法與我相較，如我的明、清兩代。美國、意大利則爲清朝乾、嘉年代。他們好像十餘、二十餘歲的青年，中國則如八十、九十的老年人，而仍能與強壯的青年相競賽於今日之時代，此老年人自可稱爲了不起。

講到文化的力量，可說有兩種：其一乃表現於外者，另一爲潛藏在內者。中國文化是潛藏在內的。就人的生命言，人會有疾病，有疾病則須請醫診斷，醫生對病人體質診斷，皆認體質強者可以抵抗疾病，弱者不能。一個民族生命力的判斷也要請醫生，判斷民族生命的醫生就是歷史。

中國歷史上曾經歷過若干次重大疾病，五胡南北朝、晚唐五代、元、清及近代帝國主義等。在這些時期，中國民族患了重病，政治腐敗，社會動亂。可是經過一兩百年，中國仍舊是中國，中國文化始終是中國文化。以抗日戰爭言，我們在科學、經濟上都遠不如日本，但是八年抗戰，中國仍然存在。中國所以能抗日，乃中國文化的潛力使然。一般人但認爲是祖宗積德。表現於外的力量也許是很大，但一遭打擊生了病，便一無辦法。如埃及金字塔是埃及古代文化的表現，僅供人觀看，實在是他們的祖宗未積德。

中國古代文化可說是堯舜的文化，便是孝與讓的文化。「孝」「讓」是一種最高的道德力量，平時雖不定看得到，在國家多難危急之秋便自然表現出來。

歷史家的著作。這一輩歷史家，都是斯賓格勒以後的文化悲觀論者，他們一致都認為西方文化已無出路。但我是一個文化樂觀論者，我信仰中國文化一定再新生，譬如一株樹開花結果，果實落到地上成為新種子，自然又會成長為樹木。諸位流亡海外，重要的是對中國文化要抱持信心，沒有信心就沒有希望，就無法生活。但僅有信心猶不足，還須得做兩種工作。

第一種工作是向外學習別人。今天我們談文化新生，並非要關門拒絕別人的文化，惟有學習人之所長，始有助於我文化之新生。第二種工作是向內向下教人。一百年來我國智識份子中一部份犯了學人皮毛，而又忘卻自己教人責任的毛病。以是，在我們不得不向人學習，而學習外人之時，應勿忘本，勿忘教下層社會的人民，一改過去若干智識份子的毛病。如果智識份子能做到向人學習、向內向下教導時，中國文化自然會新生。

（民國四十九年八月六日美舊金山講演，

少年中國晨報八月八日刊載。）

只有中國，是一個信奉孔子教義的社會，但在東漢時，印度佛教傳入，即在中國社會盛大流行。就以後的歷史說，佛教是中國的，不再是印度的。

中國從唐以後，回教也流行了。明清以來，耶教又流行了。直到今天耶、釋、回三教，同時流行在中國。

我們雖說信教自由，但在全世界民族間，只有中國，因其是一個信奉孔子教義的社會，耶、釋、回三教也可同時存在、同時流行。這是孔子教義的偉大處。

再換一方面說，耶、釋、回三教，都有他們特殊的傳教士，又有他們特設的禮拜堂，並有他們種種特定的崇拜的禮節和儀式。只有孔子教義，不要特殊的傳教徒，也不要特設的禮拜堂，又不要一切特定的崇拜禮節和儀式；但孔子教義一樣能深入人心，和廣泛的宣揚。這又是孔子教義之另一偉大處。

再換一方面說，耶、釋、回三教主要都是講人死以後的事，教人如何進天堂，如何得涅槃；獨有孔子教義只重在生前教人如何做人，如何做成一理想的人，教人如何處世，如何做成一理想的社會和理想的世界。因此我們說：耶、釋、回三教是出世的，而孔子教義則是入世的。

因此耶、釋、回三教在社會上，都需要他們一種特殊的地位。佛教入中國，即有「沙門不拜

孔子則稱爲「至聖先師」。

凡學儒學，其主要目標，即在學爲人，學爲聖賢，而其道即是師道。

孔子學不厭、教不倦，教學相長，學此道同時亦可以爲人師。

故中國歷史上每一大儒，則無不是大師。

二

我曾有一次與日本某教授討論到中國文化對日之影響。

某教授告訴我，日本人風俗，父母罵其子女，常有「汝不算是人」之語。此語舉世各民族皆無，獨中國有之，此即是日本所受中國文化之影響。

我謂即小可以見大，此語中正涵有極深極大之意義。

中國人說人，即見「天下一家、人類平等」之義。如稱中國人、日本人、歐美人、非洲人、馬來人等，人則總是人，其間更無區別。

但人類雖屬平等，而人之中則自有等級可分。最高是聖人，最低則不算人。

中國古人說：「人爲萬物之靈。」因其能受教育，能有修養，能從文化傳統中陶冶，能知爲

人之道。

孟子說：「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

可知一自然人，則與禽獸生物，僅有幾希之分別。

孟子又說：「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辭讓、是非之心，非人也。」

後代中國人，乃有「不爲聖賢，便爲禽獸」之說。此乃中國文化中有特殊意義之一項大理論。

中國父母罵其子女不算是人，即從此一大理論。

因有此一理論，遂見出師道之重要。

三

師道之重要，即在傳授此道，解釋發揮此項大理論，教人實踐此爲人之道。最低限度，不要淪爲不算人。

中國古人又說：「經師易得，人師難求。」

中國古籍，主要所講，本即是此項大理論，即講究此爲人之道，凡修、齊、治、平皆屬

既爲人，即必然有其爲人之道。

如從事政治，政治是其職業，但從事此項職業者，其起碼條件必須是一人。

從事工商業，其起碼條件，也應是一人。

從事教育工作，其起碼條件，即教師本身也該是一人。

此項理論，本極淺顯。

所謂是一人者，即指其能知爲人之道，能守爲人之道言。

若從事政治，只懂做官，不懂做人，則其政事必亂。

從事工商業，只知經營業務，不知爲人之道，則其工商業亦必敗。

從事教育，身爲人師，其自身並不知亦不守爲人之道，試問向彼受教者，何從而能知能守此爲人之道？如此則必教壞了向彼受教之子弟與青年。

五

今天人類社會，問題愈趨於複雜與紛亂。其主要原因，即在大家不講究爲人之道。若要講究爲人之道，則同此人類，即應同此道。

無古今、無中外，既是同此人，同此道，則人類文化，應可成爲一大傳統、大合協。中國古人所謂「道一風同」，此社會自能上軌道，世界自能轉趨和平大同之一境。

其主要責任，則應由爲師者來擔任。

試問，此一責任何等重大！

故中國古人又說「尊師重道」，又說「師嚴而道尊」。

此道即是上面所說的爲人之道。

爲人師則應與此道能合一不分。爲師者即是此道之活榜樣。故重此道則必尊其師。其師獲得有尊嚴，其道才始得有尊嚴。

今天的社會，許多人不知有此道，因此也不要求爲師者來任此道。我們當教師的，也多不知有此道，因此也更不想由我自身來任此道。

如是則教師一項職業，終至成爲窮無所至，不得已而勉強爲之的一職業。

爲世界人類著想，爲我們教師自身著想，此風非變不可。

請由我們當教師業中之少數有志者能起來提倡，一振起之。

一面請由我們自己努力於此爲人之道，一面將此理論隨分宣揚。

當然人必需做事，事必需由人來做。兩者不能嚴格做一個分別。

但在東方人看來，沒有做過大事業的，也可是一好人，而且可以算是一個上上等的好人。做了大事業，並不算得是一好人，或許是一壞人，而且可以算是一個下下等的最壞的人。

今天中國大陸有所謂「批孔揚秦」的運動。

孔子只是一個教育家，並沒有做什麼驚天動地的大事業，但中國尊之為第一位的大聖人，兩千五百年來為中國人所共同崇奉。

秦始皇帝併吞六國，統一天下，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最偉大的大皇帝，但此下的中國人並不看重他，而且算他是個極壞的壞人。

又如富人與窮人，由中國人看來都一樣。富人中也有好人，也有壞人；窮人中也有壞人，也有好人。

做人要爭一個好壞，不在乎爭一個貧富。

今天中國大陸上的共產主義，稱窮人為「無產階級」，稱富人為「資產階級」。好像無產階級都是好，資產階級都是壞。

這把東方人道理來講，萬萬講不通。

文化與地理之關係，此治人文地理學者，盡能言之，然使忘卻歷史大趨勢，則人文地理之影響亦有一概而論者。希臘之氣候山海，豈不古今如一？何以在古代則發燦爛之光輝，在後世則未見有大過於人者？英倫三島之氣候山海，亦豈不古今如一？何以在古代則沉鬱不彰，在後世則扶搖直上？繼今以往，則三島之黃金時代殆亦將爲歷史之陳迹矣，此何以故？苟非綜觀人類歷史演變大勢，而僅以人文地理學之條件說之，則每見爲窒礙而難通。余所謂人類歷史演變之大勢者，乃指其與人文地理有密切關係者而言，則最要者莫重於交通。交通者，實人類歷史影響於地形之一最要事項也。故就各地域分區討論其文化之演進，則有兩觀念當平等注重：一曰氣候，一曰交通。氣候乃先天之宿命，而交通則後天之機運，必會通二者而觀，乃可以發見各地域文化演進先後與其盛衰起落之所以然也。

二

若專就氣候論，則歐洲文化先興於希臘、羅馬和煦晴朗之區，再向北歐寒冷陰晦之地域演進，此乃文化移動之常態。而中國文化則先興於北方寒凍陰晦之區，再向南方明朗和煦之地域演進，與歐洲情形適得其反。然若再就交通條件會合論之，則知中國文化之自北而南，亦自有其不

得不然之理由。西方古代文化之產生，蓋以島嶼港口爲基點，而以海面交通爲其文化長成之大平面；中國古代文化，則以黃河水系之各支流所灌溉之耕地爲其文化產生之基點。此自上游有涇、渭，下至中流之汾、洩、伊、洛，及於下流之漳、衛諸川皆是，而華北平原則爲此諸基點相互交通之大平面。故歐洲文化之交通命脈賴諸海，中國文化之交通命脈則賴諸大陸。其時長江流域則尚不適於初期文化新生時代之交通，故江域氣候較溫暖，而反不得爲中國文化之先興地也。若推此論之，則知近代英倫三島所以得佔歐洲文化之一主要樞紐者，實不在其氣候而在其交通。彼之沾後天機運之賜，實遠超過其先天之宿命。苟使機運未熟，則如古代之英倫三島，又誰知其將爲天之驕子，如今之地位者？故英倫實先天之宿命不足，而後天之機運有餘之一好例也。

今若專就交通條件言，則又有當明辨者。夫環境不宜於僻塞，若僻塞則與外隔絕，此固盡人而知其不利矣。然若地居四衝八達之中心，爲交叉之午道，其害亦與僻塞者略相等。大抵地居衝要，常受四圍之影響，不易寧定，則其文化必漸衰落。蓋衝繁之地，其風囂而不淳，其氣浮而不實，其心散而不凝，其生活易於奢汰，其習俗易於誇詐，至其易受兵燹戰鬥之禍，則尤爲顯而易見。故最理想之交通條件，貴能開門即當大道，而閉戶又能自守，寓安定於活動之中，備保守於進取之際，此始爲最理想之交通條件，亦即最理想之文化條件也。

氣候、交通兩者條件俱備，斯其地之文化必蒸蒸日上。然日上不已，則人事勝過天然，四圍之交通日湊日集，雖非衝道而自成爲衝道，雖非中心而自成爲中心；故曰「凡路皆通羅馬」。至於凡路皆通羅馬，而羅馬之衰落亦可翹足而待矣。此則後天之機運可恃而不可恃，凡人類文化之不能脫離生老病死之四境，此亦其一大因緣也。

根據上述，一地方之文化，方其臻極盛之境，則勢必漸趨於衰落。欲求一國文化之常榮不謝，則先求其疆域之恢宏，爲一統之大國。於是某一地區之文化雖由盛而衰，而常有他一地區之新人文、新生氣接踵繼起。而其繼起者仍在其國內，不在其國外，仍不失其本國之傳統，則其國之變化始可達於常榮不謝之境。若使歐洲爲一統之大國，則希臘、羅馬之文化，雖至今存可也。若使中國亦四分五裂如歐洲，則黃河流域、洛陽、長安之文化，雖謂其至今必已衰熄無存焉，亦未見其不可也。故曰論文化史者，不可不注意於其地理的條件。

三

今論中國文化此後新生機之所託命，則大率不外兩區：一曰東北，一曰西南。然東北氣候寒冷，此乃先天宿命之不足，又正當國際勢力爭衡接觸之焦點，其勢常不得寧定，此又後天機運之

未美。西南以氣候言，既較東北爲佳，以交通言，此乃國家奧區，爲臟腑腹地，與東北之暴露於外者又不同，居其地者，易獲安全寧靜之感，此尤合於文化滋長之條件。然則中國文化此後新生機之萌茁，蓋捨西南莫屬，此理雖玄，其實固可具體指述，盡人首肯也。

今分論西南諸省，則四川文化開發特早，與黃河流域之古代文化交通最先，不當與西南其他諸省相提並論。其次湖南、廣東、廣西三省，雖較四川開發較爲落後，然在中國近代文化史上則已先後露其頭角。所謂西南諸區，將佔中國文化新動力之主要地位者，湖南、兩廣固已稍透露其消息矣。惟雲南、貴州，於西南諸省中，固尤爲奧區之奧區，尤爲偏隅之偏隅也。然論雲南一省之氣候山川、土壤產物、風景形勝，則得天之厚，殆莫倫比。故雲南省在中國以往文化地位之不佔重要，不在其先天宿命之薄，而在其後天機運之遲。若使雲南早得人事之助，交通發展，去其隔塞僻陋之病，則雲南人文必將蔚起，其在全國文化水準之比度，必將高出於西南其他諸省之上，此亦無足疑者。今則後天機運已開，國內外交通繼此可以逐步發展，雲南雖爲中國之奧區腹地，而未嘗不足以通國際間之呼吸；雖與國際呼吸相通，而又得長保其安全寧靜之感，此最爲交通上難能可貴之條件。雲南既擁有先天特賦之優厚，而後天之機運自今將與之相得而益彰。就此種種言之，雲南人文，在最近之將來，寧有不爲中國文化新生機、新動力之主要一脈者？不佞以

促而急迫之心情失敗。從此以下的中國，瓜分滅亡，流爲一時之口頭禪。梁啟超特地寫了一篇中國不亡論，算是鼓勵振作了當時不少全國惶惑頹廢的心神。迨至「五四」運動的前後，又有所謂「中國不亡，是無天理」的話，在當時居然成爲大家首肯認爲含有至理的名言。

當「九一八事變」突起，我那時正在國立北京大學教書。「九一八」清晨，北平報紙披露此項消息，正值星期日，學校方面還沒有什麼舉動。翌晨星期一，我從西直門附近坐車到北大紅樓上課，一路便見到一隊隊大學生、中學生與小學生，手裏揚著旗幟，口裏呼著口號，繼續不絕；而沿街壁上也已貼滿了種種標語。我叫車夫緩緩徐行，好讓我一路聽他們的口號和看他們的標語。

迨到北大課堂，我的一班學生卻照常仍來上課。他們說：今天不用講什麼，願我對此突起的瀋陽事變發表一些意見。我當時便說：「此事正在發端，我同你們一樣受著甚深刻的刺激，但我此時卻感無話可說。而我所要說的，則是今天一路四十分鐘內所聽見、看見的一般學生們的口號和標語；這是北平智識青年對此事極自然的心情反應之流露，我禁不住要說幾句話。」當時大家便渴望要聽我的意見。我說：「我一路所見所聞，北平學生界的口號與標語，最奇怪的，是他們不約而同的一致的情緒與態度。讓我挑選一句話作爲代表。譬如說：『寧作刀下鬼，不爲亡國奴。』」這十個字已足十分代表出我一路所聽所看標語與口號之總意見與總態度。我覺得偌大一件事，在北平

後，似乎智識青年們的情緒便漸漸變了。大家漸漸看到中國還不至於亡國，而且漸漸的大家認為中國已確有了最後勝利的把握了。但是在此期間，全國智識青年的情緒與心境，卻亦未見其活躍，未見其懽忻與鼓舞，未見其對新的將來有所抱負與期待。讓我鄭重說一句，這幾年的中國青年，似乎轉而又消沉了。這不是沉著，實在是消沉。本來刺激我們、鞭策我們的只是一些消極、悲涼、反面而退一步的想像，我們並沒有積極的、快樂的、正面的、進一步的雄心與熱情。現在反面的鞭策與刺激漸漸消失，正面的鼓舞與期待尚未開始，我們的意境自然是只有消沉。

以上的一番話，我並不著意在指摘青年，只求藉此指出近五十年來中國的時代病，而把智識青年們作為當前的實例。亡國與餓死，兩重陰影，常是壓迫在我們的心頭。進一步則為出身救國，退一步則為安心找職業謀生。這已是近五十年來病態中國下之標準人物，已是站在中國社會的最前線，值得我們的稱揚與禮敬。上面述說的智識青年，便是榜樣。沒有雄心，沒有熱情，沒有勇氣，向積極正面作進一步樂觀的盼望；對國家前途只求其不滅亡，不瓜分，不為印度、波蘭之續。根本沒有想到龍飛鷹揚，稱霸稱雄。這一個國家自卑的情緒，影響到個人的人生方面，亦按比例的自卑自賤。近五十年來的中國人，無論在政治、學術、軍事、工業，一切人生的各方面與各部門，實在夠不上說有雄心、有熱情。他們亦如對國事般，只求做到適可而止。他們似乎用

的自我批評的理智的成分太多了，而自我尊重的情感成分則太嫌稀薄了。他們並不想做第一等人與第一等事。至少在世界的場園裏面，他們是謙讓不遑的。救亡與謀生，是這一時代最高的理想。模倣與鈔襲，是這一時代最高的理論。從此一種自卑心理上直塌下去，便招致了中國目前種種的病態。

一個老太太戟手指面的教訓他的兒子，說你再不奮發爲人，你便只有流爲乞丐，轉爲餓殍。這樣的教訓，在他兒子的眼前只有漆黑，在他兒子的心頭只有冰冷。漆黑與冰冷中間，培養不出光明與熱烈。一個人常常惦念到失業與餓死，他到底將不免於失業與餓死，否則也不過僅免於失業與餓死而止。人世間的一切光明與熱烈，早已沒有他的分。近五十年來之中國，常要惦念到印度滅亡與波蘭瓜分；康南海之大聲疾呼，與清德宗之涕泗橫流，這是五十年來中國病上加病之新徵候。這五十年來病上加病的中國，至少可以告訴我們一個真理：抹殺了你自已，便不配再有出路。抹殺了你自已而再求掙扎，全是白費力。抹殺你自己，便只有消極、悲觀。從反面退一步着想，全是冰冷與漆黑，沒有光明，沒有熱烈。最後的結果，只有直塌下去，要再確立你自己，便只有轉身向你自己的本身找求。這是惟一積極正面可樂觀而進步的一條路。幸而數十年的病魔糾纏，到底掩塞不住數千年生命大源之澎湃與洋溢。正在此五十年代病上加病的中國，內部新生

七 五十年代中之中國思想界

中華民國這五十年，可謂走上了一個歷史劇變的時代。不僅中國本身如此，即整個世界同時也走上了一個歷史劇變的時代。照理，在此時代中，該激發思想，要求有思想家出現。而不幸這五十年來，在中國，竟無一個思想家可覓。在中國思想史上，這一時期，將來會只留一空白。空白尚好，更不幸的，還塗上了許多污點，有待此後人來洗刷。

所謂思想，最先必能提出問題，次之是經過縝密精詳的討論，然後才得一明確肯定的答案。不論任何一個思想家，該有如是的三階段。即或只有第一階段或僅到第二階段，也可以。而就整個時代言，必有此三階段之進程。而此五十年來，似乎連第一階段也還未走上。即是說：究竟我們這時代，問題在那裏？還沒有人來提示、來指出，而爲此五十年代中人所接受。

好像此五十年來，言論作爲，都有著很多劇烈的爭論和變動。然而這些只是所謂運動或潮

流，風起雲湧，不斷掩捲著全時代，但亦只是運動與潮流而已。在此運動與潮流之內部，則並無一項思想在領導。率先是幾個人之武斷偏激的意見與意氣，追隨之以大羣眾之盲從與附和。其興也驟，其衰也忽。只是些歷史事變，寫不進思想史的章節中去。

首先要提到在此五十年代中之所謂「新文化運動」，大部分只是中國社會在感受外來影響，追隨世界潮流，而並沒有形成爲一個思想問題或思想系統而出現。即如他們所舉最大最主要的所謂賽先生與德先生，科學與民主兩運動，也只是表示許多人的共同意見、共同態度，憑藉著幾個標語與口號而宣揚散播開來，始終未能在此方面深入而嚴肅地轉成爲一個思想問題而存在著。

在正面則是感受外來影響，追隨世界潮流；在反面則是對中國固有文化之唾棄與抨擊。如打倒孔家店、線裝書扔毛廁裏、廢置漢字，和全盤西化等。此等也只是標語、口號，全是一種偏激的意見和態度，並不會轉變成爲一種嚴肅的、深細的思想問題來討論、來爭持。在當時，這些只求形成爲一個社會運動，所以都憑藉著感情和意氣來轟動一時視聽，希望羣眾之接納；而並未訴之於深細嚴密之思想系統，來剖析其問題之內在性和其向前之深入性。

與新文化運動相輔而前者，有「新文學運動」。新文學運動只爲新文化運動作工具。如云「哲學關門，打倒玄學鬼，禮教喫人，隻手獨打孔家店的老英雄，打倒孔家店，線裝書扔毛廁裏，

封建社會那一套標語廣播到全社會，這些是不需再思想的，而且也並無確切內容的。只要你所不喜歡的，便可分別歸入孔家店或封建社會之兩大系統之內，而儘你自己的努力去設法打倒。在如此般的所謂學術風氣、時代思潮之下，很難有健全而純正的思想態度，浮現到社會的顯明面來。

或說上所指摘固有理，但此五十年來，也有不少埋頭在學術界的，不能一筆抹殺了。此話誠然。但不幸此五十年來的學術界，亦有不少，而且可說是佔著大多數的，卻還是追隨結集於此兩大系統之宣傳標語之下而努力。若我們說一句或許是過分嚴酷的話，此五十年來之思想家，可說是思而不學的。此五十年來之學術界，則可說是學而不思的。正為此故，乃能沉瀝一氣，互相呼應，來形成此五十年代之種種的悲劇與惡果。

關於宣傳共產主義方面之所謂學術研究，此不具論。關於宣傳新文化運動方面所引出之學術研究，亦可舉出一句標語來作為此方面研究工作之中心，此即所謂「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其實此一標語之內涵，已是一種極狹義的武斷。此一標語之言外之義，已經包括有哲學關門、舊文學成死文學，及中國文化歷史傳統全不如人、亟須全盤西化等意見在內。否則若把此標語稍加改變，說成以科學方法整理中國哲學、以科學方法整理中國文學，及以科學方法整理中國歷史文化傳統云云，將全成為不通之語。正為此故，若有人試在學術方面來重新闡述中國哲學思想，或宣

揚中國文學精義，或發揮中國歷史文化傳統之意義與價值，在彼輩都可認為是一種落伍不前進的、反動的不科學。因此，在所謂「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之標語之下，最好不觸及哲學、文學及歷史文化傳統，而只分散著當作一堆堆材料來研究。而其研究所得，亦決不能對中國以往的哲學、文學及歷史文化傳統有積極的、正面的、不該被打倒的擁護態度。

因此，我們不得不認為此五十年來之文化運動及其學術研究，乃沆瀣一氣，互為撐鼓者。一方是思而不學，一方是學而不思。在此項所謂思想潮流之下，決開不出真學術。在此項學術風氣之下，亦決引不出真思想。

但上所云云，究竟像似太嚴酷了。我們決不能說此五十年代中，無思想、無學術。惟此種思想與學術，乃被擠於社會之一角落，乃被壓於社會之隱暗面。若要說代表此五十年代之思想與學術者，則斷斷在彼不在此。說不定，過些時，那些宣傳標語為人厭棄，下面又重新走上一個真有思想的時代。到那時代，他們重新來敘述這一時代之學術與思想，或許他們會另具眼光，另作批評。在他們那時，或許會提出此五十年代中曾有過那些那些的思想來。但此是以後另一時代的事。在我們這五十年代中，要來敘述這代表此五十年代的，則只好說僅有些對群眾宣傳的標語口號而已。也只好說僅有些對群眾所求發動的某些運動而已。若要說代表此五十年代者，定必有一

這一階段早已來臨。

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奪得政權這一番玄想，不如黑格爾的日耳曼民族與日耳曼精神之易於獲得確定之支持與表現。直要到列寧、史太林蘇俄革命完成，才又把馬克斯那套哲學加以一番修整，即此種無產階級崛起之領導責任，落到大斯拉夫民族的肩上。這是黑格爾與馬克斯兩人的歷史哲學各自變質後之合流。

二

最近五十年來之中國，雖沒有出過像黑格爾、馬克斯般的歷史哲學家，但在一般知識分子的腦際，卻浮現出一套共同的歷史哲學；好像在說，必須打倒中國以前的歷史，才能謀中國當前之出路。至於未來的理想呢？這在近五十年來在中國所流行的那一套歷史哲學，是和已往歷史同樣沒有地位的。中國知識分子，似乎只想接受別人領導，他們的理想也便是我們的理想。我們要接受他們的理想，服從他們指導，才該先推翻自己已往的歷史。這一套哲學，並不由三十年來的中共所提出；三十年來之中共，只是在此一套哲學中撫育長大。

大家知道，中共今天是在毀滅中國史，改造中國史。但已往的歷史是否真能毀滅，真能改造

世界地位上之比較的窮與弱。此早已是一種變相的唯物論。務求抹殺自己來模倣他人，則此刻對症下藥，列寧、史太林的一套哲學，無怪要風靡一時。

最近五十年來中國人對自己歷史之不瞭解，對自己文化之不信任，寧爲一無可否認之事實。又經此幾年來中共之徹底掃蕩，徹底侮蔑，我們對此憤慨的也該有一反省。對將來之前途，也該有一警惕。中國人究竟該不該知道一些中國史。若該知道，則該使我們知道些什麼？現在的中共，只要人知道中國近百年史，不要人知道百年以前史。百年以前史，依他們目前意見，只要你知道黃巢、李闖。我想大陸人民對此那一不憤慨！然而我們該回頭想一想，中國史上除卻黃巢、李闖，究竟有那些人物該先叫中國人人人知道呢？我想提出這一問題，恐怕急切是得不到結論的。目前的中共，只認中國史上兩千年來的一切文化是封建社會的文化，所以該推翻、該破壞。但我試問；若此兩千年來的中國文化，並非只是所謂封建文化，又是什麼一種的文化呢？我們也該有一答案。若我們說，此兩千年來的文化，只是一種愚弱貧病的文化，只是一種太監、姨太太、鴉片煙、麻雀牌、纏小腳、扶乩及其類似的種種之文化，只是相當於西洋中古文藝復興以前所稱黑暗時期的文化；則中共今天的措施，似乎也未可厚非，我們不該憤慨，該反省、該警惕。

些中國史上人物作爲之是非功罪。我想中國史上第一個值得我們推尊頌揚的大皇帝，首先應該輪到秦始皇。因爲秦始皇懂得用政治來統制思想，他能焚書坑儒。但秦始皇依然不夠偉大，因爲秦始皇目空一切，他還不懂得向外國皇帝靠攏學習，他還不懂得一面倒；他想關起大門，做中國的大皇帝；這是秦始皇之不夠偉大處。

中國史上第二個值得我們推尊頌揚的大皇帝，我想應該輪到石敬瑭。石敬瑭才始瞭解到一面倒的建國方略，他能拜耶律阿保機爲親爸爸，他能在耶律阿保機馬前下跪，接受「兒皇帝」的寶號。但石敬瑭也復依然不夠偉大。何以故？石敬瑭本身是一個外國佬，他以外國佬的身分在中國做皇帝，來尊奉另一個外國皇帝作他的乾父親，作他後臺的保鏢者，這是不夠偉大之第一點。若使石敬瑭本身是一個中國人，而肯拜認外國父皇稱子稱臣，那才是更偉大的象徵。第二點，石敬瑭之不夠偉大，在於石敬瑭僅知一面倒，而不懂得思想統制。秦始皇偉大在這一邊，而石敬瑭則偉大在那一邊。他們各只能偉大到一偏一側上。

中國史上第三第四個值得我們推尊頌揚的大皇帝，我想應該輪到黃巢和李自成。他們是農民革命的倡導者，他們開始懂得清算鬥爭，由恐怖大屠殺、大流血的場面下獲登皇帝之寶座；這是他們倆較秦始皇、石敬瑭之偉大處。但他們倆仍還不夠偉大。何以故？他們倆似乎全不懂得思想

不過歷史究竟是一種客觀的存在，它有它的力量，有它的作用。我們只能說：由中國五千年來的歷史，形成了今天中國四億五千萬國民的心理。中國共產黨憑其一時的幻想，要來扭轉歪曲中國當前四億五千萬國民的心理，那不是一件輕易隨便的事。若要憑中國共產黨一時的幻想來從頭改造中國舊歷史，那豈止是愚公移山，精衛填海！然而無論如何，毛澤東已經成為中國史上的一個人物，他將與秦始皇、石敬瑭、黃巢、李自成一體寫進中國史，他將由中國史來批判、來衡量其作為的是非功罪。這一層，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似乎也懂得。因此他們不得不先下手為強，趁他們及身得意的時候來趕緊改寫中國史。這無異在告訴我們，一部中國史已經在無形中用一種重重的壓力壓在他們的心頭，使他們不得不如此幹。這裏便是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的前途的一片絕望的悲哀。

讓我告訴他一個極平常極淺易的道理：你儘可向活人清算，你儘可向活人鬥爭；但你千萬不要清算到死人身上，向死人去鬥爭。活人向死人清算，向死人鬥爭，是絕不會成功的。現在的中國共產黨已經清算到中國以往五千年來的死人羣中去，已經在向中國五千年來的無量數的死人作鬥爭；那可白日見鬼，有力無使處，非至大禍臨頭，是決不會有別的下場的。

代，他們本是長城外的異族，踏進長城來，佔領了中國，那時內外蒙古，也做了滿清忠順的外藩，因此滿清政府，比較沒有注意到長城之興修。到晚清道光年間，龔自珍漫遊居庸關，看見關防年久失修，不爲朝野所注意，他還曾爲此寫了一篇文章，隱隱地發露了他的一腔幽憂與無限感慨。民國「九一八」以後，從山海關到居庸關的一段，還曾在中國國防史上盡了它最近的一些責任。總而言之，中國自先秦以來，至今兩千幾百年中間，對這長城只有不斷興繕，最多是任其頹毀，卻沒有立意來拆除的，有之，是今天的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只就此一件事而論，便是中國歷史上破天荒的一番大革命，直是驚天動地，值得大書而特書的。

據中國共產黨自己的廣播：說長城堪被認爲建築材料的無盡資源，他們拆除長城所得的材料，首批已運抵北平天津充建設之用。粗看，中國共產黨拆除長城，是爲他們利用長城磚石來充其龐大城市建設的一種唯物物的打算，但我想這恐不那麼簡單。若專在物質經濟上計算，拆卸運輸所化的工力，和所得的一批磚瓦，兩相抵消，是沒有多大利益的。我想共產黨這一偉業，依然是他們一貫的作風，他們拆除長城，是存心作爲對中國全國人民實施一門精神教育與心理革命的深微而刻至的課程用的。

中國共產黨的立國精神，是主張一面倒的，他們一面倒的目標，正是在古長城之外面。萬里

長城是中國歷史中國民族精神一個最偉大最有力的象徵，象徵著中國民族愛護邦土，愛護自己傳統文化，累積幾千年，不斷地屹立在中國的國防線上，是用中國民族自古相傳的千萬億兆的血肉來堆垛來凝固的一條民族界線。中國共產黨今日所首先要拆除的，便是這一條民族防線，便是這一條文化防線，便是這一條精神防線。所以毫不留情，毫不客氣地要請中國那條萬里長城的一塊塊磚石，都進集中營，要它們學習毛澤東思想，要清算它們兩千幾百年來的頑固落伍的民族觀念，要它們卸除精神武裝，要它們坦白，要它們一面倒，倒向新中國的主子無產階級的祖國的懷抱裡去。萬里長城卻是一分祖傳遺產，是一分中國民族精神上的無上產業，是中國歷史傳統裏最具體的一個結晶品。保留萬里長城，無異是保留中國史，無異是保留中國民族之精神武裝，無異是保留中國民族之文化遺產，要學習毛澤東思想，這些絕對不該保留。這是中國共產黨向中國民族中國歷史正面樹起革命大旗的唯心的作風下必然應有的一番舉措。

只有共產黨才知道，萬里長城一塊塊的磚石，都是中國老百姓們一顆顆愛邦土愛民族的心表示，才有這一塊塊的磚石輸送到邊塞去，而堆垛起來。現在是再要中國老百姓們一塊塊把它們拆卸，把它們輸送回來，從拆除長城來拆除中國老百姓們歷古相傳的那顆愛邦土愛民族的心，來轉嚮到毛澤東思想，來破除國防，來一面倒向無產階級的祖國，來向世界其他愛邦土，愛民族傳

共產黨拆除萬里長城，又回念到臺灣國民政府一隊隊飛機一批批軍艦之無能的脆弱。我爲中國歷古相傳的萬里長城之一塊塊被拆除的磚石，又不禁回念到中國五千年來龐大建國史上的無盡之資源。

（民國三十九年香港華僑日報三月二十三日

專論，四月民主評論第二十期轉載。）

一二 極權政治與自由教育

人類所以需要教育，不僅爲的是傳授智識與訓練技能，更要的，該是爲的真理之探討。而探討真理，則絕對必須容許思想之自由。

人類探討真理所經歷的路程，那是極曲折，極艱辛，又極漫長，而似乎必然將無止境的再向前。已往人類對於宇宙人生一切真理之逐步發現，都由於歷久積累與不斷改進，而始有今日之成就。但我們依然相信，人類前途，有其繼續演進的永久的將來。我們決不會承認，目前人類，已把握到宇宙人生的一切真理。同時，我們也不會承認，目前人類已然獲得了關於宇宙人生的若干真理，乃是某一時期某一人之獨特智慧之成果，而可無待於人類長時期多方面的智慧之共同參加其工作。而且我們也決不會承認，目前爲我們所共同認爲是真理的，再不會經後代人之改進或變動。

馬克斯的人，而且也不能再生一個相等於馬克斯的人。試問這項斷定，是不是真理？而且我們既然崇拜馬克斯，若果遍讀馬克斯的書，在馬克斯本人，實在並沒有明白主張過這真理。然則又是誰在主張這真理呢？

史太林和毛澤東，似乎在主張這真理。那麼，在馬克斯以後，豈不還有人在繼續發現馬克斯本人當時所未經發現的真理嗎？既如此，史太林、毛澤東，也同樣是個人，他們能在馬克斯以後，發現馬克斯本人當時所未經發現的新真理，為何其他別人便絕對地不能呢？

若使我們承認了，在馬克斯之後，還有人能繼續發現馬克斯當時所未經發現的真理；則我們的教育，應該再回到民主和自由的路上去。

教育事業的對象是青年，必得尊重青年，才算尊重了教育。青年為何該尊重？因青年代表著人類之下一代。我們必得信仰，人類之下一代，可能勝過於人類之上一代。我們至少該希望，人類之下一代，可能不低於人類之這一代。至少能相等於人類之這一代。如是而教育事業才始有其意義與價值。如此則我們又要問：縱然我們是崇拜馬克斯，信仰馬克斯，而我們憑何真理來壓低我們的下一代，即來向我們受教的青年們，硬認為在其中，絕對沒有一人該異於馬克斯，能勝過馬克斯，而必須讓他們經受那種洗腦的教育呢？而且我們又得問：馬克斯在當時，因於他主張

人生真理中，有時也得有犧牲。但我們必該強調下面這一點，即只該由於其人之自動，即出於他之自願而犧牲。不該單憑任何一方之自認為真理，而強對方作犧牲。即或多數方面認為是真理，也不該強少數方面作犧牲。根據人類文化歷史悠長的演進，探討真理，是何等地曲折而艱辛的一條漫長的路程；儘有時，多數方面未必是，少數方面未必非。而且真理必該是自明的，因此誰也不該憑他所謂的真理來逼迫不認此真理者作犧牲。若憑真理逼人作犧牲，那他所憑的真理，早變成了強權。逼人作犧牲尚不該，而況是騙人作犧牲呢？極權政治是逼人作犧牲的大兇手。極權政治下的教育，則是一個誑人的大騙局。

爲多數犧牲少數，若果出於少數人之自願與自動，這還是可認許的。但人生真理中，絕無爲著目前現實而犧牲將來的真理。真理探討，在人生工作上，是一無窮的；試問將來那能自動自願的爲目前作犧牲呢？青年則代表著下一代，代表著將來。若我們專對目前現實的利害打算上，認為是真理了，我們硬想把這項真理，十足灌輸給青年，甚至把青年的頭腦，也裝進鐵幕中；不僅把人的思想封閉進鐵幕，連人的見聞視聽也封閉進鐵幕，不許他們接觸到在我們所認為是真理以外的一切探討真理的思想和言論，又不許他們有自由思想和自由選擇之餘地，更不希望他們有自由創見與自由懷疑之可能。把代表著下一代的青年們所應有的自由探討真理的熱忱和勇氣打消

了，把他們所能有的自由探討真理的智慧和聰明窒塞了。如是則真理將成爲一死局。人類直到無窮的將來，只要依照這樣的一種教育法，將使此後人類永遠不會再發見新真理。只要是違反了自由主義的教育，其結果必然會如此，必然會扼殺了真理的生命。真理扼殺，則人類將永遠無前途，那不是爲了目前而犧牲將來嗎？然而我們的目前是短暫的，人生決不能片刻停止在目前，有將來才始有目前之存在。因此，犧牲將來來照顧目前，決不能成爲人生一真理。

而且不許有自由思想的教育，在其立場上，早已抹殺了受教育者的尊嚴。他們絕不爲受教育者留一或許能超出於其所受教者之餘地。人類因於出了一個聖哲如馬克斯，而永遠把真理的再發見斬絕了。如是般的教育，輾轉相受，只有一代不如一代地後退。人類的將來若果是無窮的，試問這樣一種的教育，是否也會隨人類之無窮而無窮呢？若果這樣的教育，真能隨人類之無窮而持續，試問那時的人類，將會墮落到怎樣一個情狀呢？而這一類的問題，則爲當前的極權主義者所絕對不顧慮。

因此我們說，扼殺了青年的自由思想，即是扼殺了下一代的人生探討真理的道路；扼殺了下一代探討真理的道路，即是扼殺了下一代的人生；而這一代的人生便成爲短命，將無前途可言，亦即無存在可言。

然而，青年們的內心，則永遠是純潔的。青年對真理的嚮往，則永遠是熱忱而具有勇氣的。青年們若得爲真理而努力，他們是永遠慷慨，永遠無所顧忌的。目前青年們所面對的現實，不容掩飾，有許多的混亂、錯誤，甚至是黑暗與罪惡。人類距離到達全部真理的光明境界，還是如此其遙遠。而不幸竟來了一批出賣廉價真理的偽善者、狂熱者。在他們認爲，宇宙人生一切真理，已全給一位聖者無遺漏地指出了；而且是獨特無二，只此一家，已包攬了宇宙人生一切最高而無誤的真理。雖經那位聖哲之發現，卻還待於後人之證實；爲要證實該項真理之必然是真理，必然是獨特無二、包攬無遺的真理，則有需於我們之努力與犧牲。青年們經不起這批偽善者與狂熱者之麻醉與煽惑，儘有勇往直前來爲這個聖潔的任務作犧牲、供驅遣的。這正是人類青年之可愛處，而也正是這些偽善者與狂熱者之罪大惡極處。

說到這裏，我們得回就自由教育一面再說幾句話。本來爲人類繼續探討真理，是教育最大的宗旨。惟其探討真理，是如此般一條曲折而艱辛而漫長的路程，因此不得不儘量提倡自由思想，把這項工作，直放遠到人類無窮之將來。又不幸而在自由主義的教育之下，有些人，則把探討真理的最大宗旨，其先或許爲的是慎重，而終於擱置一旁，而忽略了，遺忘了；陷於目光短淺，專注意在傳授智識與訓練技能的兩個項目上；如是則不免成爲專爲職業功利智識技能而教育。這樣

歷史之常的中間，卻可以叫人明瞭各時代之變之內在意義乃及其所以然。

因此我們該從歷史來瞭解時代，不該從時代來估量歷史。

讓我們具體地說：若你單憑最近四十年來中國時代之變，你決無從判斷四千年來之中國歷史。但你在四千年來中國歷史之不斷演變中，卻可幫助你瞭解最近四十年的新中國。

同樣的理由，你不該單憑一百年或兩百年來的世界演變來推測從頭的世界史，但你可從整部的世界史之不斷演變中來更明瞭最近一百年或兩百年的新時代。

二

何以說不該憑時代來估量歷史呢？

無變不成歷史，治史學者首貴識有變。然變的因素則極複雜、極錯綜，從多方面錯綜複雜的相互關係中引生出各時代種種之變。變之來臨，因其極複雜、極錯綜，由多方面的關係所促成，遂不易為囿於某一時代之某一方面、某一角度之短暫與偏狹的理解所把捉，於是遂只有求助於史學。

歷史由積變而成，在此積變中自成條貫，自有系統。此種積變中之條貫與系統，用近代人術

何由得之？斯賓諾莎乃一泛神論者。彼之所謂永恆，殆歸屬於上帝，於神。吾儕之所謂永恆，則將歸屬於人類，歸屬於人類之歷史與文化。

吾儕當轉換斯賓諾莎的口氣的語法，我儕當謂：「人類應從過去世變中來尋求、來獲得其永恆的眼光。」

永恆是一種真理，永恆是一種精神，永恆亦是一種力量。此種真理與精神與力量，引生出種種時代之變；而此種真理與精神與力量，則不源於上帝與神，而源於人類歷史所積累形成之文化潛力。

時代變了，時代的現實變了，歷史將隨而變，但已往的歷史則不可變。由必不可變的已往歷史，進入必不可不變的時代現實，而於是有新時代、有新歷史、有新精神、有新力量。

若僅有一不可不變之時代現實，而更無一不可變的歷史精神，則人生將只有剎那，不復有永恆。剎那剎那變滅，將只見爲虛幻，不見爲真實；只見有轉化，不見有生長；只見有命運，不見有人生。

人生脫離不了命運，但命運不就是人生。因命運變幻無常，而人生則始終一貫。

命運積累不成爲歷史。必於命運中投進生命之努力，而始有歷史。所謂歷史精神者，即由此

翻歷史，已往的歷史，早經推翻，不待到我們的一時代。

每一時代，只能延續歷史，在歷史的不斷進程中，繼續加入創新與完成的工作。對已往歷史模糊與輕蔑的時代，那必是一黑暗悲涼的時代。刻意要對已往歷史革命的時代，那必是一狂妄與痛苦的時代。

革命的真對象是時代，不是歷史。革命的眞力量，從歷史文化的潛存傳統來，不從時代當前違反歷史的短暫現實中來。那是歷史眞理，亦是革命眞理。

六

因此，時代革命是真革命，歷史力量是眞力量。只有運用眞力量，才能完成眞革命。

對歷史革命，是一種不可能的偽革命；限於某一時代的力量，是一種短暫而不可恃的假力量；運用不可恃的假力量，來求完成一種不可能的偽革命，將見其無往而不敗。

唯物辯證法，著眼當前現實，來否定歷史傳統；如此則歷史將不因時代而持續，歷史將轉爲時代所否定。

時代否定了歷史，將成爲一種短命的時代。刹那否定了永恆，將成爲一種無意義的刹那。否

一五 物與心與歷史

只要在人文圈子之內的，一切由「心」決定了「物」，不可能由「物」來決定「心」。

讓我舉幾個淺顯的例：如衣服，若使人無求溫暖心、求輕軟心、求華麗莊嚴雅觀心，天地間縱有麻、絲、棉、毛，也不會有衣服。衣服之質料、式樣、顏色，一切由人心之欲望、智慧、趣味，改造自然物而來。

又如建築，若使人無求安居心、無求舒適心、無宗教心、無藝術心，天地間縱有泥土、木石，也不會有房屋。房屋由人心而創出，房屋必求能副人心之所欲。人心決定了建築，建築不能決定人心，泥土木石更不能。

舉目田野，山川林樹，美哉乎自然。然試設想，洪荒以來，便有此自然否？此一切自然，均經人心陶冶，均受文化支配，均為人心所決定。若使人心無欲望、無智慧、無趣味，一任自然，

苦樂。種種計較全成無計較。

人生譬如做夢，不可捉摸，不可認真。醒了，全完了。人生譬如演戲，袍笏登場，鑼鼓喧天，有貴有賤，有歌有哭。戲完了，鑼鼓停了，袍笏卸了，貴賤歌哭全不是那回事。若使是上帝創造人類，為何把人如此作弄，如此調遣？我們實在忍不住過這樣的人生，於是有所謂「真理的人生」在人心浮現。這一種真理的人生，便是「宗教的人生」。宗教人生之最大真理，認定真實人生不在生前，而在死後。但死後早已非人，早已無生，把真實人生移到死後去，這是宗教真理。宗教真理，似乎既不自然，又不真實。它所想像而追望的，在非人界，在無生界。我們是要塵世的人生，不要這非人的無生的天國。

人生逃不了自然，但終於跳出了自然，那便是「歷史的人生」。自然人生免不了變滅，會全成虛幻；只有保留在歷史上的那一部分人生，不再變滅，才是真實不虛，才是最真理的人生。

人死了，一切完了，還有什麼保留在歷史上的呢？我們再進一步問，什麼才叫做歷史呢？難道文字記載，便算得歷史嗎？若是文字記載便算得歷史，難道人的生命可以在文字記載中保留嗎？難道人能在文字記載中生活嗎？這顯然不是。文字記載並不是歷史，歷史是人事之本身，文字記載只記載了那些人事。人死了，人事並不死，依然存在。只因人事存在，所以有歷史。

什麼叫做人事呢？我問你，此刻在做些什麼事？你不能說我在做飽的事或餓的事。飽與餓只是自然，非人事。你也不能說你在做生或做死。當知生與死，也只是自然，非人事。活並非你在做，正如死並非由你做一般。飽並非你在做，正如餓並非由你做一般。非你做的事，和你不相干。我問你此刻在做些什麼事，你告訴我在喫飯。那對了，喫才始是人事。人非喫不飽，非喫不活，但飽與活不是你的事，喫才是你的事。禽獸動物也懂喫，但只不自覺；人之喫是自覺的，有計畫的。這一種自覺與計畫，才始是精神之開始，才始是文化之開始，也才始是歷史之開始。

神農與后稷，才始當得是歷史人物了。他自覺地在想喫，他有計畫地在謀如何喫。他生前做了些事，死了，他的自然人生完了，但他的事業並沒死，並沒完。自覺地想喫，有計畫地謀算如何喫，這些事，只要有人類，會永遠存在；永遠有人在自覺地想喫，有計畫地謀算如何喫。人類的歷史，也可說是一部自覺地想喫、有計畫地謀算如何喫的歷史。歷史不滅，這一部分的人生便不滅。只有不滅的，才是真實的。若使神農、后稷再生，他看見人人盡在自覺地想喫，人人盡在有計畫地謀算如何喫，神農、后稷必然快慰地想或說：你們此刻在想的與做的，正如我當年所想與所做。那豈不是你們此刻活著，正如我活著一般嗎？你與我的自然人生、物質人生是變了，但你與我的精神人生、文化人生則並未變。

喫是人生一大事，但並非人生唯一一大事。喫了能飽，能活，但飽了仍必餓，活著仍必死，到頭仍必一場空。人生第二大事在傳宗接代。趁未死前，生下新人，我死了，他可繼續活下。雌雄交配，禽獸動物也懂得，但禽獸動物仍是不自覺地在做那些事，到人類始能自覺地做，有計畫地做。於是有男女之愛，有婚姻之禮，有夫婦的制度，有父母子女的關係，於是遂有了家庭組織。家庭組織是文化人生，是精神人生，並非自然物質人生。若專為自然物質人生打算，有雌雄交配已夠了，何必畫蛇添足，在男女交媾之外增添上一段愛情，形成一番禮節與一套制度呢？當知雌雄交合是自然，非人事。男女相愛繼之以夫婦好合，才是人事，是精神文化的開始。

伏羲與周公，因此也做了歷史人物。因他們做了人生一大事，在自覺地講愛，有計畫地講禮。此後的人生，永遠要自覺地講愛，有計畫地講禮。若使伏羲、周公復生，他看見後世人，都在組織家庭，都在認真像樣地做夫婦做父母，伏羲、周公自必很快慰地想與說：你們想做的，正是當年我所想做；你們活著，正如我活著一般。伏羲、周公的自然人生物質人生是完了，但伏羲與周公的精神人生與文化人生依然存在。

孟子說：「食色性也。」禮記上說：「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但喫與男女，屬自然，算不得人事。從喫上產生出種種智與為，從男女配合上產生出種種愛與禮，從耕稼畜牧上產生出

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他好像認為只要名字記載上歷史，無論是否或臭，總是歷史人物了。那是他的錯誤。當知只有流芳，才是真的歷史人物，遺臭的算不得是歷史人物，只是假的歷史人物。何呢？我在上文已說過，事業不滅，才是歷史生命。被發揚被繼續的是歷史，被打倒被推翻的不是歷史，只是在歷史上的一點黑影。歷史是生命的，是繼續向前的。不能繼續向前便不是生命，便不是歷史。若是歷史上只是些不能繼續向前的事，那便是無生命的歷史，便是假歷史。假歷史終必消失，終必成為無歷史。

桓溫在東晉時，起先有志北伐，想要恢復中原，復興華夏；換言之，他想流芳百世。若他一意這樣做，無論事業成敗，他永遠是一歷史人物。他後來所志不遂，便改變態度，想篡位，想自己當皇帝；換言之，他是在想遺臭萬年了。他這一想法，無論沒有成，縱成了，他依然算不得是一歷史人物。讓我舉近代史作例。孫中山先生是真的歷史人物，因他具有歷史的生命。何以說他具有歷史的生命呢？因以後人還得繼續孫先生的想法與做法。這便是他的生命已變成了歷史的生命。至於袁世凱便不是一個真的歷史人物了，他的想法與做法，後人不僅不繼續，而且還要打倒推翻它。他的生命，不能成為歷史的生命，他即非真的歷史人物了，若使他的生命也成了歷史生命，那歷史也將會短命，甚至無生命，所以袁世凱決非歷史人物。同樣道理，岳飛是歷史人物，

秦檜算不得歷史人物。單單名字記載上歷史，不就是歷史人物呀！

把名字記載上歷史，並非即具有歷史生命，即便當不得真的歷史人物。反過來說，有很多人，他確具有歷史生命，只沒把他名字記載上歷史，但他依然還是一歷史人物。明白得、信仰得這一個道理的人，才是具有文化生命、精神生命的人。若一個民族中，抱有這種信仰，具有這種智識的人多，便是這一民族之文化精神發展到最高度；而他們的歷史，在那時，必然是十分燦爛光明；而他們的人生，在那時，也必然是十分莊嚴快樂。

我們把握到這一個道理，才能來讀歷史，才能來講人生。

（民國三十九年十二月政工通訊）

學家，關閉在實驗室裏做不斷的試驗。他一時的試驗，不能說他無成功。但他誤認爲他當時解決了一些社會問題，便是解決了人類的歷史問題。

馬列主義的信徒，常自誇說他們是科學方法的。他們的大錯誤，在把社會問題作歷史問題看。流弊所及，只重手段，抹殺人性，不把人當人，只當作是機械。他們只用心在如何發動運用此機械，來求他們所希冀的、可能表現的效能。他們也解決了一些在他們當前的社會問題，但他們不曉得他們已違背了整個人類的歷史大趨。

近幾十年來的中國學者，在無意中，感染了西方那一套誤解，也時時把社會問題和歷史問題相混淆。即如民初的「新文化運動」，在當時，他們所列舉的一些社會現象，那是真實的；他們大聲疾呼，求改革，求打倒，在當時，何嘗沒有一些摧陷廓清之功。但他們同樣有一大錯誤，他們也誤把社會問題當作歷史問題看。因此，他們才大膽提出「打倒孔家店」、「線裝書扔毛廁裏」、「廢止漢字」、「徹底改造中國文化」、「全盤西化」，種種的口號。只爲新文化運動所犯的毛病，正和共產主義者馬列信徒的毛病，一色一樣，同是把社會問題和歷史問題混淆在一起。因此，一輩人，極易從新文化運動轉移到信仰共產主義那邊去。

面發展。此決非一人之事，亦非一人之計畫可成；此一事業乃屬於一團體，而此一團體之歷史則綿延久遠，乃出人想像之外。

我們可再看西方大學之規模，各個學院、學系之分張與配合。自其建築、設備、規模觀之，皆極複雜，何以能合成一大學？則我們非進而研究其組織不可。若無一健全之組織，即不可能有此分張發展之成績。

西方人喜講法律、制度。我們應知制度是死的，要尊重、遵守此制度，此制度方可發生效力。故在制度之背後，我們必要講及其精神。我對西方大學之看法，乃是從其建築、設備、規模來研究其組織，又將其組織與其歷史配合起來而尋求其精神。我認為如此乃了解西方大學代表西方文化之所在。

在西方人或自認為極平常，但自我們視之，則見為不平常；反過來說，亦有中國人自己認為是極平常者，而在西方人眼中則認為不平常。我們研究文化，該從此等處著眼。我現在來講他們的精神。前面已說過，今天西方大學從歷史淵源言，是由一種「宗教精神」、與「自由組合」、與「職業訓練」三者配合而來。最先是私人的，私人結合成為集團，集團更擴大成為事業。此事業乃由集團所推動而主持，而此一集團乃創始自幾百年前，並可延續至幾百年後。今日其集團中

中，真是微乎其微，各人只自盡各職。此亦可謂是一種個人主義。

西方大學對於整個政府或整個國家，有時似乎並不很關心。而學校對於每一教授們之言行，亦多認為是私人行動，與學校無關。此仍然是一種西方精神。中國留學西方的雖多，然上面所指出的西方精神方面，似乎未能學到。

今日英、美大學最大之變，乃在其自宗教變而向科學。理工科方面貢獻日大，而宗教精神則日見淡薄。於此情形下，科學日益專門化。但對於人文學科方面言，我認為在西方大學中頗為吃虧。如文學、史學、哲學等，都是不能太嚴格區分的，愈分愈狹，則所得愈淺。昔梁任公嘗提倡「窄而深」之研究。其實人文學科窄了決不能深。自然科學，愈分而愈精；人文科學不同。自然科學是前人之成績，可學而接受之，而更自此向前；文學、史學、哲學，以及繪畫、音樂、雕刻諸藝術，都不能說通曉了前人的，接受了以前成績，再前進。人文學科只求能懂得，慢慢地吸收、消化、匯通，卻並不能繼續增高。進入大學學人文學科的學生，最理想是懂得前人的，卻並不能定要他再進一步，超過前人的。物質世界可以日新月異，精神世界則否。西方大學將人文學科與自然學科等量並視，是會出毛病的。

尤其是進入研究院讀博士學位，必須寫論文。而此項論文，必求其有新貢獻。此一觀念，實

上雖然改頭換面，實際上還是中國那一套。此乃由於中西雙方文化不同，美國文化之長處未必都能配得上中國的情勢。至於我們是否應有一理想的教育環境來培養自己的青年，這是一個我們值得研究的問題。

前幾年我到日本去，日本友人曾告訴我：他們的貧窮子弟多喜研究科學，蓋於離校後可謀一職業；至家庭富有者，便可多學文學、史學、哲學等。在中國適相反，一般的中國青年都對人文學科提不起興趣。這事大可注意。我以爲倘有興趣學人文學科，與其赴美國，倒不如往西方人文科學肇始處之歐洲英、法、德諸國。不過亦有一位歐洲老留學生對她表示：中國學生素來自由散漫，應該令其赴美國學習他們的緊張生活，來西歐便連這一點希望也沒有了。總之，只要自己能學，即到任何一國皆可，在本國亦何嘗不可。若自己不能學，一味依賴他人教，則西方大學並非專爲適合教導中國青年。固然西方文化長處甚多，但短處亦不少。

在日本，青年出國的較少，且在國外所得之學位，日本政府亦不予承認，非重行考試不可。此亦一可資模仿之點。

諸位若有欲出國留學而機會不許可者，應先學習在國外留學生之工作勇氣與刻苦精神。有此一勇氣與精神，何處不可找工作？何處不可求學問？至學人文學科者，則更不妨在國內好好地多

一九 文化復興中之家庭問題

近年來總統提出「文化復興」一大題目，這真是我們國家民族的百年大計。但要一不成爲口號化，二不成爲法令化，三不成爲形式化，此須我們全國上下來分層共同負責。總統既已揭示了此一大方針，尤應是我們中層黨政文教各界，對此方針該作深入的研究，才能領導全社會切實遵行，蔚成風氣。

所謂研究，應分兩方面。一是有關各項學術思想的，一是有關各項現實具體問題的。此兩項，不可嚴格分開，但可分別注意。我今天，只就現實具體問題方面，選擇一項與人人有密切相關的家庭問題，來略述私見，請在座諸位先生之指教。

猶憶十六年前，我初次去美國。飛機第一站到夏威夷，耶魯大學的雅禮協會請了當地一位教會中學的校長來飛機場迎接。他爲我們夫婦安排了一所旅館。我們每日，只在旅館進早餐，外出

後必至夜始歸。在晨餐時，隔座有一位美國老太太，對我們似很注意，因餐廳中只我們夫婦是中國人。但我們和那老太太，幾個早晨沒有交談。有一晚，那中學校長夫婦請客，我們又遇見了那老太太，乃知她是這校長的母親。席間和我們談了許多話。她說，她和她兒子分別了已六七年，此次特地從紐約來看她兒子。我們夫婦席後先回旅館，適有一友人在樓下客廳相候。坐談少頃，門外車聲，那校長扶著他老母進來，在客廳旁電梯口擁抱相吻，那老母即獨自進入電梯上樓去。

我們看此情形，甚覺驚奇。一是那校長並不送他老母上樓，一是那媳婦獨留在門外車中，並不陪送她婆婆進旅館。翌晨，在早餐時，那老太太便來和我們長談；知我們快離開夏威夷，她說，她兒子還要請她到家中吃頓飯，她須待此後始離去。我們又很奇怪，老母遠道而來，她兒子為何不請她住家中。老母來已多日，為何她兒子還未請她到家吃飯。在我心中，深切感覺到中西家庭之相異。

耶魯大學一畢業生，在新亞教英文課兩年。在我去耶魯時，他亦回了美國，任康橋一某教會牧師之職。我和他很熟，常問他有關他的家庭事。他說：他父親是油漆商，他祖父係美國一大富翁，現在單獨在南部一安老院中，請一護士陪伴。他亦能獨立，祖孫三代，分居三處，經濟上亦互不相關。我說：將來你祖父辭世，你們父子，應可分得一大筆遺產。他搖頭說不然。大概祖父

身後遺產，會全歸其護士所有。我們父子，也從來不想到此事。我問他：「此刻是復活節假期，你為何不回家看父母。」他說：他極少回家，偶一回去，也只宿一兩宵即走。我又問：「從前我們在中國大陸時，提倡遲婚，大家必舉美國為例。現在你們美國青年男女，似乎都急著要成婚，和今天我們中國風氣適相反。我知道你也急想成婚，究為何故？」他說：「我們婚後回家，父母便當客人相待。若未婚回家，依然是一子女，怪不好意思。」

我因此想到，西方人重視人人能獨立，即在家庭亦然。猶憶民國二十六年前在北京，一冬天的早晨，去至北海公園，見有三四位美國年輕太太結伴溜冰。她們各帶有子女，都只三四歲，在冰上跌倒了爬起，爬起了又跌倒，但母親們全不理會，只盡情自己在冰上溜，有時溜到很遠處。待她們興盡，才各自提挈小孩上岸。這亦是她們在培養小孩們的獨立精神。

我在電影上知道，美國的嬰兒，從其搖籃生活起，即和父母隔離，獨住一室。父母子女，從不在同室中睡，更不論同床睡。我曾住華盛頓幾天，租一私家寓所，每晨看到許多派報童子；據房東太太告訴我，那些派報的，全都是國會參、眾兩院議員們的兒子。那時是暑假。房東太太說：即在開學後，他們也可在上學前清晨跑街派報，賺一些私房外快。

美國的父母們，既如此般培養子女獨立，子女長大了，也自會尊重其父母之獨立。父母不會

憐憫其子女之幼小而減低了他們培養子女獨立精神之用心，子女也不會憐憫父母老病而轉變其尊重父母獨立精神之維持。美國家庭，在其文化傳統之整個體系中，自有其意義與作用存在；我們不能用東方人眼光來看西方人家庭。

但西方人似乎很有興趣來求瞭解我們東方人家庭。有好幾次在宴會席上，旁坐遇到年齡相彷彿的男女，雖屬初次相識，他們每喜對中國家庭問長問短。我又聽人說：梅蘭芳去美國演戲，戲中情節和其道白唱辭，都先譯成英文發給觀眾。梅蘭芳在臺上演打漁殺家中蕭恩之女兒，對蕭恩說：「爸爸如何吩咐，女兒自當遵從。」臺下美國老太太們，點頭稱讚，我們有如此般的女兒，那是何等幸福呀！她們之欣賞梅蘭芳，卻更欣賞在此等處。

現在回到我們本國自己的家庭。似乎人人皆知，不煩多說，但我們必該說的，在此民國六十幾年來，我們的家庭，正在逐漸變，而且愈變愈劇。我們來臺後的二十幾年間，似乎變得更快了。此刻只舉一端言之。目前我們爲父母的，似乎更不奢望子女要聽從父母的意見。一片獨立平等自由的呼聲，子女在家中，似乎已躍居了賓位。童蒙初啟，進入幼稚園，「小朋友、請、好不好」的聲浪，灌耳已熟；回到家中，自叫父母難於侍奉。各家有女傭，彼亦人家之女，也叫主人難於使喚。我家有一肄業中學的工讀生，有一次，內人說了她幾句。她說：我錯了。但你這些

研究不可。今再說到「復興文化」，今天我們的家庭，單舉父子女關係一節言，此是現實具體問題，我們該得有研究。今天要復興文化，要尊孔，孔子是最重仁道的。論語首篇第二章，孔子弟子有子便說：「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歟？」但今天，我們該如何般來提倡孝弟和仁道？孔門儒家，又是否不講獨立自由和平等？若使也講到，又是如何講法？又和孝弟仁道，是否有衝突？此就牽涉到學術思想的問題上去。學術思想的研究，和具體現實問題分不開。今天要叫小學老師在學校中教孝教弟，他們應該如何般教法？只在文字言說上講古人道理，此所謂老生常談，恐終於事無補。

而且小學教師們，何嘗不是爲人父母，爲人兄姐，何嘗不想要他們的子女弟妹們孝弟；但現在都讓步了，以爲時代潮流如此，無可違逆。口是心非的教學生，那會生作用。但若真要西化，也該對搖籃中嬰兒即培植其獨立精神，也要爲自己衰老後獨立預留餘地。而且慈孝友恭，也是相對的。父母太過慈了，會相形見得子女之不孝。兄姊太過友了，會相形見得弟妹之不恭。在家不孝不弟，出門獨立自由，此問題不僅在幼年子女與老年父母之相互關係上，而在一輩社會中堅分子成年人如何做人的問題上；家庭變，整個社會亦必隨而變，此事關係不小。

以上所談的家庭，只就父母子女一倫而言，更要的還有夫婦一倫。須待有了夫婦，才始有家

已。若論及己以外事，則非己一人所能主。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即在能自立後，乃知有此境界，有天有命，事不專在一己。孔子曰：「道之不行，我知之矣。」孔子爲魯司寇，不得意而去，遂周遊列國十四年而返。其不得行道於天下，非不知。然而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能從心所欲，豈非大樂事。然而仍在其己身之內。當時如魯哀公、季孫氏，豈能一如孔子心之所欲。是則不踰矩，即不越及其身外。孔子曰：「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則孔子乃樂以終身。其讀顏淵，亦在孔子老而返魯之後。則孔子之樂以終身，即論語此兩條而知矣！中國人常稱「樂天知命」，「安分守己」，亦即據論語此兩條來。

宋代大儒范仲淹，自爲秀才時，即以天下爲己任。「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是仲淹終身當惟有憂，更無樂，豈不與孔子之教有所背？其實大不然。仲淹幼孤，其母不能養活他，逼而改嫁。仲淹寄身山寺中，斷齋畫粥，其生活艱困有如此。然而仲淹不以爲憂，故能立已成學，而憂及他人。及其貴，猶能不改其樂。故其兩子，僅得一長袍，長兄穿之出，幼弟即留在家；幼弟穿之出，長兄即留在家。則其一家之現實生活，實當與仲淹爲秀才時無大相異。惟其能安於此，樂於此，故能憂天下之憂，爲一代之大賢。使仲淹於其現實生活不安不樂，則憂患先在己，無暇及他人矣！

仲淹嘗派其次子赴江南收租，遇故人石曼卿，遭三喪，困居旅途中，其子卽捐其所收以爲救濟。歸以告，仲淹不之責，又倍加稱賞。仲淹又創立「義莊制度」，以救濟范、朱兩族之鰥寡孤獨窮苦而無告者。此制度乃一千年來普遍流行於中國之全社會。要之，仲淹惟能於其一己一家之現實生活能安能樂，乃始能憂患及於他人。至於仲淹之政治業績不能大行其道於當世，則亦如孔子。在仲淹亦惟有樂天知命，安分守己而止。

孔子又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其弟子問：「必不得已而去，於此三者何先？」孔子曰：「去兵。」又問：「必不得已而去，於此二者何先？」孔子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此乃爲一國政治領袖主持行政大道言，亦不能無不得已之時，甚至去其食陷民於餓死，然不當去「信」。人之能自立，貴能有自信。人之能相安，貴能有互信。雖千萬人之死生，有不足動其心者，而只務於能信。信其道，信其德，信於天，信於命，則斯能信及人，亦能信於人，而無不安不樂之存在矣。

二

以上乃中國文化大傳統人道大本所在。據今而言，赤禍滔天，政府播遷來臺。回顧三十餘年

前政局之動盪，民生之凋疲，此亦兵不足，食不足，幾乎若無一日之可安矣。然而三十餘年來，乃有今日，使非上下共有一「信」，則烏克臻此？是孔子之言，誠不虛矣。今就當前論，政局日形安定，生活日見充裕，此非一可安可樂之境乎！孔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天上浮雲，往來不定，無可把握。今日之富，可來有他日之貧；今日之貴，可來有他日之賤。故貧賤非可憂，而富貴亦非可求。守道義而富貴，我守吾之道義，而儻來之富貴，則非我所能守。既非能守，亦何可求？使居貧賤而不安不樂，但求富貴，則憂患只在己，而不及人；只在當前，而不及將來。斯則終其身將在憂患中，而亦一無道義之可言矣。

故惟心存安樂，乃能生其憂患。其所憂患，則不在己而在人，亦不在當前而在將來。而一己之當前，則惟道義之可安可樂。至聖如孔子姑不論，大賢如顏淵、范仲淹亦莫不如是。顏淵終貧且賤，仲淹則既富又貴。然富貴之於仲淹，則亦如天上之浮雲。仲淹之所安樂者不在此，其所憂患亦不在此矣。

今日吾國人亦非無憂患，大陸十億同胞，至今仍陷困厄中，此誠吾人所當引為憂患者。以吾臺、澎、金、馬四海島，一千八百萬人，一旦重履大陸，如何得使吾大陸十億同胞同享一安和樂利之生活，此須有一大道，可守可行。而吾儕今日，亦未能遽明此大道，此則誠為可憂可患。而

非此心安樂，亦何從憂患及此？苟使我心只憂患在己，不安不樂，則非急功而近利，即好高而鶩遠。無道義之可守，乃將不勝其憂患矣！

如今國人競言經濟不景氣，此乃全世界事，非我一國之事，豈能遽望其景氣之來臨。退一步思之，當我三十餘年前，經濟之景氣又如何？退可守斯進可戰，豈不回顧三十年而即可得。則此心安樂，無多憂患。而所憂患，惟在道義。道義則可安可樂，斯憂患即在安樂中，而安樂中亦不害其有憂患，而豈捨安樂以務於憂患之求哉！

晚清曾滌生原才篇有云：「風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嚮而已。」風俗厚，則人才自出；風俗薄，則人才自滅。所謂厚者，即在其安樂中而不忘有憂患。安樂在己，而能對人憂患，此見其風俗之厚矣。風俗之薄，則在其各自憂患以求富貴，而他人之安樂，則不在其憂患中。此風俗之薄可見矣，而又何人才之望。

居今日言，亦惟此一二人之心之是求。春秋之末有顏淵，北宋中葉有范仲淹，此皆所謂一二人之心，而移風易俗，使中國文化傳統綿延悠久達於五千年。求之史籍，如顏淵范仲淹者，亦世有其人矣，今豈獨無其人？彼人也，我亦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是則貴在人之人有自信，能自信而自立，得繼顏、范而起，此其人亦自有所安樂。而臺、澎、金、馬四海島一千八百萬人，以及大

此則有待於善體國家民族之文化大傳統之大賢君子之出身擔當。所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者，此卽以天下爲己任之大賢君子，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爲吾全國人日夜所企望。天佑中國，已在吾前，亦在吾後，吾國家民族五千年之大傳統，必將不負此望。民無信不立，立即立在吾此信。夫子豈欺我哉！

孔子又曰：「貧而樂，富而好禮。」今日吾國人已不得謂之貧，尊賢敬聖，此又吾國人大禮之所在。則吾國人今日當前之所當憂患者，惟在其不能安，不能樂，不知有尊有敬，以共爲一安分守己之公民。竊願以此意，與吾臺、澎、金、馬一千八百萬國人共勉之。

（民國七十二年二月十八日中央日報，中央月刊十五卷四期。）

二二二 漫談改革社會風氣

一

「風氣」二字是一舊觀念，舊名詞，爲中國人向所重視。近代國人競尚西化，好言潮流。

「潮流」二字是一新觀念，新名詞，爲中國古書中所未有。此兩名詞同指一種社會力量，有轉移性，變動不居。惟潮流乃指外來力量，具衝擊性、掃蕩性；不易違逆、不易反抗，惟有追隨，與之俱往。而風氣則生自內部，具溫和性，而更具生命性，自發自主，能自有其一番內在精神，不受外力所轉移。然則吾今日中國社會，如何能適應外來潮流，而不隨以俱去，猶能善保其生命內力，與固有的獨立精神，使風氣潮流得相與引生而長。實爲當前最宜看重之一要點。

中國古人言風氣，請舉孔子爲例。論語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

二人之心向而何？故蒙古入主，有文文山、謝疊山、黃東發、王伯厚。滿清入主，有史可法、顧亭林、李二曲、王船山。政權移於上，而社會風氣則保持不變，依然一中國人之中國社會，無可搖移。此無他，亦依於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曠觀古今中外，惟中國始有之。古希臘古羅馬乃及現代之西歐，宜皆不能相比擬，此乃中國文化之特可自傲處，非其他民族之所能相望也。

此因西方重「多數」，中國重「少數」。多數「尚力」，而少數則「尚德」。以力服人，非心服也。以德服人，乃能使人心悅而誠服。無德可尚，乃始轉而尚力。多數壓迫，乃見若潮流之洶湧。少數乃能領導，能主持，有同情心，有感召力。眾所歸往，始成一理想之風氣。斯則中國社會風氣形成之所以堪貴也。現代西方雖科學昌明，而宗教勢力則依然尚在。彼中有殷憂其文化之沒落者，亦惟以復興宗教爲念。可見不能專尚科學與物質文明立國，西方人亦自知之。

三

近代中國則有惟一孫中山先生堪當少數中一尤少數者，其唱「三民主義」首民族，次及民權，民權當由民族來。而民族精神則保存於少數，亦惟遞禪闡揚於少數。故中山先生有「知難行易」之論，不知不覺而行易者屬多數，後知後覺已屬少數，而先知先覺則更少數中之尤少數。故

中山先生之革命過程亦分三階段，一曰「軍政」時期，次曰「訓政」時期，最後始曰「憲政」時期。中山先生心中之憲政，實當稱之曰「民族憲政」，既非襲取而來，亦非多數可知。故不僅被選舉權當先經考試，即選舉權亦必先經考試，乃獲賦與。此等主張，今日國人皆不敢明白稱引。何者？潮流所趨，既不深知，自難違抗耳。

今日國人，觀其體膚毛髮，則儼然是炎黃嫡系。論其心情好惡，則盡歸現代化。其實今日國人之所謂「現代化」即屬西化。就實況言，孔子在當時，即周公之現代化。孫中山在近代，亦即周、孔之現代化。現代化貴能化其自我，而非化於他人。如今日國人之所謂現代化，則不過爲時代潮流沖捲而去之一較好名詞而已。故祖宗必加鄙棄，子孫首貴留學，行易則在中國，知難則付之外洋。中山先生必比擬之於華盛頓，乃始有其價值。故三民主義亦必比附之林肯之民有、民治、民享，乃始有其意義。

中國人言道統治統，必曰「作之君，作之師」。並不期望之於人人。中國人言政治，必歸之「選賢與能」。而此選舉權，下不操於民眾，上不操於政治領袖如國君、如天子，而別有其客觀之標準人選。中國人言生活，亦不專爲物質生活之私人享受。中山先生三民主義其書具在，豈可以林肯民有、民治、民享之三語釋之。今日臺灣人乃有從事臺灣獨立運動者，其意即自謂乃追隨

華盛頓美國十三州獨立之腳步。權威在國外，一切言論行動則各得自由。若言平等，則古今不平等，中外不平等，惟時代潮流之馬首是瞻。此非吾國社會今日一風氣乎？故總統蔣公提倡文化復興運動，亦正爲此而發。

孔子不得「中行」而與之，則曰：「必也狂狷乎！」「過吾門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愿乎！」今日國人，在中國社會則崇洋排己，皆似一狂狷。及其入外國社會則捨己從人，皆爲一鄉愿。惟此等乃洋鄉愿，乃爲中國全社會所崇重。則中國社會亦必成一洋社會可知。國家猶是此一中國，而社會則已成一洋社會，與蒙古滿清入主適可成一對比。此實係潮流所迫，非風氣所成。潮流權力在外，風氣則本於德性，由我自主，非在外所能操縱。

孟子曰：「經正則庶民興。」「經」者，正常大道，乃樹人立國之大本所在。此非多數可知，然多數亦必由知以行。故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也。」顧亭林亦有言：「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亦卽此意。果使此正常大道必歸之於多數，則孔孟以至顧亭林亦僅若一匹夫，又何從負此天下興亡之大責？

經若不正，民將何由？至如奉公則有貪污，居恒則恣奢淫，此乃一種歪風穢氣，爲國法所不容，刑律所當先。若欲正人心，興風氣，首必及此。然求正本清源則別有在，乃必求之於正常之

是各別的，而人則是共通的。每一職業，固須一個人來當。你做了醫生，你同時還該做一個人。你做了律師，同時也還該做一個人。當職業有各項職業之專門知識與專門訓練，也該有當做人的一項共通知識與共通訓練。當職業愈專門愈好，做人則愈普通愈好。當職業，可以你不懂我，我不懂你；但做人則必做到互相瞭解，互相明白，互相承認。

做人的普通知識，約略言之，可分為三方面：一是道德的，二是藝術的，三是文化的。如「言忠信，行篤敬」，那是道德方面的。人人該如此，不能一人自外，不能由我獨異。藝術可使人生美化，不可能人人做藝術家，但人人該懂得愛好藝術，欣賞藝術。對藝術有普遍瞭解，共同修養。人生各項娛樂，都包括在此內。道德與藝術，歸納入文化的大項目之內。社會由人而組成，也可說社會由人類之文化而組成。此因文化瞭解與文化修養，乃做人的一項至要條件。每一個人在其社會之傳統文化體系之中而生長，而完成，因此每一個人必該對其所生長之社會之所由組成之傳統文化，有瞭解，有修養。

上面所說道德、藝術與文化之三項都該是屬於普通知識方面的。從前人，似乎對普通知識方面更重視；但現世界，則似乎逐漸對專門知識方面更重視了。其實則偏輕偏重皆有弊。當知專門知識，愈專門愈有價值。而普通知識，則愈普通愈有價值。做人做到普通的，是最偉大的。那些

知識，人人該知；那些道理，人人該學。若我們忽略普通知識那一面，總是做人有缺點，會影響其專門的職業同樣有缺點。

近代社會，由於科學之突飛猛進，而專門知識日有進展，因此而忽略了做人的普通知識方面，社會上會發生壞影響。尤其在中國社會上，此一毛病，近幾十年來，最顯著、最嚴重。我今天特地提出此意見，奉勸諸位，對於各自研修一項專門知識，將來盡力於一項專門的職業，而對社會有貢獻外；更該注重我們在此社會中做一個人的普通知識方面，更該加意進修。否則流弊所及，此一社會中，只見有職業，不見有人，整個社會，將會垮了。試問我們這些各自專門的職業，又向那裏去作貢獻呢？

（民國四十五年十二月香港浸信會書院演講，香港華僑日報十二月二十日。）

這種讀書並不算真讀書。如果想做一位專門學者，這是他想以讀書爲職業；當知此種讀書，亦是做人中一小圈子。我們並不希望，而且亦不大可能要人人盡成爲學者。我此所講，乃指我們離開學校後，不論任何職業、任何環境而讀書，這是一種業餘讀書；這種讀書，始是屬於人生的大圈子中盡人應有之一事；必需的，但又是自由的。今問此種讀書應如何讀法？下面我想提出兩個最大的理想、最共同的目標來：

一是「培養情趣」。人生要過得愉快、有趣味，這需用工夫去培養。社會上甚至有很多人怕做人了，他覺得人生乏味，對人生發生厭倦，甚至於感到痛苦。譬如：我們當教師，有人覺得當教師是不得已，只是爲謀生，只是枯燥沉悶，挨著過日子。但當知：這非教師做不得，只是他失了人生的情趣了。今試問：要如何才能扭轉這心理，使他覺得人生還是有意義有價值？這便得先培養他對人生的情趣；而這一種培養人生情趣的工夫，莫如好讀書。

二是「提高境界」。所謂境界者，例如這講堂，在調景嶺村中，所處地勢，既高又寬敞，背山面海；如此刻晴空萬里，海面歸帆遙駛，或海鷗三五，飛翔碧波之上；如開窗遠眺，便覺眼前呈露的，乃是一片優美境界，令人心曠神怡。即或朗日已匿，陰雨晦冥，大霧迷濛，亦仍別有一番好景。若說是風景好，當知亦從境界中得來；若換一境界，此種風景也便不可得。居住有境

人討厭的老鼠，都進入詩境，經過詩人筆下暈染，都顯出一番甚深情意，趣味無窮；進入人生，所遇喜怒哀樂，全在詩家作品中。當我們讀詩時，便可培養我們欣賞自然，欣賞人生，把詩中境界成爲我們心靈欣賞的境界。如能將我們的人生投放沉浸在詩中，那真趣味無窮。

如陶淵明詩：

犬吠深巷中，鷄鳴桑樹顛。

這十個字，豈非我們在窮鄉僻壤隨時隨地可遇到！但我們卻忽略了其中情趣。經陶詩一描寫，卻把一幅富有風味的鄉村閒逸景象活在我們眼前了。我們能讀陶詩，儘在農村中過活，卻可把我們帶進人生最高境界中去，使你如在詩境中過活；那不好嗎？

又如王維詩：

雨中山果落，燈下草蟲鳴。

諸位此刻住山中，或許也會接觸到這種光景：下雨了，宅旁果樹上，一個個熟透了的果子掉下來，可以聽到「撲」「撲」的聲音；草堆裏小青蟲經著雨潛進窗戶來了，在燈下唧唧地鳴叫著。這是一個蕭瑟幽靜的山中雨夜，但這詩中有人。上面所引陶詩，背後也有人。只是一在山中，一在村中；一在白天，一在晚上。諸位多讀詩，不論在任何境遇中，都可喚起一種文學境界，使你

像生活在詩中；這不好嗎？

縱使我們也有不能親歷其境的，但也可以移情神遊，於詩中得到一番另外境界，如唐詩：

松下問童子，言師採藥去；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

那不是一幅活的人生畫像嗎？那不是畫的人，卻是畫的人生。那一幅人生畫像，活映在我們眼前，讓我們去欣賞。在我想，欣賞一首詩，應比欣賞一張電影片有味，因其更可使我們長日神遊，無盡玩味。不僅詩如此，即中國散文亦然。諸位縱使只讀一本唐詩三百首、只讀一本古文觀止也好；當知我們學文學，並不爲自己要做文學家。因此，不懂詩韻平仄，仍可讀詩。讀散文更自由。學文學乃爲自己人生享受之用，在享受中仍有提高自己人生之收穫，那真是人生一祕訣。

第三是博聞類。這類書也沒有硬性規定，只求自己愛讀，史傳也好，遊記也好，科學也好，哲學也好；性之所近，自會樂讀不倦，增加學識，廣博見聞；年代一久，自不尋常。

第四是新知類。我們生在這時代，應該隨時在這時代中求新知。這類知識，可從現代出版的期刊雜誌上，乃至報章上找到。這一類更不必詳說了。

第五是消遣類。其實廣義說來，上面所提，均可作爲消遣；因爲這根本就是業餘讀書，也可說即是業餘消遣。但就狹義說之，如小說、劇本、傳奇等，這些書便屬這一類。如諸位讀水滸

傳、三國演義、紅樓夢，可作是消遣。

上面已大致分類說了業餘所當讀的書。但諸位或說生活忙迫，能在什麼時候讀呢？其實人生忙，也是應該的；只在能利用空間，如歐陽修的「三上」，即：枕上、廁上和馬上。上牀了，可有十分一刻鐘睡不著；上洗手間，也可順便帶本書看看；今人不騎騾馬，但在舟車上讀書，實比在馬上更舒適。古人又說「三餘」：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者晴之餘。現在我們生活和古人不同，但每人必有很多零碎時間，如：清晨早餐前，傍晚天黑前，又如臨睡前；一天便有三段零碎時間了。恰如一塊布，裁一套衣服以後，餘下的零頭，大可派作別的用場。另外，還有週末禮拜天，乃至節日和假期，尤其是做教師的還有寒暑假。這些都可充分利用，作為業餘讀書時間的。假如每日能節約一小時，十年便可有三千六百個小時。又如一個人自三十歲就業算起，到七十歲，便可節餘一萬四千四百個小時，這不是一筆了不得的大數目嗎？現在並不是叫你去吃苦做學問，只是以讀書為娛樂和消遣，亦像打麻雀、看電影，那會說沒有時間的！如果我們讀書也如打麻雀、看電影般有興趣、有習慣，在任何環境任何情況下都可讀書；這樣，便有高的享受，有好的娛樂，豈非人生一大佳事！讀書只要有恆心，自能培養出興趣，自能養成習慣，從此可以提高人生境界。這是任何數量的金錢所買不到的。

境界。若只求了解一篇篇的作品，而不去了解作家的人格，那麼我們不能洞曉其作品所涵真實的意義。如或有某作家的作品，不需通過瞭解作家本身的人格，而便能予以全部把握，則那些作品在中國人眼裏至多是第二流的。

如屈原與其作品是溶合爲一的，若不了解屈原其人，便不能了解其作品。這種作品才是第一流。至於如宋玉，其作品雖美，可是我們只了解其作品即可，並不必去了解宋玉之爲人，故其作品最多只是第二流。又如陶潛、杜甫、歐陽修、蘇軾，直至近代如曾國藩等人，其詩文都是基於其人格而成，其人格均能表現在其作品中，我們若不了解他們的人格，就無法了解他們的作品；這才是第一流作品。如水滸傳、紅樓夢等書之作家究竟是誰，知與不知，並不影響到我們欣賞這些作品上，所以它們只算是第二流的。中國人常把小說、戲曲都列爲第二流的文學，就爲這個原因。

歷史是人事的記載，史實以人物爲中心，所以不了解人，即不易了解歷史。尤其中國文化，特重人文精神，如二十四史等書皆以人物爲中心，其體裁特別重在列傳。因人可以支配歷史，而歷史並不能支配人。我們讀歷史，必須懂得歷史裏的人物，能品評其人格之忠佞賢奸，邪正誠僞。若不了解人物，則無法了解到歷史。即如岳武穆、文天祥、史可法等，我們當知並不是因他

們爲國而死，才成爲這樣的人；而是因爲他們是這樣的人，才會碰到這樣一個死的機遇。

人之生死，只是一個機遇，機遇仍在人之選擇。他們之死，才顯示出他們的忠直誠正。這是一個主動的表現。他們可以不死，因爲機遇可由人自己作選擇。故中國人講歷史，主要在人物精神，所以學歷史必須知道做人的道理。中國人講教育，常言「身教勝於言教」。所以我們與孔子是一位教育思想家，不如說他是一位教育家。從這裏可以看出身教和言教的分別。身教是以身作則，用人格來教人格。教育家的一切思想言論，只是他人格之表現，他的主要價值不在其思想言論，而更要在其背後的人格。中國之品論文學，不重其文章，而重在作者與作品之合一。講歷史不重其事業，而重在其人格與事業之合一。我們不了解一人，亦不能了解其教育精神與目的。如孔子、孟子及宋、明諸大儒，他們全是以自身人格來發揚他們的教育精神與目的的。所以不了解中國的做人道理，就不能了解中國的史學、文學、教育、人生和全部文化精神。這是我們中華民族文化中特殊的地方。所以說教人做人的道理是我們文化的中心思想，這叫做人文修養。

在易經上說：「觀於人文以化成天下。」今天所用「文化」「人文」兩名詞，雖從英文譯來，然而這觀念中國自古已有，不過與西方有些不同。何謂人文？曰：「物相雜謂之文。」所以文就是一種花樣，如黑白相雜便成了花樣；若只是純白或純黑，則無所謂花樣。中國人講有天文、

「相人偶」。中國人講做人道理，最基本的是要人參加進社會，在人文中修養他自己，成爲「一文化成」的人。西方講人文乃是針對宗教而言，因宗教最大目標重在死後人可接近上帝因而得救，於是反過來主張人文主義；其所講重要精神並不與中國相同。中國講做人的道理，一定要把人與人配合起來才能做人。如果你死了，但在社會上還有因你之化合而所成的新的你保存。所以中國人注重的是後世，不是天國。要言之，脫離了社會的人，不算是一個人。

請問跑進社會以後如何做人呢？當然，如做老師、做公務員等，不能一些花樣都不做而單獨說要做個人。所以要做人，便須做社會上的人，進而做歷史上的人。天地所生之人只是一「自然人」，入了社會以後做的人，才是社會的人，歷史的人，才是「文化人」，即是人文修養之人。

但是怎樣做社會的人、歷史的人呢？我國文化主要精神就是要教人如何做人。我們今天講講做人的道理，並非說別人要做個什麼樣的人，我要做個什麼樣的人；這不能分開講。現在所講，只是全人類做人的道理，只是講人如何做人，便該在人以外更沒有條件。這一切是無條件的。與教育程度的高低，人的貧富貴賤等都無關，而只是就全人類中每一人如何來做一個人講的。只要他是一個人，就應該在社會上做一個人，也就可在社會上做一個人，不需任何條件的。

上達，是要從根本處學起而直上達天德。宋人稱之爲「天理」，與「天理」相反的是「人欲」。「天理」的內容只是人心所欲而不踰矩，「人欲」亦是人心所欲而踰矩了。人心之欲，想這又想那，但必須有一矩。所欲只在矩中，就是天理了。故人欲和天理並不是相違背的，而且是一體的，只要不踰矩就行。

人總有一死，若想長生不死，這固然是踰矩之欲；但若如讀書過火，吃飯過火，休息過火，尋樂過火，亦都是踰矩；結果因過火而生了病，終生愁死，反而早死，都是違背天理所致。所以要從心所欲不踰矩。矩在心中，是「一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人皆可以爲堯、舜，滿街都是聖人，能做到矩在心中時，也就是天人合一之時了。

今試問如何認識此心矩呢？這也很淺近，只自己心下覺得快樂即合心矩了，若心下不快樂則總有毛病。凡一切事皆不能過份，不用求快樂，只求求合理，合理則自然快樂，才能理得心安。這不是講思想，也不是講人生哲學，只是學做人的道理。這道理只在於躬踐實行，只在學。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岳飛、文天祥都死了，其所欲之義則

至今尚存。人的生命是總要丟掉的，但需要選擇一丟不掉的東西。眼前有很多路，但得你自己挑一條去走。故人需要立志，用自己的心去選擇一下。取捨之間尤見志。人之求學相同，但「志」不一定相同。在一取一捨之間，建立起自己的志，然後再從志去學。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這「志于學」就是孔子立志去學做人的道理，這是中國文化精神的中心。希望諸位能立志求學，做一個中國理想的標準人。

（民國四十八年二月臺北青年文史年會講演）

一向重視人勝過其重視法，即是說：制度雖重要，而人物更重要。這一項傳統意見，實有長時期的歷史經驗作它的根據。

直到最近一百年來，中國人看到近代西方的民主政治，認為他們的制度，遠勝了我們的；認為我們只要學習到他們那一套制度，一切問題也都解決了。但流弊所及，過分重視了制度，而忽略了制度背後的人物，忽略了作為人物骨幹的德性，忽略了作為一個人物所必需具備的良心與勇氣。中國儒家一向重視對於人的德性方面之教育之傳統意見被棄置，人的德性逐步墮落，儘在制度上求改變，甚至鬧革命。似乎民主政治急切也不見有速效，人心思變，一轉身遂到極權政治的路上去。從辛亥革命以來，這五十年，種種擾攘動亂，不能不說，太重視了制度，而忽略了人物與德性，這一偏見，也是一項主要的因素。

這裏牽涉到知識問題，牽涉到我們對西方政治的瞭解問題，牽涉到東西雙方歷史記載的異同問題上。西方歷史記載，主要以事為主，以人為副，人物的活動，只附帶於事變之演進中。此種歷史體裁，略當於中國史書中之「紀事本末體」。至如西方之傳記體，並非歷史正宗，又多以一個特出人物作主體，作中心，而擴大及於一時代，及其牽連相關之一羣人。因此中國人讀西方史，容易注重在其事變上，而忽略了在此事變背後之人物；又容易注重某幾個特殊人物，而忽略

了其他一般人物之重要性。至於中國歷史記載，傳統上最主要的方式，總求將歷史上每一事變儘量分寫在有關係一事變之一切人身上；不論此人物之是成是敗，而人物在歷史上之重要性，則躍然如見。此即中國史書中之「紀傳體」，被認為中國之正史。此種史體，卻是最富民主精神。歷史由於人造，但歷史乃由人之羣體所造；特在此羣體中，某些傑出人物，所佔分量尤重大；然亦非少數傑出人物，能遠離羣眾，而創出此一時代之歷史。中國此種歷史記載之內在精神，正合於上舉孔孟儒家傳統之精義，而惜乎為近代中國智識分子所忽略了。

我最近讀到美國新總統甘迺迪所著榮獲普立茲傳記文學獎一本書的中譯本當仁不讓。我認為此書卻極合我們中國人當前所需要，值得來推介給國人。甘氏此書，記載了美國歷史上八個人物，都是參加美國參議院的，論其在歷史上之表現，好像都僅是一枝一節，其姓名有些並不為我們中國人所知；即在美國，也並不即是第一流的大人物，說不上旋乾轉坤，震鐸寰宇；也不就是精金美玉，無瑕可摘。然而我們從甘氏此書之八位人物，他們的志節操守，意氣事業，細細讀來，卻可瞭解美國的民主政治之透進一層的內涵與意義。使我們瞭解到我們要學步西方政治，不僅是一項理論上，一番制度上，一部憲法上，一套程序上；而在此理論制度法則規程之外，更要者還在其人物上，還在其人物之德性上，還在運使此項制度與法規之人的良心與勇氣上。孟子所

謂「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足以自行」，這是一項普遍公理，東方西方，都無可自外。

甘氏此書，固不重在討論政治，但有意要瞭解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人，此書不可不讀；固不是一部正式的史學書，但要瞭解東西歷史文化異同的人，此書也不可不讀。甘氏此書，只是一部人物傳記，而且是偏在一個門類中的少數幾位並不是第一流傑出與成功的大人物；然而人物之德性與事業，則可以不限時地，不論大小與成敗，而有其共通合一之意義與價值的。因此即在我們東方社會，縱使對政治無興趣、對歷史無研究的人，對此書仍當一讀。尤其是青年人，讀此書可得無上鼓舞，無上激勵，得無上的啟示與振作。

甘氏此書描寫人物，有其極成功的兩點。第一點，他能對每一人之某項活動之對於歷史與時代之關係重大處扣緊落筆，使讀者能了然明白到此一人之所以成爲時代人物與歷史人物之所在。第二點，他能設身處地，把此一人在當時之某項活動中從其內心深處所藏有之種種刺激與顧慮，壓迫與憤懣，清晰剖示，曲折傳達，使讀者能明白到此一人之所以卓然成爲一時代人物而在歷史上有其不朽價值者，在其人之內在的德性上，必具備有如是之基礎，與如是之磨練。甘氏書之主要價值正在此，而其筆力生動亦足以達，使讀者能在無意中受其激動與感召。

甘氏新任總統，尤其是美國史上最年輕的一位總統，而出身膺受有關世界全人類當前禍福所

識無情扼死。卻不知正因為在中國社會潛深底層，有此一股要求民族復興的強烈意識之伏流，才肯跟著來推翻一切、打倒一切。等一切推翻了、打倒了，擺在我面前的，已不是我自己，而是一別人，而且不是一像樣子的別人，還是我自己的醜態在替別人當小丑，當下作。洪秀全由此失敗，領導新文化運動的巨子們也由此失敗。除非這一百年來中國民族復興意識的強烈要求忽然消散，否則高抬著馬、恩、列、史的神像來領導這一百年來要求民族復興大流的，仍不免要失敗。這又是一個歷史事實！

我對中國近百年史，不能不悲觀。而對中國不遠之將來，則依然將樂觀。正為此一百年來的中國，雖然歷盡艱辛，而此一番強烈要求民族復興的深在的底潮之奔放直前，始終沒有停息，而且似乎愈來愈有勁了。一切失敗，全在領導者，不在支撐者。領導者儘管眼光向外，支撐者永遠精力內在。太平天國的支撐者，是一輩下層民眾。五四運動乃及新文化運動的支撐者，是一輩青年學生。今天的中共革命，是民眾與青年合流了。中國正在黑暗與腐化中，上層的，中年以上的，捲進黑暗與腐化，與爲一體。打倒黑暗與腐化，即是打倒了他們自己。所以推翻與打倒，只有寄託在下層與青年。然而下層與青年需得領導，其本身只是一響應者、支撐者。只要領導勢力不能與此支撐勢力走歸一路，支撐者可以轉身支撐別一個。領導者失卻支撐，勢必失敗。中國近

而輕忽而誤解了。今天流亡在海外的中國青年們，似乎無不同聲一致，反對這幾年來中共大陸政權對自己祖國歷史文化之刻意摧殘和存心曲解。那是一可喜的現象。但試問：一旦大陸變動了，我們重回大陸，我們對自己祖國已往的歷史文化，把什麼的態度、什麼的意見，來糾正此刻大陸的種種措施？來重新宣揚自己祖國歷史文化種種內涵的意義，以及種種實際的過程呢？

想到這裏，不由得我坦白地說一句，此刻流亡在海外的中國青年們，實在對我們祖國已往的歷史文化傳統，還是非常模糊。而且恕我再進一步說，此刻我們流亡在海外的中國青年們，似乎在其內心還未痛切地感覺到，我們對祖國已往歷史文化之模糊，是一件要不得的事。

我敢竭誠正告我們這一代可愛的中國青年們，尤其是此刻流亡在海外的中國青年們，一個國家的青年，無論如何，對他祖國已往歷史文化是該有所知的。不知你祖國自己的歷史與文化，你就不配算做這一國家的青年！

固然我們該原諒，何以我們這一代的可愛的中國青年們，對自己祖國已往的歷史與文化，會如此般模糊而輕忽呢？這正因近一百年來，我們祖國對外受盡了種種屈辱和壓迫，對內又受盡了種種禍亂與災難，才使大家對祖國的文化和歷史，逐漸發生了懷疑而遂加忽視的。但我們該知道，這一百年來的屈辱和壓迫、禍亂和災難，又是從何而來的呢？我們若真想知道這些內在的因

你們是知道的，此刻困陷在祖國大陸的青年們，他們正在強力的壓迫和陰險的誘惑下，追隨著喪心病狂的那批所謂共產黨，加緊摧殘祖國的文化，狂妄改造祖國的歷史。因此，保留祖國文化、宣揚祖國歷史的一番大責任，在眼前，不得不專放在我們此刻這一輩流亡在海外的可愛的中國青年們的肩膀上。然而，讓我們放眼靜觀這現實的環境吧！

可愛的中國青年們！可同情的我們眼前這一群流亡在海外的中國青年們！我瞭解你們的責任，我更同情你們的處境。但我敢披肝瀝膽，向你們說一句我所永遠想說的話。無論如何，你們總該對祖國已往歷史文化求有所瞭解，真有所瞭解呀！

可愛的青年們，請你們平心靜氣地體察一下我這一句的忠告吧！

（民國四十二年香港中國學生週報三十六期）

更黯澹。世界分著兩個，國家也分著兩個。流亡的天地，更狹小、更侷促。有些尙是流亡在本國的疆土，有些則流亡在異國統治下的疆土了。

不錯，我們是希望有一批理想的大學生，來支撐、來挽救我們不遠將來的局面。然而要求有理想的大學生，也該有些理想的條件供給給他。他該有一個理想的家庭，他該有一個理想的社會，他該有一個理想的國家，乃至有一個理想的世界。他也該有一段理想的中小學教育過程，又該走進一個理想的大學。目前是一切都不理想，卻單希望他們能做一個理想的大學生，那是何等的苛求呀！因此，真要我來爲這一題目，教一輩青年們如何來做現時代的一個大學生，我只有躊躇擲筆，四顧而歎，叫我從何說起呢？

然而理想總得是理想。愈是在不合理想的現實狀況下，愈該有理想。我總還是應該向我們現時代的大學生，說幾句理想的話。我先希望讀我文的大學生們，莫先怪我只在高論空談，不顧現實！

首先我希望，當前的大學生們，應該懂得鄭重寶貴他眼前所獲得、所享受的那一份自由。孔子說：「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我常愛向接近我的青年們來述說孔子這一節話。

馬克斯也算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然而若使在馬克斯的青年時期，也同樣受著此刻在信奉馬克斯思

想的那一半世界裏，受著不許青年們有自由思想的教育；則在當時，斷然不會產生出一個馬克斯。難道這世界，自有馬克斯降生，此後便不再會有另一像馬克斯的青年出現嗎？因此，教育是必然應該自由的，因教育的對象是青年，我們若要尊重青年的前途，便該尊重自由主義的教育。而大學教育才是到達了真該盡量發揮自由主義的教育精神之階段。我敢敬告我可敬愛的當前的大學生，你們既是在自由世界裏走進了大學，你們那能不鄭重寶貴你們當前所獲得所享受的那一份自由？

如何珍重我們這一份自由？首先該珍重我們各自的前途。如何珍重我們各自的前途？至少不該專以謀求職業和解決私人衣食生活來作為進入大學唯一的目標。若是專為謀求職業和解決私人衣食生活，那麼，極權政治下的教育者，正在向你們招手，說：來吧！你該獻身大眾，為大眾服務。我們必然替你安排一職業，謀求一出路，你將來私人的衣食生活，再也不用發愁了。而且還替你裝上一塊好招牌，說你在為大眾服務。這真是一塊金字招牌呀！他們唯一條件，只要你肯出賣你自己的自由。換言之，則是出賣了你自己的前途。你今若自己限定了你自己的前途，說：我只要求謀求一職業，僅圖一身溫飽便夠了。你既早把你自己前途抹殺乾淨，試問你尚要此一份自由作何用？還不如肩上一塊金字招牌，對你像光榮些，你還可自掩己醜。這是我們當前的大學生們

所最該鄭重考慮、鄭重思索的一問題。

「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世界人類一切前途，全依靠在後生的青年們。若後生的青年們，將來的成就，永遠不得超過這一代，而且永遠只能在目前這一代的已成局面下，挨進一身，插進一足，爭取一職業，來滿足他一身的溫飽；試問：那樣的社會，前途何在，希望何在呢？難道大學教育的意義與功能，是即此而止了嗎？

我說到這裏，或許大學青年們會問我：你既不主張大學生注意他們自己將來的職業和出路，那麼，你所說的大學生前途，又是什麼呢？我想這一問，才是我所要提醒我當前可敬愛的大學生們之唯一要點了。在我想，只有撇開一個人的必須遇到的職業和出路問題之外，才始有他真正遠大的前途，才始會真感到他自己當前那一份自由之可珍重。否則，若專在職業問題上用心思，當知在這上，根本並無多大自由可言，也並無多大的自由須爭取，也將不見得所謂後生之真可畏。社會上各項職業，都現成安排在那裏，只待青年們各憑機會去投進。大學裏各門課程，各項知識和技能，也都現成安排在那裏，只待青年們各憑匆匆的大學四年光陰去修習。到那時，各自拿著一張大學文憑去社會求職業，難道便是大學教育之使命，便是大學青年的前途嗎？

我所說的大學青年之前途，在我想，也不是憑空不顧現實的一番高論和空談。我想最應顧到

人的馬跑得愈快，那懸掛在馬屁股後的人，他的生命危殆的程度，亦將以正比例而增。

在此種心理與風氣下，來談民族精神教育，實在難言。竊謂且莫論精神，一切教育，起碼工具仰賴於文字。而我們這數十年來，對於本國文字教育，無可諱言，是每下愈沉了。

從本源上下工夫，國家應積極提倡，使後起國民中才性相近的有志青年，肯埋頭從事於本國語言文字之研究，由語言學，而文字學，而文章學，分途精研；而尤貴有一貫精神，且先專注重在教育意味上，使大學校有理想的國文系，然後中學校可得理想的國文教員。中學有了理想的國文教員，小學也可有合水準的文字訓練。此是提倡民族精神教育一最先的要求。

爲求應急起見，應從現在小學、中學中之國文、國語教員身上著眼，加意讓他們有進修之機會。不在這上面注重，只想漢字簡化，只求提倡白話文更能通俗，只想如何能把文字文體變了，好讓通國人民，不費心，不化力，大家能一旦豁然貫通；竊恐古今中外，難期此神蹟之出現。

國文教育之外，繼之應注重國史教育。所謂國史教育者，決不是要通國學生，都能爛熟二十四史、九通那一堆繁浩的史籍。但既做了這一國的國民，決不會不關心到他本國已往的歷史。我們儘忽略了自己的歷史教育，但全國人民，卻依舊整天滿口在談歷史呀！譬如說：中國二千年來是一個封建社會。這不是已成爲一句全國流行的普通話了嗎？但我問：誰曾從二十四史、九通那

一堆浩繁史籍中來歸納、來證實、來確定了這一句話的呢？

又如說：中國學術思想，二千年來定於一尊，我們要追上現時代，便該打倒孔家店。這不是在學術界，在言論界，在一輩較高級的智識階層，還是不少人抱此觀點，不憚煩地，一而再、再而三的在提到此項主張嗎？但此仍是一歷史問題。試問誰曾在浩繁的史籍中，真能指實此定於一尊的說法呢？誰能確實指明那所謂孔家店的後臺老闆，和那店裏批發經售些什麼貨色呢？

學校教育不注重歷史，但禁不住全國民眾一開口便談論到歷史。難道只有中國歷史可以不學而知的嗎？

現代的中國人，好像都認為中國史可以不學而知，因此他們想進一步，希望中國文字也可以不學而通。再進一步，則是希望可以不受中國教育，而做一個合格理想的中國人。

我們既不能禁止中國人開口便講到中國史，我們只有對中國史提倡研究，莫使謬種流傳，來妨礙中國一切可有的進步。這一層，正本清源，依照目前情形論，也仍只有由國家來在最高的研究所裏培養對本國史有深造的後起青年，使大學校有理想的中國歷史系，循次來改進中小學的歷史教育。

歷史知識之成爲一空白，且不論。更可怕、更可惋惜的，目前的中國人，已不知道中國的疆

士和地理。我兩月前，曾在九龍公共汽車上，清晰聽到我後面座位上，一位年近二十歲的姑娘和一位三十左右像太太模樣的，因開一信封而爭辯。那位姑娘說：「寫了蘇州，不必再添寫上海，因蘇州是一省，上海是蘇州省一市。」那太太模樣的說：「你錯了，只有江蘇省，沒有蘇州省，而蘇州只是上海市之一城。因此大家寫信，都寫上海蘇州的。」繼此還有許多辯論更可笑。她們口齒清利，儀表文雅，應該是也受過教育的。那是兩位中國人，竟可說是比較代表優秀的、中上階級的中國人，而她們講話，又是江、浙口音呢！

中國歷史，有人會嫌其太長了，史籍太浩繁。中國地理，我想或許會有人嫌其太廣大，太費記憶了。不知有否辦法，也像簡化中國文字一樣，把中國地理也簡化了。有人主張索性廢止中國字，改用羅馬字拼音。不知也有人可能想出廢止中國疆土、改用外國疆土的辦法呀！

一家的子女，記不得自己家裏死去的父和祖，那不說了；但不應該不知道他家庭現有的臥房在那裏，毛廁在那裏，廚房在那裏，大門在那裏呀！

本國的文字，本國的歷史，本國的地理，那一些教育，說不上「民族精神教育」，但說到「國民教育」，總該注意到這些上。我們究竟要不要國民教育呢？

我們大家說，我們中國是一個落後的民族，一切應該向外國人去學。但至少，中國文字、

撰的講義，此刻上講堂，無法講。甚至在二十年以前在中學任教時所編撰的講義，此刻在大學講堂裏，有些仍感無法講。猶憶在對日抗戰時，有一位大學同事親口對我說：「像我們這四十五十的人，此後十年二十年，儘可不再讀一本書，儘可不再求一些長進，那一碗大學教授的飯，還得讓我喫。因現在的大學畢業生，在此後十年二十年間，再也趕不上我們。」

其實那位教授的話，只說準了一半。因到外國留學的，仍可把外國大學的新智識、新發現，帶回中國來，勝過老教授。只有教中國自己東西的，即如上舉本國文字、本國史地之類，還沒有可到外國留學的，便真要像那位教授之所想了。而真可怕的，是待我們這一批打不破飯碗的人逐一老了死了，而這十年二十年內，再也沒有來繼續喫這一碗飯的人。這並不是我菲薄後生，實在是這學術界幾十年來的大趨勢如此，誰也無可否認呀！

如何扭轉這趨勢，改換這局面，此刻不再留心，此後會更難措手的。我自問我上面這些話，決不是存心頑固守舊，或是抱殘守闕，說是提倡中國舊文化，來反對新教育、新智識、新潮流。更不是因我讀了幾本中國書，希望全國聰明才智，都鑽進那一堆所謂早該扔進毛廁的線裝書裏去，來乞媚於所謂塚中之枯骨。實因為中國人急切間仍將是中國人，中國教育也無法不仍將是中國教育，而中國文字和中國史地的人才，又急切間無法也向外國留學去造就；因此，心所謂危，

我們的至聖先師孔子說過：「三人行，必有吾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當知我們生在此社會中，不是可以獨立爲人的。必有他人同居爲羣，乃得好好做一人。人有好壞，不怕不識貨，只怕貨比貨。只要三人同行，除我以外，尚有兩人，便好把此兩人作一個比較了。這件事，那人對，那人不對。這句話，那人好，那人不好。只要把此兩人一比便知了。我只是學那好的，不要學那壞的，豈不那兩人全成我師，全由我學了嗎？但你的學，只該從做人的道義上學，即知我該如何，和不該如何。卻不該從做事的利害上學。你該知學他爲人便好，學他爲人便不好，那就夠了。不要想學他做事我有利，學他做事我有害；如此學則不好的。所以學只是學是非好壞，不是學利害得失。這是最要一分辨，最要一問題。你一問自心便自知。此在中國人謂之「義利之辨」，即是非之辨，亦即做人高下之別。儼你連此也不知，只懂如此則我佔便宜得利，如此則我要吃虧不占便宜，那就只在做事的利害上打算，不在做人的是非上計較，那你就太不天真，不像是一青年，我也無話再對你說了。

或說，你謂「青年」二字非中國原有語，今我國名中華民國，「民國」二字不亦非中國原有語嗎？我說君言誠是，中國人觀念，國之上尚有一「天下」。則天下的語言，並非一國之內即不能用。但創造中華民國的孫中山先生，是道地十足的一位中國人，他可稱是中國近代的大聖大

一〇 青年的責任

——與青年書之一

諸位可愛的青年們，從這一期起，我將借著中央月刊的篇幅，連續和諸位作長期的公開通信。首先我將介紹我自己，和述說一些我要和諸位通信的心情。

我自七歲在私塾讀書，四年後，進入初等小學，高等小學，而中學。在十七歲那年，本該中學畢業；但那年秋天，辛亥革命起義，學校中途停輟。明年是中華民國的元年，我年十八歲，跑進鄉間一所私立小學去教書。那時的小學生，有大過我四五歲的，不少和我同年齡的。我自己還是一青年，既脫離了做學生的時期，但我仍是在青年羣中一起生活，如是者幾近十年。

脫離了小學，去教中學，又九年。在那時，我自己已漸漸進入中年期。但當時，我教的是國文科，必須兼任一班導師，日常還要和一輩青年生活在一起。

直到民國十九年，我年三十五歲，開始進到大學去任教。在那時，我已是一中年人。但我的

感。

我雖虛度一生，但我也是在教育崗位上牢牢履守五十多年。我至少自己認為常與青年們接近，能瞭解得一些青年們的真情實況。更要是在我前半段的教師生活中，在小學、中學任教，對未成熟的前期青年們，瞭解得更多。猶憶在那時，正是我們社會激起掀天揭地的大震盪之際；人皆知的「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接續而來，那時我正在小學教書。繼之而起的，是國民革命軍北伐，定都南京，完成統一，那時我是在中學教書。說來慚愧，那兩時期，正是我們此一時代中青年躍起，在社會上發生大活動、呈現大作爲之時期。但我只是在小學、中學教書，不曾參加進這些活躍。待我進到大學教書，那時正已是淪關事變，及九一八淞滬抗戰，而下至於七七事變。在此以前，正爲國家社會常在極度震撼中，一輩熱心人士，似乎有感於社會上大多數的中年老年人，不夠力量來應付此局面，遂大聲疾呼，要刺激青年人起來共同負荷此大任。但我在小學、中學，深知在我四圍的青年們，有此熱忱，此是青年之可愛處，而實是無此能力，正該栽培。青年人有青年人的崗位，青年人有青年人的前途。青年們的責任，應在其將來，而不在其當前。不該捨棄目下求學好光陰，來從事種種與學校無關之活動，要他們負擔起應由中年以上人該負擔之巨大責任。在我亦只是愛護青年，希望他們來作後備隊，莫要他們來作先鋒隊。國家民族

少裨益。我將馨香禱祝，以期待我可愛的青年們之反應。

（民國五十九年三月中央月刊二卷五期）

許倍。當時道途所見，此刻都已脫離學校，在社會各方面服務，青年轉成了中年。只要他們每一青年時期不會浪費，社會應獲幾許進步。固然臺灣此刻較之二十年前進步甚大，但理想亦豈僅止於此。我們總希望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則今日的青年們，豈不應更自策勵，更自奮進。

在今日的青年們，或許對當前社會，亦抱有許多不滿。當知此等不滿，正是今日青年們責任所在。正待他日投身社會，能再改進。孔子說：「焉知來者之不如今。」正待一批批青年們不斷有進步，社會亦將隨之有進步。社會所望，正在青年。苟使青年無望，則此社會更復何望？

今當設問，臺灣此二十年來，青年進步，究在何處？又當問，此刻臺灣青年，較之以往大陸青年，進步究在何處？此一問題，恐難具體作答。但關心社會，關心國家民族前途者，此一問題，不能不常置心頭。即青年本身，亦當存此問題在心。「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我們不該不時有一個比較。

我願將我直覺上所感到者，提出一些比較來，和當前我所心愛的青年們作一番閒談。

以前青年種種心情，我已在上一書中約略道過。其時社會流傳有一句話，值得我此刻提起。

謂：「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此似在五卅運動時期由北京大學蔡元培校長所提出。但此話由當時說來，實有許多為難處。緣當時，青年們救國心切；蔡先生意，只盼當時熱心救國的

青年們，不要忘了讀書。讀書求學，使他日各得成材，則救國自有途徑，故勉青年們在救國運動中莫忘了讀書。至於說「讀書莫忘救國」，則勉青年應以讀書爲救國準備工夫，以救國爲讀書終極目標。此兩語，可謂是雙方兼顧，斟酌盡善。

但我說有爲難處。因救國是一件急迫事，又是一件艱鉅事。不是說大家一躍而起，國便得救；待救得國了，再回頭來讀書。而且真個躍起救國，心情必然緊張，精力又要集中，尙患力不從心，那能在救國中還分心不忘讀書。而且既是一件急迫而又艱鉅之事，大家又得羣策羣力，急起直追。待成了羣眾心理，各人心情不免變質。在成年老年人，修養有素，亦難把握心情使恰到好處。以此來責望青年，救國不忘讀書，實已落爲一句空話。至於讀書不忘救國，卻易使青年們在讀書時期捨棄讀書，奮發救國。兩句話終成爲一句。由我私人想來，這兩句話，現在不如改爲「愛國不忘讀書，讀書不忘愛國」，則青年們在一念之頃便可做到。在學校讀書，自可心存愛國。只要心存愛國，便知我此刻讀書，意義深長，責任重大，自會更勉勉以赴。

猶憶我在北京大學教書，有一清華大學學生常來我家。我雖在清華兼課，此一學生並不上我課，只爲其親長介紹，時時前來。每來必在星期六彼離校回城之晚，一來必談國家大事。其人誠懇敦篤，我勸其何不多談學問，卻專談國事。彼云：「校中同學競以國事相談，我聽先生一夕

話，回校乃可安心讀書。若一次不來，便感此心搖搖無主，讀書不安。」我因隨其所問，爲之分析解答。久之，實不耐煩，囑其以後切勿再談此事，彼此浪費時間，又永無止境。我當時聲色並厲，他亦悔悟，謂後當力戒，非關學問，將不來我處作無益閒話。時值隆冬嚴寒，彼深夜披一羊毛巾，辭我出門，我不禁深爲感動。

翌晨清早，我盥漱未畢，彼忽又來，神色倉皇。我疑動問。彼謂：「本約再不談國事。但今晨忽又有大事，我心驚擾，不得不急來告知。」我謂：「一夜間何遽有此。」彼告我：「晨起見報，蔣委員長在西安蒙難。知先生只有天津大公報，此時未至，故急前來。」於是整一上午，彼又在我家縱談此事。此後我亦不忍再對彼堅持拒談國事之戒。

此一故事，正可說明當時國事及大學青年心情之一斑。此一青年後幸未入歧途，今仍在大陸，存亡不知。

另有一故事。在抗戰中，北大、清華、南開三校文學院聯合在湖南衡山開課。時有數學生決意赴延安，諸生集草地上歡送，慷慨陳辭，有聲淚俱下者。我與清華馮芝生教授，同被邀往講話。我最後發言，力勸諸生應安心讀書，國家在此辦流亡大學，正要培植諸君爲將來國家大用。南京淪陷，非即是戰事結束。武漢繼陷，亦非即是戰事結束。國家調用諸君，尙非其時。諸君在

此，惟有安心讀書，始爲報國惟一正途。因力斥此數人決心赴延安之非。會散，馮芝生在房中與我力爭，謂我勸諸生安心力學是正理，但不該申斥赴延安諸人之非。當時曾有某教授在座。頃某教授亦在，當亦可追憶及此。

此數人決意前往延安者，在當時是否已加入共黨，我不知。然彼輩去延安後，結果可想而知。此數人在當時，亦是感情激昂，有志救國。然在已無補，在國有害。而其爲害之深且烈，則爲當時嚮往延安者所未能逆料。在我此時，回念當時青年，終不能不抱一番同情之心。因是親身接觸，故覺青年終是可愛。時代犧牲了青年，青年亦耽誤了時代。成此悲劇，言之痛心。

但回頭來看我們當前可愛的青年們，單就上述一點言，似與往時青年不一樣。救國狂熱不可有，愛國真心則不可無。「生爲中國人，死爲中國鬼」，不僅我們每人如此；上有祖宗，下有子孫，從頭到底，莫非是「生爲中國人，死爲中國鬼」。如此而不愛國家，不愛民族，至少是一不仁之人。人而不仁，其他更復何論！中國文化在此方面，最所注意。幼稚在家庭，則教以孝道。知孝父母，自知愛其家。少長進學校，則教以敬業樂羣，敬學校所授之業，樂學校所處之羣，則自知愛學校。培養其愛，即所以培養其仁。中國國家民族，縣延之久，擴展之大，以有今日，惟此是賴。豈是中國爲父母者，僅能多育子女，子女生齒日繁，而不知愛國家，愛民族，則益將促

使其國家民族淪於萬劫不復之地。然幼稚知愛家庭，卻不可使之羣掌家務。少長知愛學校，亦不可使之羣持校務。如此則愛家適以亂其家，愛校適以亂其校。往日大陸青年，其先莫不由一顆愛國真心出發，但其後則激而爲一番救國狂熱，乃使狂熱漫失了真心。前車之覆，近在目睫，豈不當懸爲炯戒。

就目前而論，臺灣青年，此二十年來，往日大陸青年一番狂熱，似已逐漸衰退，此是可喜之象。但爲青年所不可一日或無之一顆愛國家愛民族之真心，則似亦不如往日大陸青年之顯著。此實是一項大堪警惕之現象。若我此所分析，誠屬事實，則不得不鄭重提出，使我當前可愛之青年們，各自反省，各自檢討，以求糾正。

大陸青年因於救國狂熱之激動，有一顯著風氣，即好爲高論，批評國事。此風似乎初來臺灣，亦尚有之。我在十年前曾一度在美國某地，與一輩自臺出國者聚談。座上有許多人肆意批評國事。余謂：「諸君來此，固是留學生資格，但同時不啻乃是代表著國家與民族。如此言論，其所影響，將遠勝過政府所派外交人員之努力。在國家民族所受打擊，恐非十萬大軍壓境可比。」即時座上有入明斥我言，謂我身分不同，故爾不得不如此爲說。我謂：「諸君與我，同是國家民族一分子，身分不同何在？」此一番爭論，乃在此刻仍旅居美國某一教授之家中。目下此風，似已

漸歸衰退。但狂熱退而真心亦失。此層則不得不細爲尋究。

如何能戒此狂熱而保此真心，其間大需修養工夫。學識上、心情上，均需有修養。修養之目標，固須教者善爲提撕；然修養之工夫，則貴學者各自潛修默養，非教者所能爲力。此「修養」二字，乃是中國文化中一項可珍貴之傳統。可愛的青年們！當知在學校求學，不僅是求知識。求知識，亦不專在口頭上、紙片上，主要能貴有知識修養。而在知識修養之上，尤貴有人格修養，心地修養。同一日光水分肥料，加在不同之根本上，發出異樣的枝幹，異樣的葉，異樣的花，與結出異樣的果。學問知識，亦如日光水分肥料；心地與人格，則是根本。同樣的學問知識，施諸異心地、異人格，亦會開出不同的花，結出不同的果來。

若使一不仁之人，沒有愛國家愛民族一顆真心，縱使獲得甚高學問，甚深知識，亦將對國家民族無所補益，抑且有所傷害。而人格修養，心地修養，又貴在青年時培植根本，奠定基礎。正爲在青年時，各人心地純潔，外面又少各種牽纏。若在此時，即知有心地修養，人格修養，則可事半功倍。待到中年以後，心地上橫添許多污染，事業上橫出許出牽纏。到那時，始知有心地修養，人格修養，終不免會事倍而功半。中國易經上說：「蒙以養正，聖功也。」一人在童蒙時，卻反易走上一條正路。天地生人，可貴在此。青年時期可貴，亦在此。當在青年時即可有作聖功

一二一 自覺自強

——與青年書之三

可愛的青年們！我在第二書中曾勸諸位當善自保持各人真誠地愛國家愛民族的一顆心。這話似屬多餘，實非多餘。人誰不知愛國家愛民族，所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古今中外，無不皆然。所以說，把此等話來勸人，似乎是多餘。但因種種關係，不免每一人對國家民族的愛心，或濃或淡，或深或淺，或存或亡，或隱或顯。而且更有對自己國家民族意存輕蔑憎厭，迹近叛離違逆的。那亦是事實，可不舉例作證。所以說，勸人善自保持各自對國家民族的那一顆誠愛的心，話似多餘，而實非多餘。

人當孩提之時，便知愛父母，愛家庭，中國古人稱此爲人之「良知良能」。但年事漸長，智識漸開，此種良知良能，卻會漸淡漸忘，有而若無。孟子說：「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孩童自知慕父母。待到五十還能慕父母，而且大舜那時，正是受了帝堯付託，

須嫁，這些事，何須再用理論作支撐。人生忠孝大節，亦是以情感為主，但有時卻會橫添進許多理論來干擾。中國古人說：「天下無不是底父母。」此乃情感話，不關理智事。人誰沒有過錯？但過錯犯在父母身上，就孝子的內心真情感來說，究與犯在別人身上有不同。中國歷史上，犯最多大過錯的應莫如舜之父母。但父母總是父母，縱說舜母非親生之母，但推父及母，也總是父母。人非父母何由生？舜雖是大聖，亦不例外。從別人看來，舜父頑而母嚚。從舜看來，則頑者是我父，嚚者是我母。舜是一大聖人，聰明正直，寧不知自己父之頑與母之嚚？但因親暱而忘了父母之頑嚚，究還是小糊塗，情有可原；若爲了父母頑嚚，而竟忘了他們是我之父母，則是大糊塗，罪不可恕。所以爲罪不可恕者，因其人之無情。忘了父母，則是無情之極。沒有情來專談理，那是要不得。

有一學生問孟子，若使舜父瞽瞍殺了人，皋陶爲法官，執法不阿，請問當如何辦？孟子說：「把瞽瞍拿下，判以應得之罪。」又問：「當時舜爲天子，又將如何辦？」舜是一聖天子，寧有強迫其臣皋陶枉法不盡職之理。但瞽瞍是舜父，又豈有坐視其父之死而不營救之理？於是孟子代舜設想，說他將會私竊其父，遠從中原逃向海濱偏僻無人處偷偷過活。天子之位，是坐不得了。若又問：那時舜的心境如何？孟子又設想說：若把天子之位來比他自己父親一條命，正好一雙破鞋

戰國策上也有一故事說：一人出外遊學，離家三年，回來直呼父母姓名。父母問他，他說：堯舜大聖，也只呼名，為何父母要特稱爸媽？他父母說：你遊學三年，廣見多聞，回來了，儘可逐事改變，能不能把稱呼父母姓名一項，暫時移緩呢？這一時代的中國智識分子，足迹遍全球，遊學歷諸邦，新思想、新潮流、新智識、新技能，學得也真不少；但回國來，首先第一件事，便是不該罵中國。若是單罵當前中國種種不如人，還可以；卻偏要連古帶今，把中國人一口氣罵盡。我在少年時，即常聽人說：「中國人從來沒有時間觀念。」又說：「中國人從來不懂衛生習慣。」諸如此類，不勝枚舉。其實在中國人中，也曾有過大聖大賢，有過正人君子，有過大思想家、大學問家、大文學家、大藝術家，也曾有過各項專門科學傑出人才。天文學、數學、曆學、農田水利學、醫學、藥學、營造建築學等等學問，各有發明。又曾有過大政治家、大軍事家、大財政家、大法律家、大外交家；又曾有過大教育家、大宗教家、大航海家、大遊歷家；也曾有過大俠客、大商人、大慈善家。形形色色，如上所舉，只有漏了，沒有虛說。全部中國史，記載何限？我且不把此各項人物一一來和外國人比高下，但由我老實說，總該比現代留學回來專意罵古的一批新智識分子強了些。試問中國人為何不該存在於天地間？

中庸上說：「道之不行也，知者過之，愚者不及。道之不明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

「如此便成年年賣洋襪，豈不仍是無味？你能決心轉去我處，我會教你心意轉變。否則你再考慮，我仍盼你來我處。」我們便如此分別了。

幾年後，我轉去一師範學校教書。每年畢業學生，因我從小學轉入中學，必來問我出路問題。我總說：你們早有了出路，師範畢業，便是去小學教書。他們總不滿意我如此作答。我又說：你們的出路，該問自己，不該來問我。須先認識你自己，便有自己的出路。若你是一鷹，我必勸你飛上高空。若你是一獅，我必勸你跑入深山。諸位當知，各人才性不同，完成你自己，便是你最理想最圓滿的出路，誰也不用羨慕誰。

待我進入大學教書，許多大學生，仍還一樣喜歡和我討論出路問題。我每舉一例告之：我有一中學同學，文學成績很好，但為考慮出路，進大學，選讀了理科，成績也不差。後在中學作一理化教師，極受學生愛戴。但他說：我性所近，還是在文科。他課餘每以吟詩填詞作消遣。深悔自己若當年修讀文科，一樣可得如今般職業，心情當更愉快、生活當更美滿。但當時只在職業上打算，此刻始知，爲了職業而迷失了自己，或說是毀損了自己，那是一大錯。

在對日抗戰時，後方生活艱苦，一般大學生，更多關心到職業出路。我也曾對他們百方解說，但總感打不開他們心上那一結。有一次我憤慨地說：若專打算生活，不如離開大學，去學汽

高可能的最圓滿的前途。而在起步上路之前，我們卻不易於認識此一路。

我在此方面，自以為嘗得其中甘苦較親切。因我沒有機會進大學，從十八歲起，即已抗顏爲人師，更無人來作我師，在我傍指點領導。正如駕一葉舟，浮沉沉茫茫學海中，四無邊際，亦無方針。何處可以進港，何處可以到岸，何處是我歸宿，我實茫然不知。但既無人爲我作指導，亦無人對我有拘束。我只是一路摸黑，在摸黑中漸逢光明。所謂光明，只是我心自感到一點喜悅處。因有喜悅，自易邁進。因有邁進，更感喜悅。如此循循不已，我不敢認爲我自己對學問上有成就，我只感得在此茫茫學海中，覓得了我自己，回歸到我自己，而使我有一安身立命之處。

諸位又當知，人生大過於學業。我們只能說，在此人生中包括了學業；卻不能說，在此學業中包括了人生。人生是一大圈，學業是一小圈。大圈可包小圈，小圈不能包大圈。我們只能說，我們的學業，乃爲著我們的人生；卻不可說，我們的人生，乃爲著我們的學業。但說到人生，更是茫茫。我們如何能在此茫茫人生大海中來覓得我自己，那事更不易。

諸位將會說：我此時此處的此身此心，豈不便是我自己？我自己已明白現在，何須更覓。但諸位若真細讀我上面所言，則知此時此處之此身此心，實在是不易認知。而且更要者，並不在此時此處，乃應在此時此處之外。我之此身此心，究由何而來，又當從何而往，那會感到更不易捉

《錢賓四先生全集》丙編書目

③7 文化學大義、民族與文化

③8 中華文化十二講、中國文化精神

③9 湖上閒思錄、人生十論

④0 政學私言、從中國歷史來看中國民族性及
中國文化

④1 文化與教育

④2 歷史與文化論叢

④3 世界局勢與中國文化

④4 中國文化叢談

④5 中國文學論叢

④6 理學六家詩鈔、靈魂與心

④7 雙溪獨語

④8 晚學盲言（上）

④9 晚學盲言（下）

⑤0 新亞遺鐸

⑤1 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

⑤2 講堂遺錄

⑤3 素書樓餘瀋

⑤4 總目

